

资料与研究

ROSA SINENSIS

1994年5月1日



KDN PP 7865 / 2 / 94

ISSN 0128 - 8369



● 历史点灯, 重临五四
/ 辛金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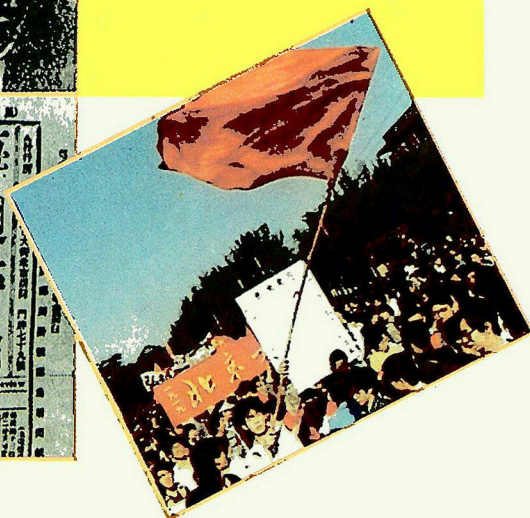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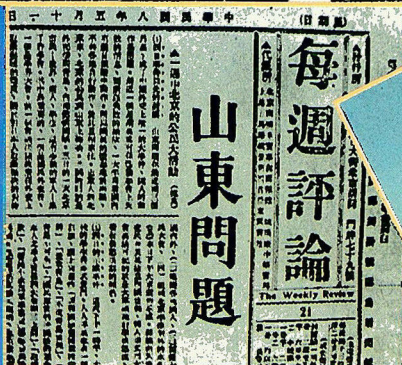
● 也为了纪念“五四”
/ 安焕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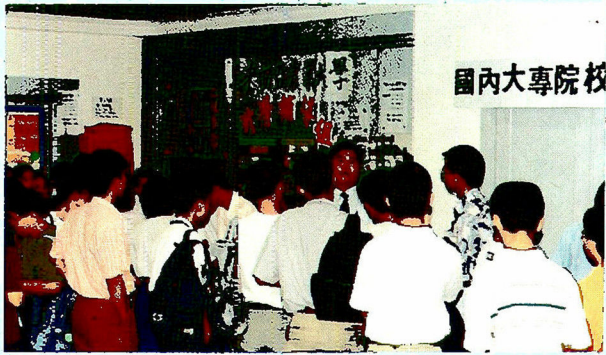


● 梅花峰

—— 永乐多斯、甄供、
刘锡通、张碧芳、
陈锦松

- 细菌与胃溃疡
/ 吴乾利医生
- 知识与权力的共犯关系
/ 曾庆豹
- 政党政治的另一种选择
/ 正文





國內大專院校

“用心打造黄金岁月”

华资中心主办升学辅导讲座

配合大马教育文凭及大马高等教育文凭的放榜，华资中心除了每年定期出版《国内各大学科系介绍手册》和《国内大学入学积分分析》外，今年更策划“用心打造黄金岁月”升学辅导讲座，邀请教育工作者，在19/3/94作专题演讲及免费辅导，为学生及家长提供最新的相关资讯，包括国内外大学的升学机会，独中生的升学选择及国内私立学院的概况。当天出席者非常踊跃，将会场挤得水泄不通。由此可以看出大家对升学问题的关注。

■图示出席“升学辅导讲座”的家长，以及等待申请到大专院校深造的学生，围着各院校的辅导员提出问题，要求指点迷津。



柯嘉逊主讲“马英争执真相”

今年初，英国国会下议院特别委员会针对英国补助我国建造柏高水坝（Pergau Dam）的计划召开公证会。英国传媒大事报导事件的来龙去脉。整个事件涉及英国援助我国兴建柏高水坝，以换取五十亿军火交易的传闻。英国泰晤士星期刊暗示首相涉及贪污。

我国政府就英国传媒所作的诋毁性报导，对英国采取经济制裁行动。柯嘉逊博士在华资中心的讲座会上（6/4/94）指出，首相的信誉因有关的报导而无故被遭踏是令人深感遗憾的事，但这并不表示我国政府就须要因此惩罚所有无辜的英国承包商及他们的大马伙伴。首相可以通过法律起诉泰晤士报以洗清名誉。

这项争执引发的其他问题包括：

- （一）为什么有关军火和柏高水坝的成本价格会被抬高到如此不成比例？
- （二）为什么所有利润高的合约，包括军火交易和柏高计划，

都被授予曾慷慨捐献给保守党的公司？

- （三）在这所有的交易中，谁是马英双方的中间人，以及他们抽取多少佣金？

柯博士认为，报章对于深入调查丑闻真相的工作扮演重要角色。

华资资料研究中心 主

马英争执之真相

柯嘉逊博士主讲



■主讲人柯嘉逊博士及主持人谢春荣律师。



編者的話

回顾历史，五月，五月是一个散发着力感、色彩与光辉的具有历史性的月份。它的力道，摧枯拉朽，掀起惊涛巨浪，所向披靡，推动了时代的巨轮展现出社会飞越的新境界；矛盾与新旧势力碰击，闪现的火花；冲突斗争的激昂、挫折、创伤……脸红耳赤，彷徨饮泣，洒热血抛头颅。多少的故事，都是难以忘怀、心头总有它的记忆。

五月，可歌可泣。

五月，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五月，它在历史上发生的运动，既是人类成长的沧桑，也是人类自伤的殷鉴。

而“五四”，它在世界中华文化圈的社群来说，更可以视为一个圣节。我们纪念它，我们向它瞻仰。

这期以它作为“焦点”，值得欣奋的是，撰写论文的辛金顺与安焕然，都是我们年青一代的学子。他们的论文，一方面显示对学术研究的继承与心得，另一方面是表现出结合实际与现实，解析问题的正确取向。他们有自己的见解，在在都值得重视。

刘锡通的《〈文明冲突〉的反思》与徐策的《东西文化确有鸿沟，但未必导致冲突》，都是针对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论说的辩驳。曾庆豹论马来知识社群的文化现象而写的《知识与权力的共犯关系》，篇幅虽然不长，但言论的内容却很丰富，份量很重，富有启迪意义。

本刊由这期起，增辟《医药常识》栏，先邀请马大医院的吴乾利医生解析《细菌与胃溃疡》。以后每期将分别介绍一种病症与其疗治情况，希望它对读者的保健有裨益。

本期的内容丰富，文稿增加了两篇报导，即《砂劳越原住民布拉湾人受到文明的冲击》（黄孟祚）与《脑死就是死》（陈忠登医生）。

人类不断在追求文明科技的发展，然而，文明的演进，由某一个角度去衡量，它又是一种冲击的伤。

我们对人文的关怀，已然不只是有“两难”，而已是面临“多难”。



资料与研究

ROSA SINENS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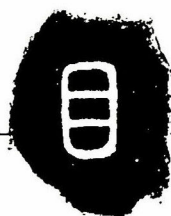
出版：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
 出版人：叶新田博士
 编辑：《资料与研究》编务咨询委员会
 何维斌（召集人）、朱自存、
 张景云、李业霖、罗正文、
 陈应德博士、陈忠登医生、
 苏庆华、游若金博士

主编：陈思庆
 封面题字：何维斌
 美术设计：叶玉佩
 打字排版：华社资料研究中心资讯部
 发行处：华社资料研究中心
 Huazi Resource & Research
 Centre Bhd.
 No. 1, Jalan Maharajalela
 50150 Kuala Lumpur
 Tel: 03-2734035
 Fax: 03-2734037

承印：万兴印务贸易有限公司
 No 3, Jalan SR 3/6
 Taman Serdang Raya
 Seksyen 3
 43300 Seri Kembangan
 Selangor Darul Ehsan

出版日期：1994年5月1日
 定价：RM5.00
 KDN PP 7865/2/94
 ISSN: 0128-83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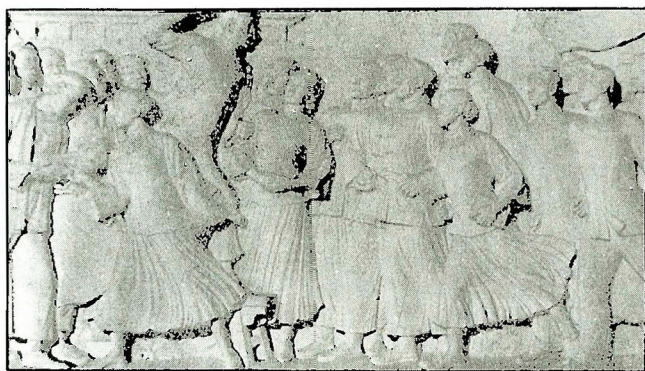
所有来稿反映作者观点，
 并不代表本刊立场。



■ 编者的话

● 焦点

- 4 回顾历史 汲取启示 / 风辑
- 6 历史点灯，重照五四
 ——五四运动的意义探讨与评价 / 辛金顺
- 20 也为了纪念“五四”
 ——论台湾文学和马华文学的源起
 发展与中国新文学运动之关系 / 安焕然



● 梅花峰

- 28 殴妻之风不可长 / 永乐多斯
 大脚小脚 / 甄供
- 30 一点评论，一点希望 / 刘锡通
- 32 弱势与弱者 / 张碧芳
- 33 滥用新闻自由 岂容双重标准 / 陈锦松

● 新闻橱窗

● 报导

- 40 砂劳越原住民布拉湾人受到文明冲击 / 黄孟祚
- 44 脑死就是死 / 陈忠登医生
- 54 林忠强博士擢升为教授
- 60 华资广招会员

● 医药常识

- 47 细菌与胃溃疡 / 吴乾利医生

● 专论

- 48 知识与权力的共犯关系
——论马来知识社群的文化现象 / 曾庆豹
- 50 政党政治的另一种选择
——从马绍尔对新加坡政制的评论谈起 / 正文
- 52 《文明冲突》的反思 / 刘锡通
- 59 东西文化确有鸿沟,但未必导致冲突 / 徐策

● 寻根溯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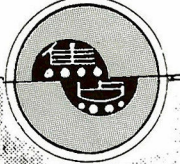
- 62 国歌知多少

● 文摘

- 66 走上神坛的包青天 / 梁胡雪姬

● 翻译

- 68 《砂劳越华文》第五章
——叛变以后的华人拓荒者 / 陈振声撰 ● 黄顺柳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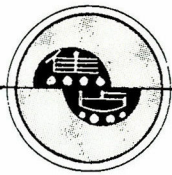
回顾历史 汲取启示

五四运动的发生，距今已有四分之三个世纪。75年来，每逢五四，在中华文化圈内，或有华人聚居的社群里，一定会有人或团体，通过各种形式来纪念它，重新探索它的意义与影响，汲取教训与启示。

这有必要吗？

有人认为谈论五四运动的论述，已经太多了。还有什么可谈的呢？再谈，也许只是重温一下历史。即使我们认同“温故知新”，意义也不会很大。

有人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五四运动，即使当时的动机“简单”——“外抗强权，内除国贼”或是“启蒙”与“救亡”。但它的影响，却是十分的深广与复杂，而特别是对华人的思想意识、观念，以及文化与文学所发生的冲击，直到今天，仍然存在。



我们说五四运动是一个“爱国运动”，既是爱国运动，当然就与政治、思想的觉悟分不开。五四运动实际上是导源于新文化运动，而后由北京扩大至全国，成为一个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因此，它的内涵非常复杂。

“五四运动当然不只指 1919 年 5 月 4 日这一天的运动，乃是指中国接触了西方文化所孕育的一段文化历程，五四不过是这个历程中的一个指标。”（李长之语）

而周策纵在他所著的“五四运动史”，在第一章的导言中，就此而申论指出：“这种对五四运动一词所采广义的用法，是很有充分理由的：第一、那些鼓励大众游行示威，罢课罢工、和抵制日货的领导人物，有不少正是那些提倡新文学、新思想、和社会改革的新兴分子。而他们在思想上，行动上的反对者则是中国固有传统的代言人，或自称为固有传统的代言人。其次，当时思想改革家的反军阀，反强权活动的根据，乃是早期一群知识分子所鼓吹普及的民主思想。由此看来，五四的示威活动实在是那早两三年前就开始的新思想运动的必然结果。第三，许多与示威运动有密切关系的学生领袖从一开始就觉得：五四的真精神不只是单纯的爱国主义，而是基于对民意至上、民权至上，和思想觉醒的信念。他们活动的宗旨不只要推翻军阀统治；他们所关心的也不只限于外交问题。在示威事件发生展开以后，他们对社会和思想改革，与对爱国运动一般，付出了同样多的心血。结果自 1919 年至 1920 年间的运动给人最深刻而磨灭不了的印象，就是他们在思想界造成的革命，和社会上造成的种种改革；这一切活动的中心思想则是对社会上、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偶像破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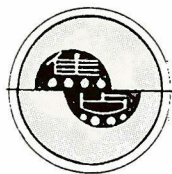
毫无疑问，我们认同“五四运动是一个复杂的现象”。

因为五四运动是一个复杂现象，所以，它值得一一次又一次的研究与反思，也只有这样，才能比较深入而全面地去认识它。

本刊这次以它作为焦点，特别要强调的是，撰写《历史点灯，重照五四——五四运动的意义探讨与评价》的辛金顺，与《也为了纪念五四——论台湾文学和马华文学的源起发展与中国新文学之关系》的安焕然，他们两位都是我国的年轻一代的学子。他们的论文，清楚地显示，在认识历史，承传知识与研究等方面的心得，都是十分骄人的。

辛金顺说得好：“历史点灯”！

有灯，就有光源，可以照耀今天的处境与迈向明天的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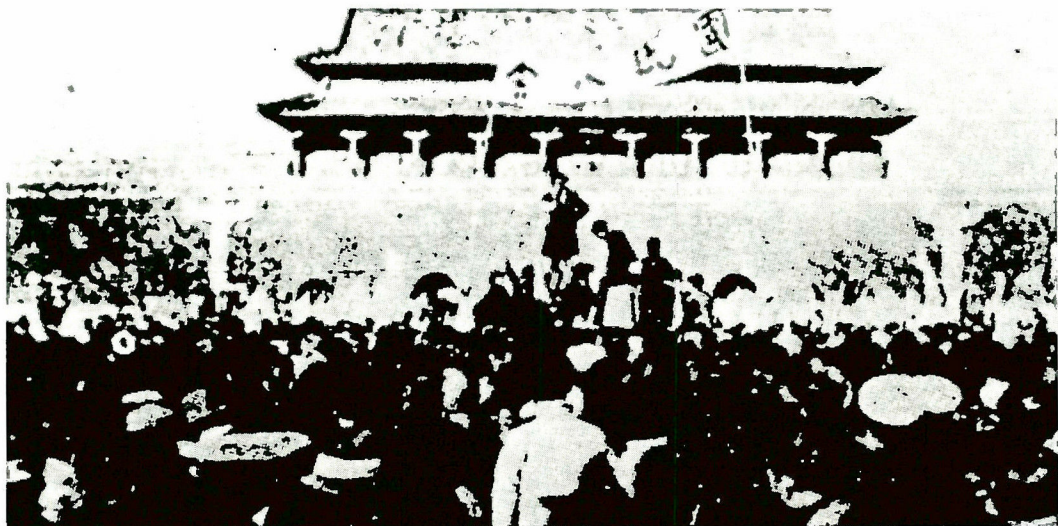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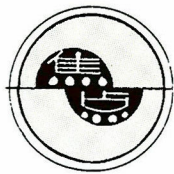
／辛金顺

纪念五四

歷史點燈，重照五四

五四运动的意義探討与评价

學生



前言

75年前的5月4日，大约有三千多名北京的大学生会集于天安门前，愤怒的抗议北洋政府对日的屈辱条件，抗议巴黎和会的山东决议案。“内除国贼、外争强权”的学生爱国运动很快的演变成群众性运动，虽遭到北洋政府的压制，但却也激起其他城市的连锁响应，新兴的工商阶级和其他知识分子纷纷加入行列，很快便引起一场广泛性的风潮，并席卷全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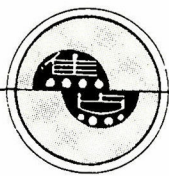
对于这个运动，誉之者誉为中国近代的思想革命、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毁之者则视为近代中国祸害的源头，是毒蛇、洪水、猛兽。不管其功过如何，我们不得不承认它在中国近代史上所带来的影响与震撼，它为中国政治添了一个新改革，也为中国社会开了一个新纪元：在中国思想史上也起了一个极大的变化。饶是如此，这并不表示在历史上它已得到相当的评价与地位。七十余年

来，几乎每年都有不少人开会讨论或纪念它，而论述五四及其相关课题的专书与论文，也早已盈篇累帙，汗牛充栋了，唯在内容上却多是些主观和论战式的解释，缺少详细的事实记载和分析。何以七十余年前的一个立意单纯的学生爱国运动演变到后来如此错综复杂呢？这当然牵涉到运动本身的争论及某些外延因素的限制。这也是本文欲探究竟的原因所在，并于此给以五四运动一个较为理性及客观的解释和定位。

在研究的方法上，本文因受到资料搜集与题材的一些限制，大部份只能以各类图书典籍、历来学者之相关研究论点，或当事者之著作、书信文件等加以处理。而其步骤大致上是包含分析、归纳和批判的研究。

五四本质的思索

一般而言，谈到五四，许多人的直觉反应即会联想到“新文化运动”，更有人直接的将五四比为新文化运动。虽



说它固然是涉及文化价值系统，若换一个角度来看，“五四”何尝不可称做一个单纯性的爱国运动呢？这其中自也牵涉到立论观点目的性的差异了。因此，在众说纷云中，如何对该运动加以界定、解说和评价，问题本身就变成非常复杂与困难。时至今日，五四的本质、意义及成就仍是知识分子聚讼的焦点，囿于意识的牵连，政治的利害、或学术上的观点等等因素，使得本身已具争议性的运动，再蒙上一层神秘感，这也就影响到运动本身在解释上的误导与客观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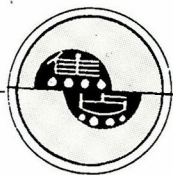
李泽厚曾经用“启蒙”与“救亡”两个主题来解释五四运动。所谓“启蒙”一般所指的正是“五四”广义的涵意，即是指从1919前后几年，由中国知识分子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而“救亡”则是狭义的五四，指的是从1919年5月4日学生所发起，并扩及至全国各城市所展开的一连串爱国主义示威运动。若按狭义而言，则五四在发生之后至六三事件后已结束。但若广义而论，则五四余波迄今仍然荡漾不已。到底这两者是否会发生冲突？其关系又是如何？在此，个人将暂以“启蒙”与“救亡”为主题观点以探析五四在范畴方面的问题。

在解决上述的问题前，首先我们必须先了解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在时间上的关系。早在1915年，上海的一位学者黄远庸已在努力倡导一种新文学，这种新文学“将把中国的思想和当代世界思想做坡接连系，而加速中国根本之觉醒。”这种想法旋即获得改革派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的回应，并在“新青年”中极力倡导，遂演变成全国性的思想运动。而至少在1919年5月4日前，这种中国的“文艺复兴”运

动已在中国文化思想各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当后来学者们接触到此一时期的命题时，他们已不是真正在讨论五四运动，而是更广泛的在讨论排斥中国旧传统以迎合西方思潮的新文化运动。当然，这只是五四与新文化运动因为在时间的发展上，存有某种程度的相关性而衍生出来的概括认同。虽然这并不足说明五四与新文化运动在本质上是属于同一关系，但由此至少概略可以了解到：五四运动基本上可说是新文化运动过程中的一个指标。这正如 Benjamin Schwoutz 教授所言：“五四不是平原上突起的高峰，而是高山带上较高的山脉”。高山脉所指的正是新文化运动所引起的思潮，而较高的山脉自然是指五四在整个潮流中的角色。了解到这一层的关系概念后，我们才能更进一步的探讨五四与新文化运动的问题而不致混淆。

到底五四运动是否应只是指包括学生和知识分子及工商阶级的社会与政治运动，抑或亦包括1917年起的新文学、新思想运动呢？对这个问题主要有三种看法：

- (一) 有人主张“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是两回事，而且彼此甚少关联。持此看法者，大部份都是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当事者。他们都认为“五四”并不是由新文化“直接”触发的。而且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大体上来说也未曾领导过，甚至有些不曾支持过“五四”运动。这派人只承认新文化运动也许略为便利“五四”的推行，而“五四”则帮助了新文化运动在影响上的扩展。持此论点者由于大都曾参与五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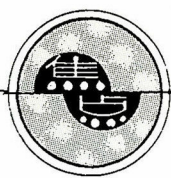
基于意识上的牵引，多强调五四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及当时运动在政治社会上所造成的影响。此派看法即是趋于狭义五四，著重于运动本身的爱国性质。

- (二) 另一派人，他们承认“五四”的爱国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二者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但他们却不认为“五四运动”应包括新文化运动在内。因为新文化运动是独立存在的。此派以胡适为代表，他采纳孙文对五四的看法，认为五四的学生活动与思想革新的新文化运动有密切关系，不同于孙文的是，胡适特别注重新文学运动，尤其是白话文的问题。胡适在心态上一面承认五四的爱国运动，但他更强调该运动在文化与思想上的意义。因此他始终都认为五四时，他们所从事的主要是人文主义及文艺复兴运动，而五四运动则被视为是一种打扰。

- (三) 另一派的知识分子则采取更广义的看法。认为五四是个复杂的现象，即非单纯的爱国运动，也非只是新文化运动而已。此派所采取的看法认为五四同时隐含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二者溶为一体，只是一个是在行动的，一个则是内在的思想动力。某些学者认为，五四不仅是抗议行动，更是中国与西方接触后一种文化发展上的指标。包遵彭则强调五四是新文化运动中“一段过程”而周策纵则在《五四运动史》中把五四看作“中国的一次知识革命”。

以上是三派有关五四与新文化在关系上的界定之主要论点。这其中也牵涉到意识、立场、观点等等因素，但若仔细加以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其立论在某些方面的漏失。以下即尝试加以探析：

- (一) 第一派的观点似乎只看到五四的表层，而未能加以探索五四之于发生的原因。亦即对五四未能做深入的探讨。他们未了



解到学生的运动其实并非出于突然，而究其实是有其背景和原因的。当然其背景原因并非只是新文化运动而已，更牵涉到历史、社会、政治及经济等。此派论者忽略了对五四运动整体性的审视。

(二) 而第二派的论点似乎忽略了五四的重要及其所产生的全国性的回响，他们只见到“五四”知识化的一面，而忽略了“五四”普遍化的一面，其实二者的重要性是一致的。当初若没有五四学生运动的发生与它所造成的回应，启蒙的思潮可能会被反动的军阀所压止呢！

(三) 第三派广义的论点则似乎已将两个各具其本质的运动混为一谈了。当他们尝试在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之间建立一协调关系时，他们似乎并未能真正的了解到此二运动的本质是什么，其成因与发展的趋势是如何。二者之间确实是有某种关系的存在，但并不是一体的。二者可能有共同的本质与目的，但却也有彼此差异的所在。因此绝不能单纯的以“一体两面”的观念简单带过。

由以上的分析所建立的基础，我们可了解到五四与新文化运动虽然是两个不同的运动，且各具其特殊的形式与活动进展，但却可以肯定其中所存有的关系发展，归纳与总结如下：

(一) 新文化运动的引发乃中国由于长期的衰蔽加上外力的压迫，使知识分子察觉到知识的觉醒与转变是国家的先决条件，基

本上它是源于思想上的行动，而五四则是中国由崩落到新体建立后，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所形成的一个新生力量，对于列强新的侵略引发出来的一种敏感与直接性的抗议行动。在其形成的背景与阶层上，新文化运动在五四前仍只是在知识层面的觉醒，而五四运动其实是全国普遍性的不满所累积而爆发出来的。因此它能得到全国的响应，也为五四后的新文化运动提供了群众基础。

(二) 不管是五四或新文化运动，其出发点皆是出于爱国与民族觉醒。五四反帝国主义与军阀风气虽然是以对抗现有权力为主，但其对国家仍具有高度的认同，而新文化更是一种透过知识觉醒以达国家健强为终极目的的运动。不论是蔡子民的“教育救国”、胡适的“学术报国”或章士钊的“求学救国”等，都表现出爱国的情怀。因此基本上五四与新文化运动在目标上是一致的，只是在过程上有某种的差异和冲突吧了。

(三) 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冲击力对五四时期唤醒大众的自我醒觉是有其极大的影响。相对的，五四的冲击和影响也扩展及加深新文化的领域与范围。这使到五四的领导与知识分子更接近群众，参与政治，而造成日后知识团体的分裂。



五四意义的探讨

以民主与科学作为现代中国文化启蒙运动主题诉求的五四，虽然一直是知识分子讼聚的焦点，但到目前而言，对其做过深入研究者却并不很多。只有周策纵教授对其做过较周详与客观的探讨。周策纵认为：“五四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工罢市，抵制日货运动，以及新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各种政治改革和社会诉求。一连串的活动都是由下列两个因素激发而成的。其一是二十一条要求和山东决议案所燃起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一些知识分子所提倡学习西方文明，并希望由“赛”“德”二先生的观点对中国旧有传统给以估价，以建设一个全新的中国。它不是一个单纯不变，组织严密的运动，而是许多思想分歧的运动所汇合而成的，但它并非没有主流。”

毋庸置疑，周氏的定义确实详尽，但纯就定义的内容言之，它仍是有些许微漏。在此，个人尝试参考周氏的定义，并提出个人对五四定义的看法。但

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先了解，五四其实只是一个果而已，是错综复杂的思想因缘所孕育而成的。或许新文化新思想运动不过是其中的一项动力吧了，在五四事件爆发之前，可溯及清朝末年所累积的各方面弊病，它通由日本的侵略及对北洋政府丧权辱国的不满并裂而出的一种倾泄。它的发生重于内在因素，而非外在因由。当然，内部的牵涉颇广，实是不只包括西学精神、西方文化的冲击而已，虽然以上的原因固然重要，但我们却也不可忽略了中国人本身原有的性格，世界时势与风气的发展等现象，以致造成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这在周氏所著的《五四运动史》中似乎给遗漏了。

中国自嘉庆后由于内部体制的崩落，而导致外力的入侵，自此中国始终在列强侵略的阴影下。虽然间中有力图振兴改革的努力，如“自强运动”与“维新运动”等，唯大部份仍属局部与短暂的变革，亦未能普及民族之真正觉醒。因此对列强的侵略野心多有“帝国没落”的无奈。至民国初建，虽政局由统一而分裂，但不管在任何一方面都已注入了一股新气息。经济的逐渐成长，



工商阶级的崛起，新文化的冲击和觉醒，新时代的局势等等，此时的中国人已非旧帝国所能任意宰割了。他们是欲冲破牢笼的一股新力量，他们是敏感及不容许新侵略者的威胁和压迫，并努力在一股“再生”的契机中去肯定自己的地位和尊严。因此，对以往衰弱与崩裂的觉醒与面临再生的危机下，终于藉着日本强横的侵略意识及北洋政府的无能情况而公开爆发开来。

因此，对五四我们可以下如此的定义：它是个以学生运动形式出现而扩及全国工商、知识分子，并获得热烈回应的一个爱国运动。它的背景复杂，影响深远，在许多纷歧的思想运作之中汇为一股动力，并因二十一条要求和山东决议案而燃起爱国救国的情怀，并在知识分子的觉醒下，企图以民主和科学观点以对中国传统做一个重新的评估，而努力在拓展一条可以让中国富强的新路。所以，在此个人不赞同将五四视为学生活动来单独处理，也反对一味的将新文化运动当作五四，因为五四在实质上是整体的涵义，而非五四与新文化运动是一体的两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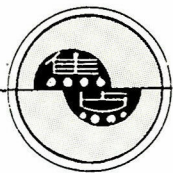
若回顾中国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许多与五四在某些方面极其相似的事件。由学生带领，批评或干涉政治的例子屡见不鲜，子产置乡校“议执政之善否”的精神，西汉王咸，东汉郭泰的党锢之祸，宋朝的学生运动更是泛滥，徽宗，钦宗时陈东的上书抗议，及其他五，六次的学运记载等，可见学生运动在中国是有其传统的精神存在。

虽然二千多年来，中国一直是君主集权的体制，但是知识分子一本自身的良知与团体的高度认同，历来一直承继着它的传统。唯到清朝，由于受到异族

的统治，威胁利诱，怀柔，文字狱大兴，知识分子本有的经世济民的怀抱与使命感也荡然无存，而纷纷遁身于考证之学，借以保身寄志，乾嘉之学风气由之大盛，而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与怀抱至此产生了断层的现象。至清体制的逐渐式微，在国家面临绝亡之际，西方思潮的冲击，遂使知识分子毅然再度扛起时艰，以呼应历史的使命。因此若就单纯的来审视五四的动机，我们也可从中窥见五四的爆发不单只是知识分子的觉醒，更可说是知识分子在历史精神上的一种承继，也是一种时代的超越。

再回头看五四爆发的那个时代，若依照中国历史上一盛一衰的循环发展，至民国初年时，正是嘉庆后即走向没落的局势，并近乎崩溃与混乱的情景。而这之前新文化和思想的冲击、经济的成长，民智的渐开，无疑的成为凝聚群众的助力。而五四的一个重要历史意义是在于它除了涉及知识分子外，也扩及工商民众的运动，是全中国人民普遍性的觉醒。它象征着这个古老民族的真正觉醒，在中国历史上是向前跨出的极大一步。只是后来的发展因被政治给引入歧途，而终致变质。

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上，五四运动可说是继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及辛亥革命等一波一波将中国推向前进目标的一个高峰。在整个历史的眼界中，它不只代表单纯的学生政治活动，因为它的影响是多层面的，它的形成也是多种因素。它代表中国现代化运动由坚甲利兵之技器转而倾重于政治制度，而后又转于注重文化思想的发展。这种期望从知识的觉醒与转变中获得国家进化的思想，在“科学”与“民主”的两大口号下，压



■雪华青于1989年5月4日举办座谈会纪念五四运动，邀请（左起）赖兴祥、李万千、陈亚才与祝家华针对《五四历史的脉搏在跳动》发表演讲，中站立者为主持人黄志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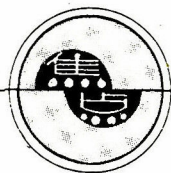
根的对中国传统文化掀起一股全面性的省思、批判与改革，不管它是一场梦魇或是一个希望，在中国的历史上，五四在文化意识上所产生的极大影响实有其重大的意义的。

五四的影响

本文也将在此探讨五四运动的影响，唯因五四虽立意单纯，但其成因牵涉颇广与复杂，影响面也非常广泛，若一一举例未免赘累，而且必有漏失，故本文将只就某些较主流和明显的影响加以讨论，而不打算做全面性的介绍。

- (一) 学生运动的泛滥：虽然后期的五四运动在发展上已成为全体知识的共举，但对运动而言，最重要的还是北京里的大学生。因为他们开启了五四广泛的学潮，带动后来知识界的直接参与。而这批运动先锋却成了受运动影响最直接和最深大的一群。在影响上可谓产生了多重相对的效果。就正面而言则是引起学生的自动精神，对

国家局势的关注与关怀，提高写作、演说与组织能力，使学生增加团体生活经验及求知的欲望。这些都是旧日课堂上所不能产生的。但另一方面，五四后的学生因初尝胜利的滋味，“学生万能”的观念既因此而形成。确实，从事运动本来就很难维持理性，尤其是天真、羈气的学生本来就易流于理想化、主观及感性和不切实际。因此五四后又接连出现了许多的学运，大学生动辄罢课，往往为一两件无关重要的事情而搞学运，以致五四时慷慨赴义的情怀与精神已荡然无存。胡适对这种现象颇感不满，他曾在北大的一场演讲会中慨然指出，北大的学年考试，居然没有留级或降班，这简直是北大的耻辱。蔡元培对学生因政治活动的冲击而误课深感不以为然。此时的学生也已忘其本份，取而代之的自大心理很快的便使学生成为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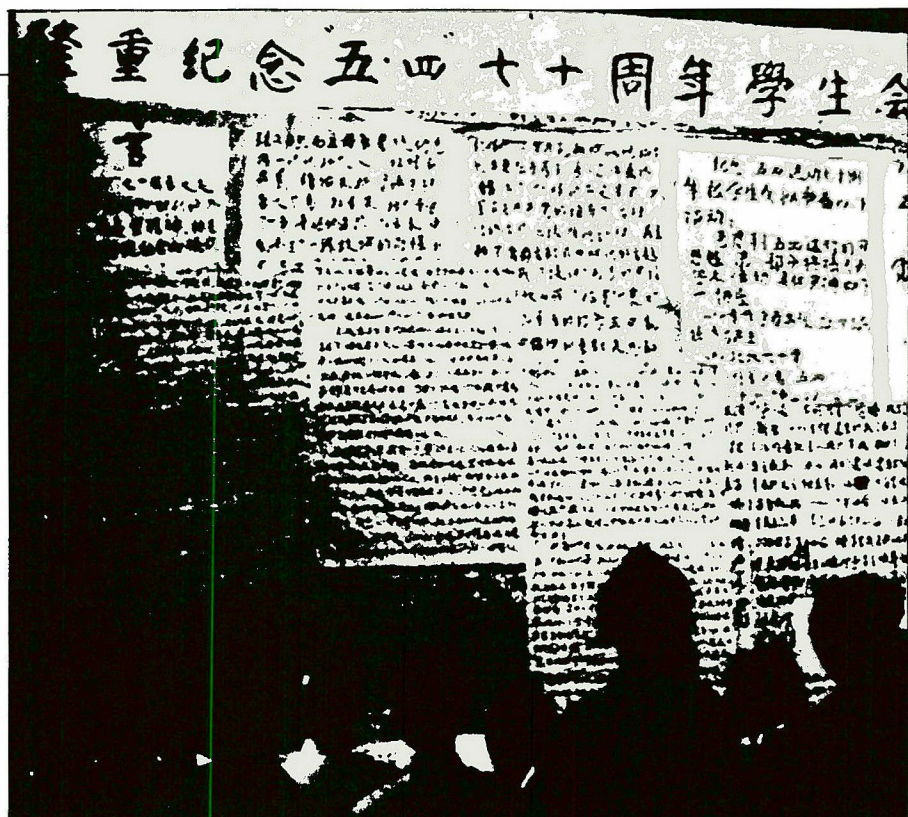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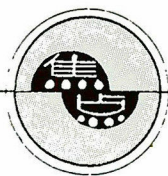
社会的特权阶级。也因而失去群众的同情与支持，使得后来的学运均未有结果。

- (二) 学生组织的茁壮：学生组织早先是经由蔡子民在北大时鼓励学生从事正当课外活动时所形成的。当时的大学生已能在组织中培养基本的独立思考、行事能力，进一步对社会的认知、关怀和责任的担当。这影响到往后五四时的动员。基本上，五四时进行游行示威和罢课期间所创立的学生团体，只是临时性而已。在后来六至十二个月内就解散了。而那些学生联合会却一直继续存在，且成为学生参与校务和改进学生利益的团体。此外，五四以后，许多学生所组织的文化知识机构包括中国哲学会、新教育共进社、社会主义研究会、罗素学会、共学会、尚志学会等等，皆在教育、文化、政治、经济及思想方面有过非常大的贡献。后来中国的许多政治领袖，不管左派或右派都出自这类社团。而很多政治或半政治性的团体也在五四后成立或扩展，不少学生被吸收进去，后来这些组织的学生或创办人都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物。

- (三) 新出版刊物的急速增加：中国新闻出版业在 1917 年至 1918 年间曾有一些进展，不过在五四之前，多数刊物在内容上还是相当的古板，千篇一律，且大部份为文言文。胡适即曾感

慨的说：“中国的出版界从 1912 年至 1917 年简直没有二、三部可以看的书。”可是在五四之后，中国的出版业起了极大的变化，半年内约有了四百种白话文的新刊物出现。有些在五四前就有了，有些则在五四之后才出现。虽然这些刊物很多是应潮流而出现，却只是昙花般，旋开旋落，这其中当然也有很多是长期发行且影响甚钜。新的知识和资讯也由此而传达及扩布到一般知识分子和识字的群众中去，并成了知识界互相呼应的桥梁。也惟有通过这些大大小小的刊物中，五四运动真正的精神才能扩散到全国各地去，它的影响可谓是无远弗届。

- (四) 文化的冲击：五四另一个影响便是对中国造成思想与文化上的双面冲击。在五四前即已开始出现的新文化运动则在五四之后，由于得到更普遍性的认同而愈加盛行，因而使之获得“新文化运动”的名号。蓬勃发展的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以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理念，接受西方文明的思潮来评估传统，而形成所谓的“泛科学观”、“科学主义”、“反传统主义”等。虽然，五四后的白话文从此确立，平民教育也普遍推广，但在另一方面，也使儒家权威和传统伦理观念受到严重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丧失了在中国文化中做为主体的意识，而陷于



■1989年5月4日，
北京大学生举行五
四示威游行前，在
校园内观看大字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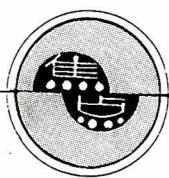
文化的自我疏离中，使得任何克斯主义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悄悄的潜入当时较激进的知识分子心中。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人们对五四与共产主义之间会有一种敏感而又尴尬的情怀与争议的原因。

- (五) 五四运动的影响如在政治方面，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兴起，对中国日后政治发展有着其决定性的影响。比如中国共产党的出现、国民党的改革、北伐的成功、统一的完成等，或多或少是拜五四所赐。社会方面，各阶层的觉醒也是使各种社会运动改革迅速发展的重要助力之一。又如大学教育的改革，也是在五四之后才有所改变的：像脱离宗教而独立，正式招收女生等。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学术真空，学生思想

分歧、学风松散等弊病。这相信是许多学者与知识界所能预想到及所希望看到的现象吧！

五四的评价

像许多伟大的历史事件一样，五四给人的昭示也完全不一样，而人们对它也有不同的理解和评价。有的是诠释学上的歧义，有的时代感受、学术旨趣和思想倾向的隔膜或对立。我们不敢断然判决对错。然而以这样偏于某一方面的倾向来论断五四，往往不免给人一种主观而缺理性的审察。或许今天我们在学者专家的论述堆中重新评议五四时，可以避免重犯前人的主观漏失，但另一方面，也仍无遁逃于某些限制。虽然比较短的历史距离与资料的广积有助于这方面的研究。但七十多年来重要的史料并未完整及客观的整理出来，有些尚涵蓄着个人的主观情绪和某种目的成份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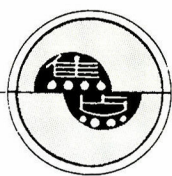


素，因此，在做评价上则显得吃力不讨好。唯个人不辞浅陋，尽客观的为五四运动下评价，以期让历史回归历史，并让历史为自己提出一个思考的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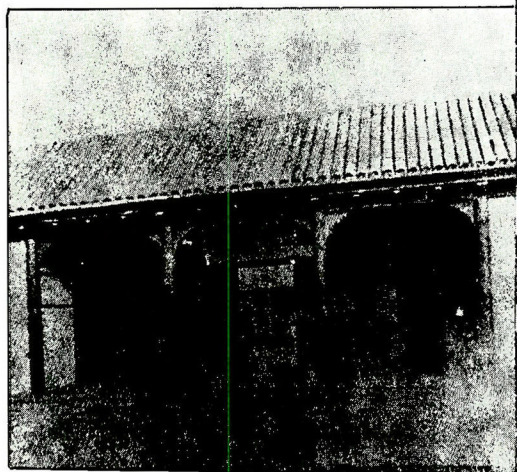
对于“五四”，胡适认为它是知识分子从事人文主义或文艺复兴的运动。而有些知识分子则拿五四与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相提并论。以上是知识分子的观点来探视五四。而党派的出发点则党曾赞扬五四的爱国表现，但对于过激的新思潮与学生运动，却不予苟同，尤其蒋中正更曾极力批评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在文化和思想上的堕落。而毛泽东则完全认定五四是“反帝”与“反传统”的联合阵线，由无产阶级领导，确立共产党的基础，并朝向“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次伟大成果。至于曾是五四运动领导人的罗家伦除了强调“外争强权、内除国贼”外，五四真正的价值乃在学生勇于牺牲的奉献精神、社会裁判与民众自决精神的阐扬。而五四的精神导师及被吴稚晖誉为“完人”与“通人”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则视五四为一场大洪水，并肯定了正面积极的价值。对于前述的论决，我们不能完全加以否定，因为它真实的反映某一群体中的观点。今天在评定五四时，我们理应对各种观点的评价有所了解，这样才能秉持五四时期重估一切价值的精神，以冷静的眼光、理性的态度来面对它，并予以其所应有的评断。

其实，综集所见，不难发现五四运动最直接最明显的发展表现是在政治方面。也就是学生的爱国运动。对于这些学生的行动，基本上个人对它的评价所持的态度是同情的、是肯定的。但在肯定中也是有所批判。首先个人是相当赞同学生基于爱国情怀所举行的一连串示

威与游行的活动。但却不同意学生过份及形式化的当做一种满足一己的欲望与达成本身的诉求工具。当然，在那样的局势下学生能有此表现至少证明学生的心是活的，是具有“救国救民”的使命感。但在某一方面而言，个人不得不同情那群学生；因为他们所处的实在是一个充满着思想矛盾的时代。一方面强调的个人自由、思想解放，但另一方面他们则必须框套在爱国和民族主义的圈围内，而寻求表现；表面上它强调科学、推崇理性、但实际上它又是一个热血沸腾、情绪激荡，并充满著浪漫情怀的时代。因此，学生在运动上是胜利了，在精神上却是失落和无助的。因为决然斩断传统，学生们仿佛再找不到一条可以回家的路，在此，则陷学生面临抉择上的危机，这危机延续至今，仍是无法解结，张灏称之为迷失自我的意义危机（The Crisis Of Meaning），而当时学运的胜利，使学生产生一份自我膨胀的意识，以致他们的行为泛滥而节制尽失。五四事件只是突发性的，实质上学生根本就没有一个实现、明确的目标做为长期努力的依据。而当时的知识界更无法给学生一个满意的答案和慰藉。因此，消极与不合作的辞职，无法唤回学生的理智；而理性的“执事者各司其事”，“闭门读书、不管闲事”又岂能在学生的心中产生共鸣？最后许多学生认同了激烈的左派或右派的民族主义，这许是他们在众多要求的不满足之下而不得不选择上的一条路。但学生运动也就变了质，因为政治的渗透，早期五四时的独立精神与思想特质也就消化并荡然无存了。对这样的结果，我们固然毋需怪责学生或知识界，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时局，就是充满着许多的问题与危机，



■1919年发生五四运动时的北京大学外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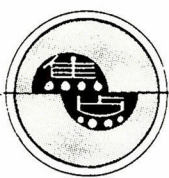


大环境使然，只要是当中的一份子，便无可避免受到时代潮浪的冲击而做出这样的抉择了。

另一方面，五四的重要精神是思想的解放，弃传统并创造新的现代文化以救国。其表现在外的是学生的运动，但内在却透过文化入手。基本上五四在文化思想上所提倡的并非全新的理念，如“民主与科学”及“白话文学”等，在此之前皆有人提倡，而五四的价值乃在于它所表现思想的创造精神与知识界及学生群的真正觉醒！这是整个运动值得肯定的地方。它为中国文化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纪元。但可惜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当时并未真正认清中国与西方，换句话说，在思想上他们觉醒了，但在对西方的认知并未具某种程度的水准，因此他们虽然看到了中国的病征，且试图用西方的药方来医治中国，然而由于他们对病理认知的浅陋，再加上缺乏科学、社会学、人文学与心理学的扎实基础。

因此开出来的处方也就显得简陋，如余英时说的：“把外科病当内科病来诊断”自然无法有效的解决问题，反而在反传统，弃儒叛道，造成中国更大的伤害。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体知到，当中国文化面临西方文化空间的挑战而处于弱势时，知识分子是应该对自己的文化作一番深切的反映与检讨，有基于此，五四知识分子对传统制度，文化所持的“一切重新估价”（Trans-Valuation）底态度是值得予以肯定的。问题是，重新评估是彻底的推翻；反省与检讨也不是全盘的否定。不可否认，并非传统的东西就不好，那么，全盘否定是否有所必要呢？此外，我们也必须了解，晚清以来的局势相对于中国历史而言，它毕竟只是代表一段特殊而有限的经验！是否能把中国所有的挫折都归咎于一时的低潮，这是很值得商榷的。若我们放眼世界，看看传统与现代文明在世界其他



地区所产生的关系，那五四所代表的立场也未免狭隘与违反它本身所强调的自由主义思想了。

但不管怎样，今天我们再回顾五四，虽然了解它存有某些的瑕疵，然而将其放大并置于历史的眼界中来看，它的贡献是肯定的，并存有其时代的历史意义（History Of Meaning）。或许可以说五四的发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它所代表的是一种历史累积性的结果，若以宏视的历史观来看，五四可算是一波一波浪潮中较高的波涛，这股波涛或许摧毁了某些东西，但也带来了某些冲击。如同每一件伟大的历史事件一样，那是必然的过程，但五四运动却包含着更进一步的历史意义，也就是自先秦诸子百家学术风气自由开放以来，中国历史文化再一次被推上另一个高峰，更新了中国文化的纪元。因此，不论如何，至少单于这一点就值得我们推崇与肯定了。而它所点燃的火花与所开创出的起点，更是我们应加以发扬与延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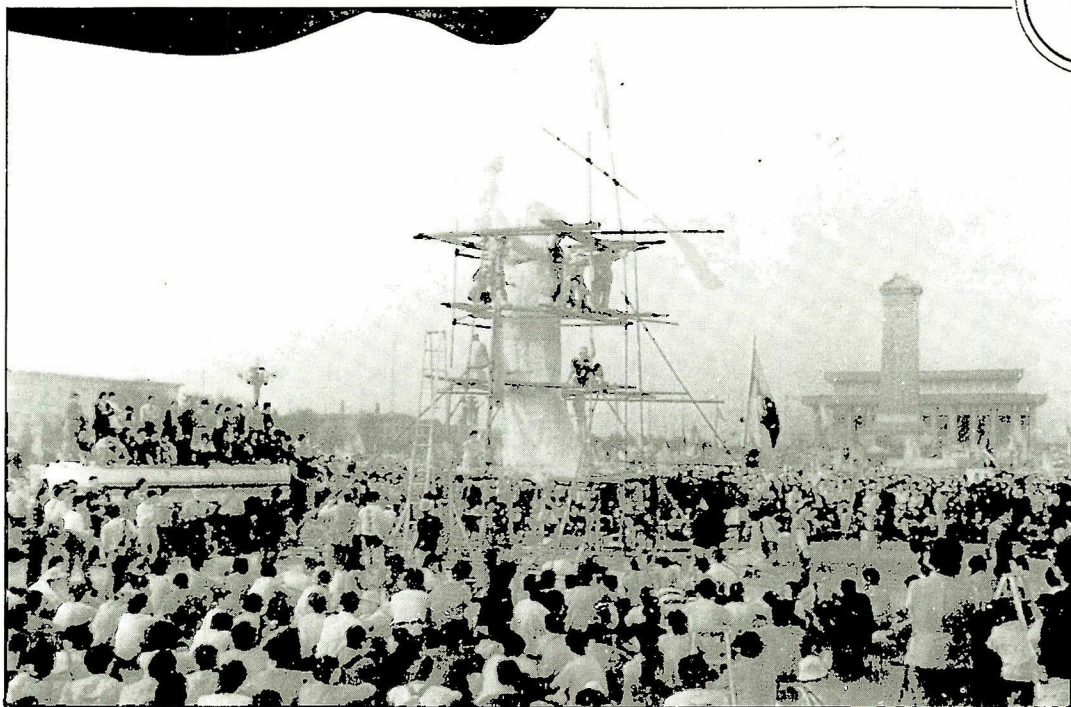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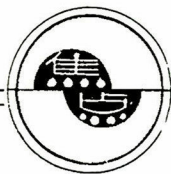
结论

七十余年了，当我们回顾五四，并对它的整体面貌作一番探讨后，对这曾是中国迈向现代最悲壮的尝试，它的本质、意义、影响和评价，我们都有相当的认知后，再躬身自问：到底五四的精神、诉求、理想到现代已是实现了呢？还是退步了？到底现在与五四比起来，那些已然改变，那些依旧不变？在此本人将做一个初析以检视五四后的今天，历史将给这个时代一面怎样的镜子，而照出一片怎么样的社会与文化面貌来。

与五四比较，七十余年后帝国主义算是完全清除了。毕竟五四的基本动因

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力谋自救，并为自救寻求奋斗的方向。“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就是五四最直接的诉求，七十余年来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的桎梏已解，在国际的地位上已取得对等的地位，至少就“外争主权”而言已达到五四的目的了。另一方面，因受到民主思潮的影响，五四知识分子及教育家无不致力于平民的教育，承袭晚清开启民智的运动，如蔡子民力倡社会教育，胡适的白话文学，这都是平民教育的推广者。而今天，白话文已取代文言文为传递知识和讯息的工具。……而共产党的无产阶级革命信条，与国民党在台湾的教育普及措施，已落实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至于1989年中国的大学生为纪念胡耀邦并抗议中共当权者所引发的六四天安门事件中，学生充分的表现出了其相当理智与成熟的认知，它的诉求如：扩充教育费、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平等、公布领导人薪资。陈义不高，但却句句扎实，与五四时期学生所提出的不合理改革议题比较起来，算是进步得多了。

而反过来，做为五四诉求之一的科学与民主，则因知识分子对其本质和精髓认识不深，导致二者在中国的发展中显得坎坷，甚至遭受到曲解与误用而对中国造成相当的破坏。例如民主在中国的发展便曾受到马克思主义的传入而遭到扭曲，而民初的内忧外患，国家主义的盛行，便使民主受到扼抑。而科学虽被五四的领袖当着信仰，形成所谓的科学主义，唯破坏多、建设少。七十余年来，科学的本质已较为受到真正的了解，而且也较有进步，只是民主则似乎仍有许多崎岖的路要走，尤其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而台湾目前则进入民



■1989年发生六四惨案前,会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大专学生。

主所谓“阵痛期”，二者在中国或台湾而言，仍然尚需努力。

至于在学术方面，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和学术自由等风气已不复当年的盛况了。在今日，不论是台湾或中国，可谓政治主导一切，教育很明显得成为政治宣扬主张与思想的附属品。教育的发展，学术的趋势，思想的潮流或多或少都受到政治的牵制。这也不得不归咎于中国近代史上共产党与国民党彼此的权力斗争，在此斗争下连教育思想也被罔顾。五四的面貌被扭曲和利用。相信这可能是一心提倡教育独立，学术自由，并认学术的目标是永恒，而政治目标是短暂的蔡元培先生所不欲见到的吧！

在五四运动时期，热情与充满着理想情怀的大学生在面对恶劣与无能的政府时，在他们的背后有一位风骨 及有担当的精神导师。蔡子民先生鼓舞了学生，并成为学生的后盾。此外学生还得到了一批学者如胡适之、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在背后的声援。但发生在198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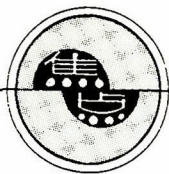
6月4日的天安门事件就没那么幸运了，当时没有任何一个学者的声望、地位和学识足以庇保学生，而公开表示同情学生的也很少。在缺少全国的响应和支持，及舆论和传媒在一言堂的情势下，学生不只随时面对死亡的恐惧，更苦闷的是言论的禁闭。因此，在与五四的比较上而言，六四确实令人不得慨叹不已。

75年了，隔着一段时空的距离，去掉一切热血沸腾的浪漫情怀，再审视五四，对这立意单纯，成因复杂和影响深远的活动，个人希望在做一个回顾的同时，能客观的将历史归还给历史，由历史亲自说话，还原自己的本来面目，以及为自己寻求一个定位！



(完稿于1994年3月25日·台北·金山)

(注释从略)



也爲了紀念“

——论台湾文学和马华文学 与中国新文学运动

■安焕然

一、为什么纪念“五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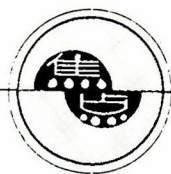
像过往一样，一年一度“五四”的到来，人们总不免要对它议论一番，各报刊杂志也如同往年一样纷纷推出了一年一次的“五四纪念专辑”，人们又开始在那一天热热闹闹的招那已历了75年的五四之魂。然而在这已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距离中，对五四运动的意义的诠释，至今仍是不少知识分子聚讼的焦点，而对于这大半世纪以来人们的“纪念五四”其中潜意识的义涵或许是更值玩味的。

五四运动时，有人揭露了“吃人的礼教”、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但后来却又有人提出了“整理国故”的呼声。提倡西方“新”文明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推崇西方民主自由与理性精神，但后来却又趋向于集权的共产主义之渲放。于是自由主义者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或启蒙运动，但亦有人认定说五四是一场共产党徒的公然大暴动，而又有人说五四实是一场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也因此，蒋介石说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实在

是太幼稚、太便宜、而且是太危险了。”而毛泽东则认定五四是一个由无产阶级所领导，确立共产党的基础的反帝、反传统的联合阵线。种种的诠释，莫衷一是，甚而吊诡的出现两极的评价。

然而“五四”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而后人纪念“五四”，又为了什么？张灏说“如何重建中国文化”是五四知识分子迫切而实际的中心课题。若以此为据的话，其场景则是明显的指向“中国”的前途上来的。如此说来，这场“中国事件”又与大马及台湾有些什么相关性存在呢？此二地的人们又为什么常在某些时候要提及这在“中国”的“五四”呢？

或许，五四的影响才是促使二地的人民常思及五四之魂吧！但对五四影响的谬误，易使人陷入“主流/支流”的诠释游戏中，而矮化了自身文化独自性的发展特质。我们纪念五四，却甘心活在“五四”的“支”流中而不自觉。鉴于此，本文拟透过台湾文学与马华文学的源起发展之探讨，检视此二者文学特区与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否存在著所谓的



五四

的源起 之关系



“主流 / 支流”之关系。本文所探讨的台湾文学之时段是以 1920 年至 1945 年日据时代的台湾新文学为限，马华文学则是著重探讨其战前至 1957 年独立前后的新文学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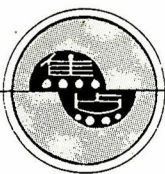
二、台湾新文学的源起发展与五四新文学运动

讨论台湾新文学的源起，不应以战后，1945 年国民党政权来台为起始，也不是因近来所谓“台独意识”高涨，为政治目的所突然制造的，其源起应上溯从台湾的日本统治时代谈起。如同吾师林瑞明教授所说的台湾文学整体性概念的成立，“不是始于 80 年代，而是在日本统治之下，随著 30 年代左翼文学的反殖民体制而发展出来的具有独立性格的概念，以区别于日本文学，虽然以汉文书写，但绝非同一年代发展中的中国文学所能概括，主要理由在政治上台湾不属于中国。”因此欲讨论台湾文学的源起及其性质，就必须注意到其所背负的历史复杂性，亦即它是在日本殖民统治下，以汉人为主所产生出来的文学特

区，实有其历史的特殊性本质。

第一次大战后，各地掀起世界性的民族自决主义的浪潮。波及远东，1919 年 3 月有朝鲜人发起的独立运动“三一运动”，旋即 5 月在中国，有澎湃的“五四运动”之发生，而在日本，则正弥漫著一股“大正民主思潮”。在此世界性的民主及民族自决浪潮下，处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人民也就兴起了一股新兴的文化思潮与社会运动。如同河原功所说，此时期的台湾社会运动，是“接受来自中国大陆、日本内地，或者世界性倾向的无政府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影响”而形成的。而台湾新文学的出现则在此新文化的社会运动中，占有极重要的份量。

1917 年胡适于《新青年》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掀开中国新文学的序幕，1919 年五四运动后，它更形成一股有力的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浪潮。台湾新文学的源起，与此中国新文学运动有著密切的关系。台湾新文学可谓始于 1922 年，是跟随著新文化运动的展开而来，而起初则是以介绍中国大陆的“文学革命”给台湾的形态传来。但是当时



处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要接受中国大陆的资讯是比较迟缓的。因此对中国五四新文化思潮的传入，除由少数在中国念书的台湾人传送外，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气息之所以传送台湾，却是透过当时在东京的台湾人留学生组织“台湾青年会”的机关杂志《台湾青年》而开始的。1922年1月陈端明在该杂志的第四卷第一号发表〈日用文鼓吹论〉，首倡用白话文。

1923年从中国大陆目睹白话文运动蓬勃发展的黄呈聪，回台后，于《台湾》第四年第一号发表〈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和黄朝琴的〈汉文改革论〉（同杂志第四年二号）二文，掀开了台湾文学史上的“新旧文学论争”，使台湾新文学成为一场实际的运动浪潮。中国新文学的理论也开始于此时被介绍来台湾。并以为“推行普及国语（以标准语写的白话文）以统一方言，启蒙民众才是改革台湾社会的急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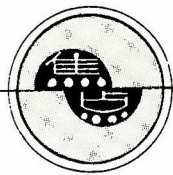
1923年《台湾民报》创刊，更扮演了此文化的启蒙的一环，把中国新文学直接引进台湾来。许乃昌于《台湾民报》第四号发表〈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一文，首次将胡适的“八不主义”、陈独秀的“三大主义”介绍来台。而真正主张建立台湾新文学应以白话文为写作工具的，是当时在北京求学的张我军。张我军模仿胡适的“文学的国话，国语的文学”，乃提出“建设白话文文学，改造台湾语言”的口号，并于1924年展开了“新旧文学论争”。此时期《台湾民报》更大量转载当时鲁迅、郭沫若、胡适、冰心等中国大陆作家的作品，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台湾新文学之萌芽。20年代出现了赖和、杨云萍、张我军、陈虚谷、杨守愚等大抵是以汉文写作的台湾新文学的

第一代作家。

故台湾新文学的萌芽与五四的中国新文学运动，是密切相关的。如松永正义说的，此时期（1923-1930年）的台湾现代文学萌芽期是“在大陆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之下，形成使用白话文（口语文）的文学。”但在这里，应当注意到的是，当时的台湾知识分子都曾受过日文教育，对世界文学的资讯亦都较易从日文，以及留日学生中直接吸收，故台湾新文学的发生，其影响来源是多方面的，甚至有学者以为其源头，不只是中国大陆五四新文学运动而已，而是一个“世界主义下的台湾新文学”。不用日文写作，而用白话汉文创作，或许其中蕴涵著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人，其文化的基盘是以汉文化为主体，相对于殖民宗主国的日本文化，所带有的一种内在抵抗精神所致。因此1920年代以汉文创作的台湾新文学萌芽期之文风形式，乃比较倾向于当时的中国新文学。

但台湾文学有其独自发展的特性，以北京话为中心的“白话文”，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而言，是忽略台湾现实的。1930年代后，日文教育更趋普及，北京的标准“国语”已不能支配台湾的特殊政治环境。1930至1931年，黄石辉在《伍人报》〈怎样不提倡乡土文学〉，郭秋生在《台湾新闻》发表〈建设台湾白话文一提案〉，掀开了台湾乡土文学和台湾话文运动。他们主张“屈文（标准白话文）就话（台湾话）”，并批评“屈话就文”者是“事大主义”。黄石辉说：

“你是台湾人，你头戴台湾天，脚踏台湾地，眼睛所看的是台湾的状况，耳孔所听见的是台湾的消息，时间所历的亦是台湾的经验，嘴里所说的亦是台湾



的语言，所以你那枝如椽健笔，生蕊的彩笔，亦应该去写台湾的文学了。”

此文所明显标示的“台湾文学”，已被学者喻为是“台湾新文学的独立宣言”，而且也是“使30年代的台湾文学，逐渐地从中国的文言文与白话文学中解放出来，而成为独立自主的文学体系。”

况且30年代后，日本皇民化政策更强化，汉文渐被禁用。以日文创作的台湾第二代作家如杨逵、龙瑛宗、张文环、巫永福、吕赫若等与20年代第一代作家已不同。他们受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较少，但却与日本左翼文坛联系，其中张文环、巫永福等东京留学生组成的台湾艺术研究会，积极汲取日本普罗列塔利亚文化联盟（CUP）指导下的文化集团各流派，其机关杂志《福尔摩沙》就是以日文书写的。台湾作家仍持写实主义的路线，揭露日本殖民统治下的黑暗面，及秉持其反抗之精神。日文创作的增多，乡土文学的提倡，也显示出“台湾的新文学开始从大陆的文学动向中脱逸出来了。”

三、马华新文学的源起发展与五四新文学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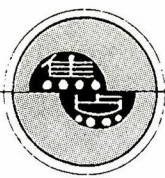
讨论马华新文学的源起，亦不应以大马独立为起始。方修等人对马华文学史的整理工作已颇有成就，而近来杨松年对分析新马文学作品所反映的知识分子的心态的探讨，亦颇有精辟的见解。讨论马华文学的源起，至今，研究者一般认为其源头应上溯从1920年代当时英国殖民下的马来亚谈起。

与前述台湾新文学一样，马华新文学的源起，与中国新文学运动也有著密

切的关系。其源起与当时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关。如方北方说的，当时“华侨社会受国内五四运动新文化革命思想的影响，也同样希望发生一场有如中国的五四社会革命运动。因此马华新文学萌芽时期，是深受中国作家的新文化思想所影响；同样具有反传统、反封建的精神。”

1919年10月新加坡《新国民日报》创刊，其副刊《新国民杂志》已开始出现一些具有新思想的白话文章，是为马华新文学史的发端。至1925年以《南风》、《星光》等新刊物为重心，更积极提倡新文学，致使马华新文学运动进入其初兴的扩展期。而尤在1927年后，当时在上海的郭沫若、蒋光慈等人所倡导的革命文学思潮（即“普罗文学”或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传播到新马一带，乃导致了“南洋新兴文学运动”的崛起，使马华文学的发展进入了第一个高潮期（1925-1931年）。而新兴文学初期的小说作品，例如林雪棠《一个女性》、呆伯《偷生日记》和忠实《笑纹与波光一样柔和》等等，其内容也多是反映当时中国北伐时代的东西。可窥马华文学的源头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渊源之深。

但马华文学也和前述的台湾文学一样，有其独自发展的特性。马华文学初期的作品，其叙事场景和关怀的对象虽显露出浓厚的“侨民意识”，但这时的“南洋思想”却已经萌芽，例如林独步《两青年》、李西浪《蜜花惨果》等，就是以南洋为题材的作品。而就在新兴文学的滥觞期间，1927年更有所谓的“南洋色彩”的提倡。首倡者是《荒岛》同人提出了“打算专把南洋的色彩，放入文艺界里去”的口号。以为“只要以南洋的生活，色彩为背景，努



力描写，大胆描写，一定能使南洋的文艺放出异彩。”尔后，又有“以血和汗铸造南洋文艺铁塔”、“创造南洋文化”等口号的提出，更明显的提出南洋文艺应有其地方色彩的主张。于是“南进，南进，发掘南洋的文艺的宝藏；南进，南进，开辟我们南洋文艺的霸业。”而张金燕、曾圣提、陈铨青、吴仲青等人的作品，大抵都以“南洋”为题材，尝试开拓具有赤道独特色彩的南洋文艺。

1934年丘士珍以废名为笔名，发表《地方作家谈》以及1936年曾艾狄《马来亚文艺界漫画》二文分别引起的文艺论争中，“马来亚文艺”、“马来亚文学”这类名词的出现，意识著“马来亚本位概念”的形成。1936年一樵（姚寄鸿）《关于马来亚文学的诸问题》中认为马来亚的华文文学最大弱点，是移民观念还未能完全清除，因此形成当地的文学盲目受中国文坛错误地引导。故认为马华文学应该是世界文学的一环，而不是中国文学之支流。可窥当时马华作家已有欲挣脱出“中国文学的支流”之端倪。这种追求马华文学的本地意识，虽然在1937年的抗战文艺时期，由于中日战争的刺激，侨民意识再度高涨，本地意识遭受挫折，但当时小红（吴文翔）反对用“抗战文学”的口号，提出符合本地实际的“华侨救亡文学”的口号，亦可视此马华本地意识的未曾断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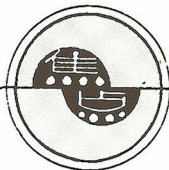
战后，1947年展开了“马华文艺独特性”的论战，强调马华文学应反映“此时此地”的马来亚的现实社会，指出马华文学应有它的独特性，其作品内容应以马来亚人民的立场为出发点。甚而讥讽当时所谓的“侨民作家”是“逃难作家”，而引来一场大论争。虽然“侨民作家”的势力强大，但土生及年轻的本地作家主张马华文学应该脱离中

国而独立出来，走出其独特自主的发展道路，是应合于当时新马政治社会发展之所趋的，以致“马华文艺独特性”的提出，在当时的局势下，无疑是场马华文学的自立运动，宣誓了马华文学要摆脱中国文学的附庸地位，与中国文学分道扬镳，而投注于马来亚现实的独立运动之中，是有其时代意义的。1956年有“爱国主义的大众文学”的提出，此爱“国”，已指向马来亚，而不是中国。

四、“支”流 VS “主”流

从上述对台湾文学与马华文学的源起发展来看，可知两者的起源均在不同程度上与当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影响有关，但亦均有其独特自主性的发展脉络。惟过去不少学者却过份强调了中国五四对台湾和马华文学的影响性，以致掉入“主流/支流”的诠释框架而不自觉，忽略了自身独特的本质，而自我放逐和抽离出自己的土地和历史（台湾或大马）之外，在那朝圣国的边缘地带徘徊著。

1945年国民党政权来台，结束台湾的日本殖民统治“光复”台湾，但新的外来强势却欲切断台湾日本统治时代遗存下的“奴化”文化，企图再造起“中国的传统文化”来。于是台湾的历史与文化再次被扭曲及断裂，似乎要人忘掉那一段“奴化”的年代，连带也要忘掉了那一段台湾人反抗“奴化”的岁月。于是承五四时代戴望舒的现代诗派，纪弦于1953年成立“现代诗社”，擎起现代派的旗帜，誓言“把现代诗的火种带到台湾”来，“领导新诗再革命”，其成就虽值得肯定，但却仿佛自负的以为日据时代的台湾似乎没有过现代诗的发展。1970年台湾正中书局出版尹雪曼编



的一本厚达五、六百页的《中华民国文艺史》，有关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部分仅是置于正文以外的“附录”部份。台湾文学不仅被认为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支流，而且更不过是那厚厚的“中国”的“附录”下小小的边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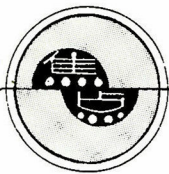
直至 70 年代末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中，陈映真以许南村的笔名，参与笔战，站在中国立场，认为台湾不过是中国的一省，强调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支流，因此所谓“台湾文学”即是“在台湾的中国文学”，以为台湾文学无所谓的台湾立场，说“台湾文学”是带有“分离主义”的倾向。无疑的，陈映真成了此“主流 / 支流”诠释游戏中的最佳演员。

同样的约在同时，温瑞安亦以中国本位的立场，在〈漫谈马华文学〉一文中，以没有中国文学，便没有马华文学，以马华作家是用中国文字写作等理由，“宣示”了马华文学“自决”无望。而原本是大马旅台生，目前已留居台湾的师大教授林绿在 80 年代仍重申他对马华文学的看法，以为马华文学这个名词本身就有问题。“严格来讲，用华文写的就是中国文学。”“假如有所谓‘马华文

学’的话，应该是整个中国文学的一条支流。”是故，相对于马华文学，也仍然有人在这“主流 / 支流”游戏中玩乐。

其实对于文学“主 / 支流”的争执，是“台湾文学的定位”和“马华文学的定位”的问题。而且其争执的开端，不是在独立后的马华，也不是近来“台独意识”高涨的产物。其争端及“自决”的呼声，在英国殖民地时代的马来亚和在日本殖民时代的台湾就已经产生，有其独特的历史和时代渊源。

如杨松年说的，马华文学的独特性发展，“其中的心理变化，不是突变的，而有它形成的发展的道路。”从英殖民时代南洋色彩、马来亚本位概念的提出，至战后马华文艺独特性的渲放，可知马华文学早在 20、30 年代就开始塑造其本身的独特自主的个性。而日据时代台湾文学，由于其特殊的政治历史背景（当时台湾在政治上不属于中国）也使其发展道路，虽然受中国五四运动和日本新文学的双重影响下，从主张白话文学到提倡台湾乡土文学，台湾话文文学，甚而用日文写作，却又有异于日本的“内地文学”，确也早在 20、30 年代



型塑出其自主独特的文学个性。其中的心理变化，也不是突变，“台湾文学”这名词的产生，更不是近来的“台独份子”、“分离主义”者所独创的。

早在1930年，黄石辉就曾说：“台湾在政治关系上不能用中国话来支配，在民族上不能用日本话来支配，为应台湾的现实社会情况，建设独立的文化”，乃不得不提倡乡土文学。而1929年陈鍊青也曾说：“我们观之北美，其殖民之历史与我华人相埒，可是他们到了现在，已经创造一种美洲特殊的文化了。我想希望南洋文化能够萌芽，总要努力来促成它赶快萌芽，更要努力来促成它赶快发叶，以至开花。”显示出台、马两地文学在此时，就已有塑造自身独特文学和独立的文化之强烈意愿。

1932年在东京成立的台湾艺术研究会，同时刊行《福尔摩沙》，在发刊词上说：“虽有数千年来的文化遗产，可是现在依然在这特殊情形下的人们中，到了现在还没有生产过独自的文化”。“所以同仁等常以对这种文艺改进事业为许，大胆的自立为先锋”，“从心里所涌现我们的思想及感情，决心来创造真正台湾人所需要的新文艺。我们极愿意重新创作‘台湾人的文艺’。”

而1929年曾圣提在《南洋商报》写了一则有关创办《文艺周刊》的广告词中，也说：

“这个刊物并无特别使命，她只想在万里炎阳的热带国，找寻一些土产土制的粮料，她虽不想找寻钻石与珠子，以饰其云石之宫，但她却情愿招募她的同情者，在同时（在）高椰胶树之外，以血与汗铸造南洋文艺的铁塔。”

“重新创作台湾人的文艺”、“以血与汗铸造南洋文艺的铁塔”，二者的心境是如斯的接近，均展现了在特殊的时

空背景和历史条件下，殖民地人民自决的呐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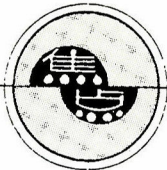
而且，与其说台湾新文学和马华新文学是中国五四新文学的一支，不如说三者都是世界文学的一环。这种自觉，同样也在20年代末期的台湾作家和马华作家中就已经意识到了。有“台湾新文学之父”之称的赖和就曾说：

“新文学运动，纯然是受著西学的影响而发动的……台湾的新文学，虽不是创作，却是光明正大的输入品，决不是赃物。新文学是新发见的世界，任各有能力的人去自由垦植，广阔地开放著，纯取世界主义，就是所谓大同者也。”

而1930年马华作家滔滔在《我们所需要的文艺》一文更清楚的表示：

“假如世界文艺思潮是波涛澎湃的洪流，那么，南国文艺便是这波涛澎湃洪流中底一条支流，方向是朝著这洪流去。而支流自身也有它的特质与颜色。这特质与颜色就是南国文艺的地方色彩的衣裳。我们不要忽略这儿的的地方色彩，更不要忘掉时代的方向。假使忘掉时代的篇章，便是没有生命的枯体，忽略地方的色彩，也只是过广的牡丹。”

况且，中国五四运动的产生，也是受世界思潮影响所致。当时世界各地正掀起著一股民族自决的浪潮，而中国留学生如胡适等从美国吸收西方的民主科学的理念，而鲁迅亦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其在日本时的新思潮的影响，由此说来，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也是在世界主义下发端的。是故，我们又何必要过度去强调中国五四的“主/支流”影响，而忽略了整个世界的时代脉动呢？甚而忽视本身独自性的发展特性呢？故从历史的角度看，台湾文学、马华文学与中国五四新文学“主/



支流”的诠释论调，实际上是有待商榷的。

当然台湾文学与马华文学因各自的“此时此地”客观环境不同，而各有异质，尤其是战后，大马独立，台湾则“光复”，成为中华民国之一省。但相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的地位又很特异，政治上的复杂，使其“台湾文学”的发展受到政治的扭曲。但有趣的是，若从“史”的角度来看，“台湾文学”和“马华文学”这名词的出现，均在战前就早已产生，并不是因为短视的政治独立企图，而是早就有其各自独特发展的脉络可寻的。

因此无论是台湾文学也好，马华文学也好，均因其各自复杂的时空背景的不同，其起源虽均与当年的五四运动有著密切的关系，但另一方面亦各自有其独立自主发展的特性。所以，诚如游胜冠所说：“不管台湾将来政治的发展是什么型态，与大陆将是什么样的关系，作为华人社会之一的台湾，可以有它独特的一面，可是也不必为了强调本土意识而斩断其华人的根源，否认所有与‘中国’有关的东西。一种世界性的台湾文化观，在排除受压迫的反抗情绪之后，也广泛地被提出。强调台湾的主体立足点。”

而林建国在〈为什么马华文学〉一文中，更说：

“显然‘支流’这个隐喻不适用，除非它指分‘支’出去自己‘流’。自己‘流’便有自己的命运，源头切断了还有天地带来的造化，可以自灭，可以自生，与‘主干大河’无关了。如果有所谓‘万流归宗’的说法也无所谓了，因为‘宗’有如死人牌位的供奉，‘万流’早已各自向前奔流，各自照应自己的命运去了。”

五、结语：纪念五四，走出五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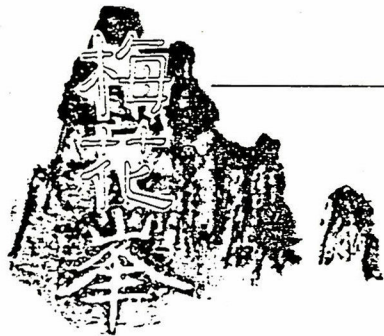
本文不是一篇专论五四的文章，但却尝试从另一个侧面，揭示台湾文学与马华文学的源起，虽与五四运动有著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同时也指出了台、马文学其存有独自发展的特性。更进而引申出“今天我们应如何看待五四？”的这样一个问题来。立足于大马，身为大马华人，我们为什么要纪念五四？五四带给了我们些什么？把台湾文学和马华文学作比较，探出二者与五四的关系，实给予我们不少的启示。

从文学史看，五四的确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马华文学的发展，但这不能简单的用“主流/支流”就能解释。台湾文学和马华文学的独特性发展是应当意识到的。

“五四”，这“反叛意识”的符码，在五四以后；一直被人重复召唤，于是戒严时期的台湾自由派学者，常常祭出“五四”以反抗官方的意识型态统治。中国大陆民主人士更在70年后仍还在高喊五四的口号：民主与科学。五四的魂已远，然而还有好多人还活在五四，有者甚至还在找寻“五四”。

当然，身为大马华人，我们应该学习五四精神，因为马华文化中有五四的因子，但整个关怀的对象却已不同。五四关怀的是中国，而大马华人所专注的则是我们的土地马来西亚。马华文学已不是中国新文学的一支，而是已经独立成长。马华文化更不应等同于中国文化，因为马华文化也应当有其独立自主发展的一面。今天我们虽然还记得纪念“荫”（或“阴”）影。纪念五四，走出五四。





■永乐多斯

殴妻之风 不可长



■永乐多斯

根 据调查，对女性施暴，其中包括乱伦、强暴、性骚扰、谋杀、殴打、精神虐待等案件，在亚太地区有增加之势，而引起人们普遍关心的闹夫案，台湾的杀夫案等，都是女性在暴力阴影生活下不得不

作的反击。

我们的社会已然要迈入21世纪，但是男女不平等，性别歧视的情形依然存在，女性没有得到应得的尊敬，享受到应享的基本人权与自由，这种不公平让女性悲痛，而身为女性喉舌的女作家，不论马来人也好，华人也好，都不断的在他们的作品中反映受害女性的命运。尤其时常发生在家中的“殴妻”案件，几乎所有作家都一致认为这种情形不应该再被忽视。

殴妻，在人类历史中存在已久，在今天的社会学、心理学的专书中，我们都能看到有关这问题的剖析与研究。在我国，殴妻问题日趋严重。根据马来西亚妇援机构（WAO）与受害者的对话看来，传统男尊女卑的观念，男女僵化的性

大脚小脚

／甄供

听

说，有人认为中国评论家在评介马华文学作品时，给予太多的叫好，是有“捧大脚”之嫌云云。

我想，如果我们的作品或作家都是“大脚”的话，有人要“捧”，就由他人去“捧”，不必太看不开。因为这么一来，倒也证明我们华文文学是不赖的。反之，如果是

一些“小脚”，为了冒充“大脚”，鞋里塞满了棉花，也拿出来给人“捧”，或者自己打肿了脚也伸将出去，这只能说被捧者的厚颜与捧者太缺少器识了。

马中华文文学交流的实际情况，我一无所知，不敢置喙。但有一个小例子，不妨提出来供读者参考，或许这有助

于理解“捧大脚”之所以产生的根源吧。

话说东南亚某国华文文学界某派的一些次要人物，他们趁着中国对外开放，捷足先登，把他们自己的和同派的作品推介到中国去。中国闭关锁国几十载，能知道海外华文文学状况，实在非常有限。所以，一接触到这些用华文书写的作品和资料，难免会惊叹，或为文赞美几句。听说当时某国华文文艺界有识之士都因之而摇头兴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所能掌握的资料日益丰富，他们的眼界就逐渐开拓，论述时也逐渐能把握全局了。

别角色的扮演，都是这问题背后的主因。

60年代马来女作家 Salmi Wanja 的长篇小说，对被殴打的妻子的心理有深刻的描写。这些妻子善良温和，持家带子，有一位甚至工作养家，但是在丈夫眼中，这些是应该的。只要他不开心，看不顺眼，那怕妻子再好，也是他的出气筒，马华女作家芸亦坐在她的长篇小说《渡越》，中，也有类似的女性人物的描写。只是那时代的女性，除了忍气吞声，将希望寄予渺茫的未来

外，都是无可奈何的过一日算一日。

女性的认命态度，到 Khadijah Hashim 的《昨夜风暴》(Badai Semalam) 中有所改变，小说中的女主人翁马兹妮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新女性，她的种种新思想行动，和她丈夫传统的脚步，不能配合，结果一晚马兹妮抱怨不公平时，他把她毒打了一顿。马兹妮的丈夫卡林受过高深教育，但是只要妻子不顺从他，他也一样用粗野的话侮辱她，把她打到得住院留医。

卡林事后虽然向太太认错，但马兹妮只原谅他，却不愿与他再生活在一起，他对她的不尊重，不相信，使她觉得这种婚姻没有任何存在下去的意义。马兹妮是被殴妻子中最清楚自己方向的女性。因此，她以脱离丈夫，自己独立生活来结束梦魇般的婚姻。但是世上有几个马兹妮？假如社会不严肃看待殴妻的问题，认为这不过是鸡毛蒜皮，假如人权传统男尊女卑的思想没有完全清除，假如男人认为太太不能与他平起平坐，一切得唯他命是从，假如男人认为权力才是一切，假如女性经济、思想、感情仍然不能独立，那么，不论社会多么进步，殴妻这现象还是不能消灭，而痛苦女人的数目，不会减少，悲惨家庭的气氛也永远不能改善。



实在不必在这面太过费神，重要的还是写出无愧于自己和时代的作品来。当然，严正的批评家及时的指陈也是必要的。



如果你要我举出实例来，我以为近年来中国评论界对台湾的现代派与乡土派论争的来由、历史背景，影响以及双方作品的评估，都作出了中肯，扼要的论述了，这在台湾本土上，好像迄今还没有人梳理过的。

马华文学是海外华文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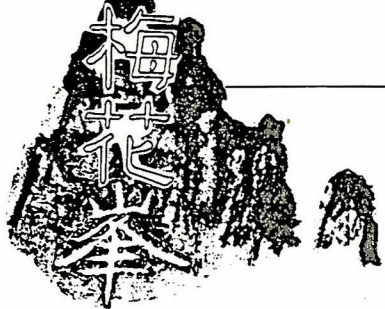
中最迟为中国文学界所认识，后者对前者的认识，还有一个过渡时期。当马华文学的历史进程还未被对方全面把握之前，就可能出现某些偏差或失误，这是可以理解的。所谓“捧大脚”的问题，是否可以提到这个层次来考察呢？

我认为有出息的马华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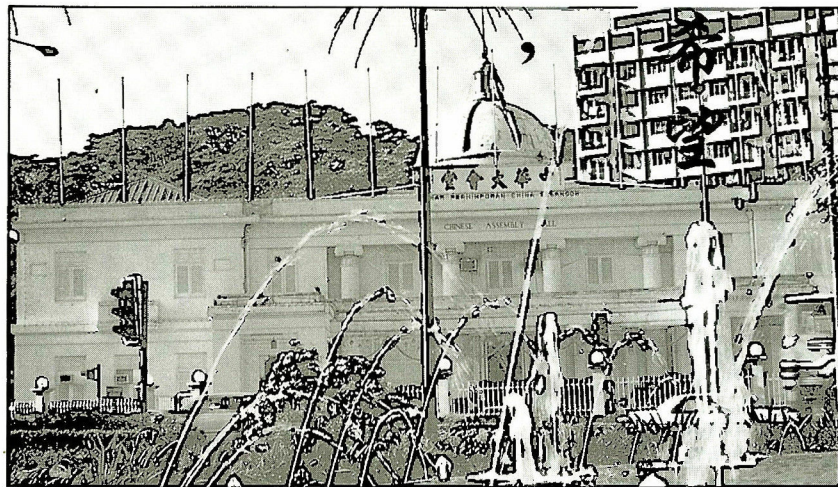
■ 阮供





刘锡通

一点评论，一点希望



近几年来，角逐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会长职似乎是隆雪工商总会的其中一个主要目标。原本华堂在工作上是比较偏重社会、文化、教育事务的。商会董事在过去都不会积极争着做代表进入华堂担任任何职位，其原因不得而知。可是这几年来情况却不同了，商会一些人确实对华堂会长之职表现得很热衷。这种转变是一项新的发展，大家都希望是一件好事，至少人们还记李延年时代，李延年先生一身兼任商会与华堂之会长，在同一屋檐下与其他的文教机构如董教总等合作无间，他对促进族群团结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其后商会

的另一些主要领导人加邱祥炽先生，张正修先生等在担任华堂会长时，更积极地推行了许多有创意，有实质，有方向的工作，使大会堂充满活力和生机，如制订华团宣言、成立民权委员会、资料研究中心、组织全国华团文化谘询委员会、妇女组、青年团等等都是在他们任内完成的，直到张景良先生出任会长，他秉承前任会长的工作，继续推展会务，为了使华堂经费方面自供自给，他领导华堂董事制定会所扩建计划，将会所冷气化，编印全国《工商指南》给华堂带来了不少收入，尤其在文化工作方面，他更是马不停蹄地全国奔走，文化节之能够在今天在多

地隆重地成功举行，他实在居功不小。

这次商会董事对雪华堂会长职表现得那么热衷，本来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可是事情发展到要劳动现任的商会两位正副会长出来参与角逐，而其背后又得各有一批有心人在推动，那就有点不寻常了。这与以前商会领导人出任华堂会长情况大有不同。当时他们都是在一团和气下众望所归被推选出来的，虽然没有竞争，但是他们的表现还是有目共睹的。这次华堂会长选举，商会很难掩饰分派之事实，加上石狮子的问题，使人联想到事情并不简单，有人猜测这次华堂是否已成为商会不同利益集团的角逐场所，要不然他们难道真的愿意将过去一路标榜的“以和为贵”的“协商精神”置之不顾而大伤和气？

平心而论，这几年来华堂领导人在好几项重要课题上与前任数届会长的理念，确实是背道而驰。首先，他们已不像过去一样与其他重要华人机构精诚合作。今天在同一屋檐下华堂不但与董教总疏远，同时华堂与商会之间也早有暗流。今天突然浮现出来了，其次，华团宣言被置之高阁，民权委员会已被腰斩，华资已被孤立并被迫须要从华堂后则男女厕所旁出入。这都在说明目前的领导人与过去的领导人在思想上与实践上已有重大的分歧地方。有人说华团宣言订立以来已有好多年了，这期间我国的政治气候已经有了许多改变，华社应该审时度势，重新检

讨，重新修订有关宣言内容。这些话都是对的，说起来也是铿锵有声，可是这几年来华堂领导人的举动又如何呢？何时才检讨，何时才修订宣言呢！同时又要怎样修订？这份严肃的宣言是否由几个人说要就要，说不要就不要，或是须要交回以前参与订立该宣言的十五华团或是廿七华团来讨论取决呢？我们希望新届董事会能在这方面认真考虑。除此之外，我们又听说民权委员会就算剩下三个人也能操作。这句话也没错，就像说四肢残缺，或聋哑昏盲的人也能生活的道理一样，难怪这一路来这三人只发表过三篇文告。其他活动都停顿下来了。其实民权委员会的任务并不是要向任何一方对抗，而是作为一个华人社会最高的团体，其领导人实在有责任给华人社会指引，并监督国家社会的机制以使它能健全发展。例如最近沙巴政局，那些背信弃义的议员今日可以标榜一个政纲去赢得选举。明日又可以跳槽到标榜另一个政纲的政党去。这种明目张胆的欺骗千千万万的选民不但得不到惩罚，同时还竟敢提出金钱的要求。议会中收容这些人也会降低身份和尊严，相信有良知的人都不会与他们认同。民权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及时提出意见和看法，甚至要求立法纠正。正如巫统在看到金钱政治泛滥的时候，提出立法防止金钱政治一样。以这种态度处理问题是不亢不卑的，绝不是一种对抗，作为一个华人社会最高的团体，如

果连这种基本的社会意识也没有，那么高谈积极提升文化素质还有何用？所谓“多做多错，不做不错”，其实就是“应做不做，不做才错”，不知华堂哀哀诸公以为然否？

至于在堂务多方面，如果只将主办文化节及扩建会所归为“两大任务”，我们真是看不出领导人怎样“显露”出各有千秋的不同领导作风。因为这两大任务已经没有什么新意。同时我们应知道文化节的活动只不过是文化的表层，更主要的是文化的实质，犹如绿叶须要牡丹居中坐正一样。所以说将举办文化节当成落实华团宣言文化部份的“最具体例子”实有言过其实之嫌。

几年来华堂的唯一新计划就是倡议建立图书馆。至于其目的是不是要与华资对抗，我们也不便于猜测。不过要将图书馆建立在离开吉隆坡几十公里外的雪邦，那就有问题了。我们知道图书馆是知识的宝库，而今天又是资讯爆炸时代，学习知识是刻不容缓之事，如果今天才开始申请土地，等到建好图书馆时，已经是十年八年了，再加上雪邦发展初期，人口必定稀少。图书馆不养蚊子才怪。换句话说建立图书馆之宏图至少在以后两任会长期间内还不能如愿以偿，与其让人空等，虚度好时光，倒不如尝试以下两种途径：

(一) 积极向政府争取在国家图书馆内多置华文书刊，因为国家如果要实现 2020 年之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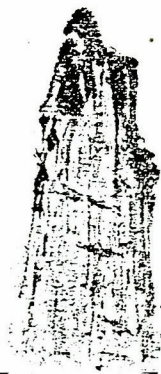
愿，政府必须要给人民提供足够的知识泉源，而这些知识泉源是可以由各种不同语文的书籍的，同时华人作为本国的公民，也有权利要求政府对待各民族一视同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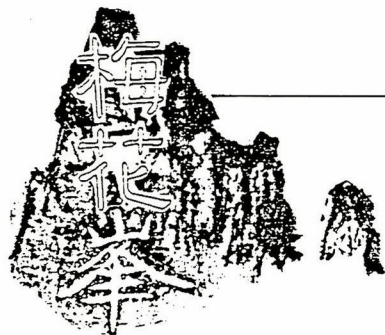
(二) 探讨各地华文学校或华人社团是否有足够的空间来举办区域性的图书馆，如果每一华人口密居的区域能够有一间学校或社团出来合作。华堂就应该筹资大力支持。各地区的图书馆在供应书籍方面可以互通有无。而资料研究中心则可通过其设立的书籍资料储存库，以现代的电脑来与各地区图书馆进行协调工作。类似一些先进国家设立区域性的图书馆一样，其效果是显著的。

上述建议只是个人意见，但愿新届华堂领导人能在更高的层次上替华社服务。确实地《开拓雪华堂新机运，昂首阔步迈向廿一世纪》。



■刘锡通





■张碧芳

弱势与弱者

/张碧芳

长期以来，女人一直都被视为是弱者。

有弱者，就必有一个相对的强者——男人矣。

在20世纪末的今日，现代女性大谈自我提升之类的主题，若不去区别何谓弱者，何谓弱势，并且找出一个客观而又公平的结论，即“女人是弱势，并非弱者”，尽管21世纪降临，女性在思想及精神上，依然不得解脱。

相信懂得驾驶的人，都遇过这样的经验——汽车从小巷（或转弯口）驶出，大马路的各种车辆川流不息在跑动着，根本没有机会让你驶入大路上，因此，你只好伺机“吃路”，寸步寸步的赶前去。

你清楚知道，你的驾驶技术不赖，汽车性能也绝对不成问题，只不过，由于环境或客观情况使然，就算技术超群，也无法真正施展驾驶本领。

这时候，为了脱离窘境（即小巷），你会要求改变，

这可以包括马路或交通指示牌的适当调整，或是期望那些受宠、受保护，在“康庄大道”上奔驰的驾车人士以同理心来发现及体谅你的处境，做出友善的举动（如放慢速度，发挥让路精神），以助你一臂之力，使彼此能齐齐上路。

成熟、讲理的人会有这样的认知——对方不是弱者或无能，而是，在外在因素的束缚下，他已成了弱势。

有志气、有自我觉醒的女性知道，女人不是弱者，她只是弱势。

以马来西亚情况来说，女人之所以是弱势，那是由于受到法律、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歧视和不公平对待所造成。

在性别歧视方面，我国联邦宪法第八条规定大马公民不得因肤色、宗教、出生地点的差异而遭受歧视，却未对性别歧视，或两性不平等对待的现象加以明文禁止。

另外，尽管我国奉行的是——一夫一妻制度，但在现实生活中，有不少男性以同居（即不注册）方法逃避法律漏洞，可“大小通吃”地逍遥法外。这对女性的尊严，根本是一种伤害。

在至今仍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女性的心声与权益，极不容易受到制度性的认同与肯定。早在七、八年前就已经被妇女团体组织喊得高入云霄的“反家庭暴力”案，至今仍未被国会通过。

这也意味着，我国妇女“不受肉体及精神蹂躏”的权利，至今仍然是沉睡着的。

女性在传统文化的歧视下，不知不觉地患上了“自虐症”，自视低（男）人一等，对于不合理的种种待遇，不是无限度的忍气吞声，便是阿Q精神的看成是一种“女性应有的美德”，使得生活尊严与权利变得陌生及遥远。因此，精神上的自我奴化及矮化，才是女性心灵的最大残害。

要扭转弱势，必须从制度及政治方面做起。不合理的法律，受忽视的权利，都应及早通过立法管道加以处理。

无可否认，思想的改变与突破，才是治本之道；女性本身有义务更努力审视自己在各个领域的处境，并具有道德勇气不平则鸣、据理力争，以破除长期贴在女性身上的“弱者”标签。

只有通过女性“自我意识的成长与提升”，“女人，你的名字是弱者”这句“名言”，才会真正从这地球上消失！

滥用新闻自由

岂容双重标准

/陈锦松

英国一些报章，诋毁我国领袖，指英国在吉兰丹援助的二亿三千四百万英镑的柏高水坝，和英国售卖十亿英镑的军火交易挂钩，甚至指一家英国公司曾建议付出五万美元予我国首相。星期日泰晤士报主编安德鲁尼尔也指大马大众媒介向政府低头，沦为政府的工具。

国内不少的评论都在替我国领袖“仗义执言”，反对党行动党由于吃过亏，曾因澳洲的报章报导澳洲特务在未得到联邦政府的同意和未照会政府的情况下，已支付马新两国的某些反对党成员数以万元澳币，使反对党面对极大压力。据澳洲 Sunday Telegraph 报导，澳洲特务组织以现款支付马新一些反对党成员已持续了多年，而有关反对党领袖在党内地位仍然低微时就开始接受款项，当其党内地位提升后，支付的款额也随着增加。在此事件上，反对党似乎没有得到“太大”民间的声援，一些内阁部长甚至表示要展开详细调查。

英国报章对我国政府的指责，反对党也“以牙还牙”的

表示应该调查事情的真相。他们并没有像一般人在未了解事情的背后因素时就几乎“一面倒”的去批评英国的媒体，而且还对西方的新闻自由表示置疑。

当人们不断攻击西方媒体的新闻自由时，我们担心原有新闻自由的精神是否会被刻意曲解。到底大马的新闻从业员在国内是否享有“令人满意”的新闻自由，还是仍然受到“令人不满意”的控制，而使媒体丧失其应有的权利与监督功能。

当我们的各语文报章、杂志与电子传媒的新闻从业员在厉声谴责英国报章时，是否也应该充份的反映我们除了不容许新闻自由的滥用之外，我们也不能接受新闻自由受到无理的控制。

有人建议我国政府对英国报章的诽谤应该直接起诉该报章，而非节外生枝，若以为可以通过英国政府向英国报章进行施压与控制，这是天真的。西方媒介自称是司法、立法、行政三权分立的第四权，他们岂容行政权去对新闻自由进行

干预。不久前大马的一家英文报曾被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起诉诽谤，结果获得庭外和解。该报并付出一笔不小的名誉损失赔偿金予李光耀。起诉英国报章是其中的一个途径，不能单靠外交的努力。当英国报章在法庭提不出有力的证据时，真相将会水落石出。

在反西方媒体滥用新闻自由时，为什么我们因“英国报章的对象是执政党”而情绪激烈，而对“澳洲报章的对象是反对党”而态度冷淡，难道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大前提下，我们可以有双重标准。西方媒体指责执政党就是滥用新闻自由，攻击反对党就不是滥用新闻自由？这点是我们要思考的。



■陈锦松





■ 马哈迪医生



■ 报业大王梅铎



■ 林吉祥



■ 安华依不拉欣

英传媒指首相贪污 政府拒受英商合约

针对英国传媒指我国首相马哈迪接受贿赂，“纯粹是无中生有”攻击我国领袖形象。我国内阁决定“不接受英国公司参与我国任何新的合约，尤其是那些由政府所资助的计划。”

这是副首相拿督斯里安华今日（25/2/94）在首相署召开记者会上，向约七十位国内记者所作的宣布。他也强调，政府采取这项措施，不会影响两国的关系。他说：“这并非是一项经济制裁行动，主要是在于表达我们高度的不满……这项决定将没有时限，而且我们也不会再在短期内

检讨。”

我国政府今天已经把这项决定通知英国驻我国的最高专员署。我国的决定，估计至少有三十五亿至四十亿英镑（马币约一百六十亿元）的合约将受影响。据悉，2月20日的《伦敦泰晤士星期六》的有关报导，是指首相拿督斯里马哈迪医生向 George Wimpey International 索取五万元美金，作为获取溶铝厂建设合约的初期报酬。

英国首相梅杰对于这项宣布，即作出即时的反应，要求我国进一步澄清。

反对党促政府 撤消制裁英商

国会反对党领袖林吉祥今日（6/3/94）促请政府，立刻取消“不让英国公司参与政府新发展计划”的禁令，以免损害大马人民和商家的长期利益。

他也要求政府立刻召开国会紧急会议，辩论大马与英国之间的纠纷，以及澳洲指大马国会议员接受澳洲情报局贿赂的事件。

他今日在国会以“国会尊严与国家正直所有政党国会议员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召开该会首次会议后，联同四六精神党主席东姑拉沙里及回教党代表，发表上述联合声明。

他说：“在大马与英国的纠纷以及澳洲指大马国会议员接受贿赂的事件中，存有多项疑问，当局应成立一个皇家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

森统治者 膺任元首

我国统治者理事会今日（4/2/94）在一项特别会议中，推选森美兰州最高统治者端姑查花为我国第十任最高元首，取代即将任满五年的最高元首苏丹阿兹兰沙。而雪兰莪苏丹沙拉胡汀阿都阿芝则被选为副最高元首。

这项讯息是副首相拿督斯里安华依布拉欣今日在亚庇对报界宣布的。他也说：所有九个州的马来统治者皆有出席今日在国家皇宫举行的特别会议，会议是由吉打苏丹主持。

森美兰最高统治者端姑查花也是现任副最高元首，现年72岁，为我国首任最高元首已故端姑阿都拉曼的次王子。殿下是在1922年7月19日诞生于雪兰莪州巴生。

霹雳州苏丹阿兹兰沙是在1989年4月26日接任第九任最高元首职，陛下将在今年4月任满五年。随着苏丹阿兹兰沙任满之后，我国所有九个州的马来统治者，都已先后轮流担任过最高元首。

马来西亚是由森美兰、雪兰莪、玻璃市、丁加奴、吉打、吉兰丹、彭亨、柔佛、霹雳、檳城、马六甲、沙巴及砂劳越这十三个州组成；不过，森美兰、雪兰莪、玻璃市、丁加奴、吉打、吉兰丹、彭亨、柔佛及霹雳这九个州的苏丹或统治者在1957年所达致的君子协议，我国的最高元首是从这九个州的世袭苏丹或统治者中挑选出来。①



■古晋第一中学

马华发爱的宣言 动员为独中筹款

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林良实医生，今日（19/3/94）向全体独中董事与师生，发表“爱的宣言”。他说：“我要告诉你们，马华爱你们！”他指出：“能够协助需要帮助的人，是最大的快乐。我要告诉所有独中的董事、教师和学生，我们爱你们，我们重视你们。”而马华的六十万名党员将在不久总动员，再次出击，展开另一项大规模的筹款运动，协助国内六十间华文独中的发展。

亚沙马华区会已响应为独中筹募经费，率先捐献十万元。②

（20/3/94）



■沈慕羽

朝野政党助华教 不应附其他因素

教总主席沈慕羽17/3/94晚在马六甲平民校友会的宴会上表示，他欢迎马华愿意协助筹募一千万元基金的行动。

他指出：董教总现在所走的是“人和”及“落实”的路线，要华教能够顺利开拓，就必须得到各阶层、各政党的支持，彼此间互相打交道，以便董教总的意见得以通过这种管道，传达到政府里去。③

（19/3/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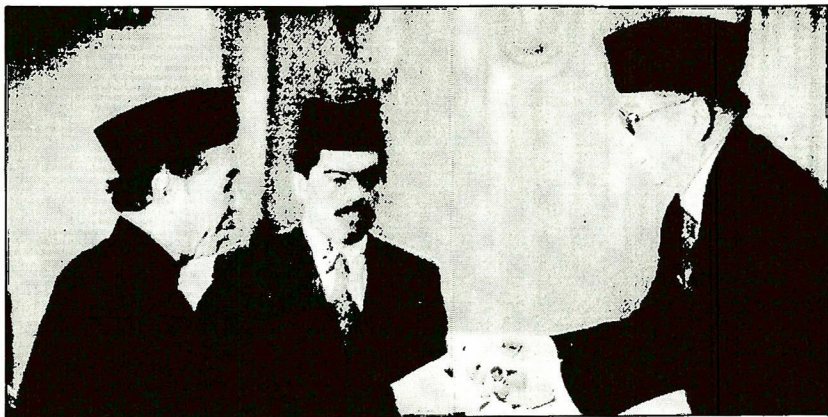
副首相安华吁学好华文

我国副首相拿督斯里安华今晚（3/3/94）在国际回教大学的共同开斋的晚餐会上，促进国人好好掌握华文，因为随着亚太地区的经济成长，华文已经日益占着重要地位。

他说，拥有数十亿华人人

口的亚太地区，经济成长迅速，它主导了世界的经济，因此，掌握好华文，将对我们无往不利。

这是拿督斯里安华担任副首相以来，首次在非华人的场合中提出重视华文的重要性。④



■丹斯里沙卡兰从州元首中接过委任状。

三议员跳槽国阵 团结党政权动摇

三名团结党州议员今天（12/3/94）宣布退出团结党，并矢言支持国阵，导致沙巴州的团结党政权岌岌可危。

这三名团结党州议员是克里雅斯区州议员，也是州文化、青年及体育部长拿督拉津奥京，格马邦区州议员鲁宾巴

朗（助理农业及渔业部长）及官委州议员拿督再尼（团结党纳闽区主席）。

与他们一起退出团结党的还有金马利区国会议员拿督汶尼曼。

沙巴州首席部长拿督斯里百林昨晚深夜召开一项紧急新闻发表会，谴责国阵领袖企图以金钱地位来利诱团结党州议员跳槽。

舆论界则认为这一来，沙巴州的政治局势已处于地震活跃期。



沙巴改朝换代 国阵上台掌权

沙巴团结党主席拿督斯里百林，今日（17/3/94）下午一时五十分，向沙巴州元首呈辞黯然下台。

沙巴国阵主席丹斯里沙卡兰，随后到元首府宣誓就任首席部长而于四时廿五分从州元首手中接过委任状。

沙巴州在这一段两句半钟之间，改朝换代，从原来的团结党时代进入国阵掌权时代。

拿督斯里百林呈辞后向记者表示，他的辞职，对他个人而言虽是悲痛的决定，但却是目前沙巴州这种局势下所应该做的最光荣的事。由于数天来，局势对国阵有利，他必须对这项发展作出光荣的反应。他表示，他是以坦然无愧之心决定辞职。而在过去九年间，他已尽了最大的势力为沙州以及沙州人民服务。



团结党大势已去 国阵将组新政府

沙巴州团结党风云变色，政治局势的地震不但连连发生，而且是山崩地裂。至今，该党已经有九位州议员、五名国会议员；州议会议长及一名上议员宣布退党跳槽国阵，因而使到该党组织的州政府面对倒台，政权易手的厄运。

获得多名团结党议员加盟的国阵，已经准备组织新政府。国阵将是沙巴加入马来西亚第四个执政的政党。

团结党主席拿督百林目前已经是众叛亲离，无法延续团结党的执政。团结党是在上月22日组织第八届州政府后，

至今只执政廿三天。

团结党的多名要员，在今日（14/3/94）随着上周六的（12/3/94）三名州议员退党而宣布退党，跳槽国阵，而使到该党的州议员人数由卅一人减少到廿二人，国阵则由二十三名增加至卅二人，成为多数党而能够组织新政府。

首相拿督斯里马哈迪说，国阵将在星期五（18/3/94）举行的首次州议会会议上，投首席部长拿督百林不信任票，推翻现政府然后组织新政府。



出任雪华堂会长 林玉静痛苦四年

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在3月27日举行会员大会，改选董事，因为来届新会长人选将有激烈竞争，而成为华社注目的事项。

另一方面，现任会长丹斯里林玉静在大会上致词时，不但语惊四座，而且对华社组织来说，带有一股震荡力。

丹斯里林玉静形容，在他出任雪华堂会长的四年间，是他一生“最痛苦的四年”。

他说，他出来为华社做事，没有个人的利益和好处，但却有人指他的领导手法独裁、压制、托大脚、为个人问题。他也驳斥雪华堂内有所谓“三人帮”或“四人帮”的指责。他说，事实上，一些事情虽然只是几个人在做，但很多是通过会议决定才去做的。

不过，丹斯里林也表示，为族群献身，任劳任怨，而不期望任何利益，是社团工作的写照。因此，他认为华人社团选举与政党选举应有分别，不应该排除异己。他希望雪华堂会员凭着自己的判断力，行使会员的权力，选出心目中的领导层。



威省回教中学 500 学生念华文

槟州威省甲抛峇底区的一间回教宗教中学，竟开设了十四班华文班，共有四百九十二名学生，修读华文课。

这间中学在波各先那(Pokok Sena)的 Sekolah Menengah Kebangsaan Agama Al - Irushad，它在去年开办华文班，至今恰好是一年。

该校校长哈芝拉希米受访时指出：“这十四班华文班是奉教育局的旨意而开设的，对象是中一、中二及中三的学生。学生们读华文以来，没有任何不满或投诉，由此可见学生们都非常乐意上华文课。”



(3 / 4 / 94)

吴德芳 胜 颜清文 出任雪华堂会长

颜清文与吴德芳竞选雪华堂会长，在4/4/94晚复选投票结果，以一票之差，吴德芳险胜，出任会长。

雪华堂会长竞争揭晓后，颜清文拒绝提名竞选署

理会长。他坦言与吴德芳在很多事项上所持的看法不同，不能互相配合。而后，其他支持颜清文的董事，都拒绝被提名竞选任何职位。因此，雪华堂自会长以下的所有职位，都是由吴派的人选担任。

成功中选为雪华堂会长的吴德芳指出：“中选只是肩负责任的开始。”他希望所有社团能采取一致行动，领导雪华堂，为华社作出贡献。

落选的颜清文则说：“胜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雪华堂的选举已朝向民主程序发展。”



■ 吴德芳



千岛湖惨剧 两岸复交恶

31/3/94 一艘“海瑞号”的旅游船，载了二十四名台湾游客，到浙江的千岛湖游玩途中，神秘发生火灾，将二十四名台湾旅客和两名导游以及六名船员，活活烧死或窒息。

这是意外的灾难或是一项大谋杀？

根据验尸的法医指出：“从可采用的方法探知，所有遇难者均明显是活活烧死和窒息而死，身上无枪伤和可探知的伤痕。根据挣扎姿势表明，应是在被关入后烧死，而非死后毁尸。”

因此，惨案极可能是一宗抢劫谋杀。

案发后，疑因重重，传说纷纭；不但在台湾引起哗然，而且也引起海外华人社会关切。

中国大陆有关当局对惨剧的发生，先是不甚重视，后虽有表态，但在处理善后的问题方面，台湾政府却深表不满。

台湾方面，曾经通过多方的途径，进行交涉，但都未有满意的共识。因而，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副主席苏其（译

台将诞生共产党

（台北 24 日讯）一度以为大陆共产党政府做事而关禁数十个异议分子的、极力反共的台湾，将于年底有其首个共产党。该创建者周三如是说。

王劳阳（译音）在会见记者说，这个新党并不主张财产

归国有，而是推动民主改革。这是改变国际潮流的一个迹象。

农民出身的民进党党员王劳阳在其台西家乡云林市说：“这个党决不会像中国共产党。”

四十六岁的王劳阳说，因民进党内部分裂和对执政国民党软弱，而决定退党和组织共党。



●死者的亲属悲动不已。

音）于 12/4/94 宣称：台湾于 12/4/94 起与大陆切断所有文化与教育交流。

苏其说：“从今天（12/4/94）开始，我们将停止由大陆委员会赞助或检讨或批准的所有文化和教育交流。而由明天起，所有大陆观光团，包括以前已经下订的，都将禁止入境。”

显然，台湾方面的这些举措，是旨在向北京施压。

另一方面，因为千岛湖发生了这宗惨无人道的案件，也使海外华人对旅游神州产生多

种顾虑，举步犹疑。

北京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常委副会长唐树备，于 12/4/94 针对台湾宣布中上与大陆的所有文化与教育交流的举措，向台湾发出警告：“勿利用千岛湖事件作为借口，阻碍中国和台湾两岸的交流。”

他强调：“千岛湖游船火灾事故是两岸同胞交往、交流中的一个意外事件，不可能也不应当因此局阻碍两岸关系的发展。



（14/4/94）

下世纪初或可利用卫星发电

(伦敦六日综合电) 3月出版的《焦点》杂志在一则报告中提出开发空间能源的设想, 并认为人类有可能在下个世纪初期开始在空间建立发电站, 以解决日益紧张的能源问题。

题。

这种空间发电站实际上就是利用太阳能发电的卫星。这些卫星表面覆盖有太阳能电池板, 能够吸收阳光将其转化为电能, 并能通过微波束将电能

传送回地面。

在地面建造一个大的核电站, 其发电能力大约是一千兆瓦, 在太空建立一个太阳能发电卫星, 可发电五千兆瓦, 发电卫星所占面积为六英里长, 二英里宽, 重达数百吨。另外, 该方法还具有干净安全等优点。④

人类最早祖先 生活在亚洲?

(旧金山 24 日路透电) 两名地质学家周三提出证据说, 人类最早的祖先是生活在亚洲, 他们生活的年代比人们原先所认为的年代还要早一百万年。这一说法否定了一路来被人们所接受的人类进化理论。

加州柏克莱市人类起源研究所的卡尔·斯威舍和加尼斯·柯蒂斯说, 他们已鉴定出在印尼的爪哇岛出土的一个直立猿人化石的年代。他们说, 这个直立猿人生活在一百八十万年前。

斯威舍和柯蒂斯是采用先进的方法去鉴定出这个直立猿人生活的年代的。

这是迄今为止在非洲以外的地方发现的最早的直立猿人的化石, 跟在非洲发现的最早的直立猿人化石的年代相差无几。

柯蒂斯说, 在爪哇岛出土的直立猿人化石的年代, 比人们原先所认为的直立猿人从非洲迁移到亚洲的年代, 还要早一百万年。

根据早先的人类进化理论, 直立猿人是在大约二百万年前起源于非洲, 并在大约一百万年后从非洲迁移到亚洲和欧洲南部。

早先的人类进化理论说, 直立猿人是在发明了石斧后才从非洲迁移到其他地方的, 因为石斧让他们可以适应新的环境。④



中国三月起挖掘 秦兵马俑二号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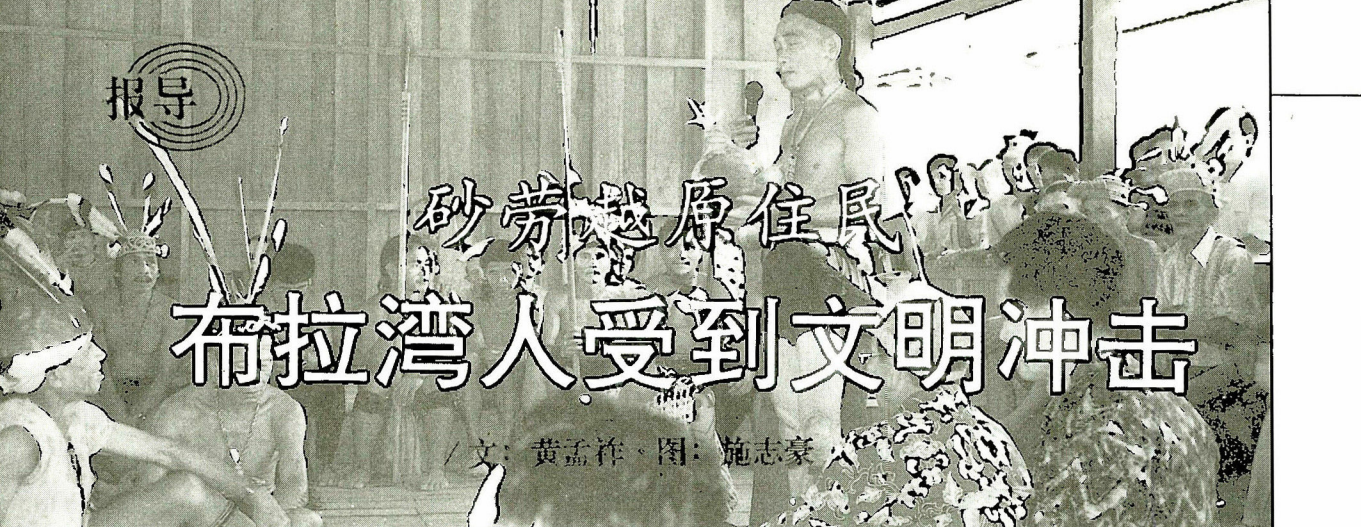
(香港讯) 据中国新华社报道, 名列“世界第八大奇观”的秦始皇兵马俑, 其二号坑的挖掘清理工作, 经中国国家文物局批准, 已定于3月1日正式开始, 并计划在今年10月初对外开放。

1976年春发现的二号坑, 经过考古工作者密集钻探和试掘, 已探明内藏陶俑、陶马及战车约一千四百多件。坑中的一百多件骑马俑, 专家认为是中国迄今已知时代最早、数量最多、形体最大的一批骑马文物。

据称, 二号坑的兵马俑以

军阵变化复杂、步、骑、车、弩兵种齐全, 内涵丰富多样为特色, 可视为秦兵马俑的精华部分, 为研究秦代以至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实物资料。

据了解, 秦始皇的陵园位于西安市东面三十五公里处, 陵园内的兵马俑是1974年3月时, 在农民打井时偶然出土的。其后, 经过考古工作者多年钻探、勘查、发掘, 确认距陵冢东面一点五公里处有三个呈“品”字形俑坑, 总面积达二万多平方公尺, 内藏和真人真马差不多大小的陶俑约八千件, 战车百余乘, 以及数万件实用兵器等文物, 其中一号和三号坑经过清理, 已分别于1979和1989年对外开放。④



砂劳越原住民 布拉湾人受到文明冲击

文：黄孟祚 图：施志豪

为了吸引外国游客在1994年前来马来西亚观光旅游，我国政府及有关旅游机构，已做好了“热身运动”，准备迎接各地的“贵宾”。其中被圈定为最引人入胜者，就是闻名遐尔座落在砂劳越美里省的世界最大洞穴所在的姆禄国家公园。据统计1993年共有一万二千多人到姆禄公园游玩。

随着1990年姆禄公园机场建造以来，一座五星级的皇家姆禄旅店及一条联系机场与旅店的道路，也于1991年末开始兴建。

布拉湾人（Berawan，砂州达雅族群之一）因其习俗土地，受这些旅游业发展的影响，曾发动和平抗议行动。建筑工程曾一度在1992年8月间短暂停顿。当局采取高压手段，声称布拉湾人根本对所涉及的土地，没有习俗的权利，并拒绝商议。布拉湾人乃于1993年4月发动向游客分发单张运动，并赢得同情。彼等认为他们在该地区已居住超过一世纪，按照他们的习俗（ADAT），甚至包括姆禄公园都是他们的习俗地，只是他们尊重政府的决定。虽然他们获准继续应用公园作为他们采集和狩猎的场所，然而他们已停止这些活动，这是因为他们也明了公园的保护，对旅游有重大的意义。他们之中有人已组成四家公司提供旅游服务，包括运载游客的交通和供住宿的小型客栈。这些商业活动已达到

一些成就，正是符合我国政府要扶助土著（包括原住民）的发展政策。

然而，布拉湾人认为彼等的习俗权应获得承认。尤其是那些在公园周围受影响的土地，应有适当的咨询，并应公平地让他们分享旅游发展的蛋糕，不能一味让给“外来”的投资企业人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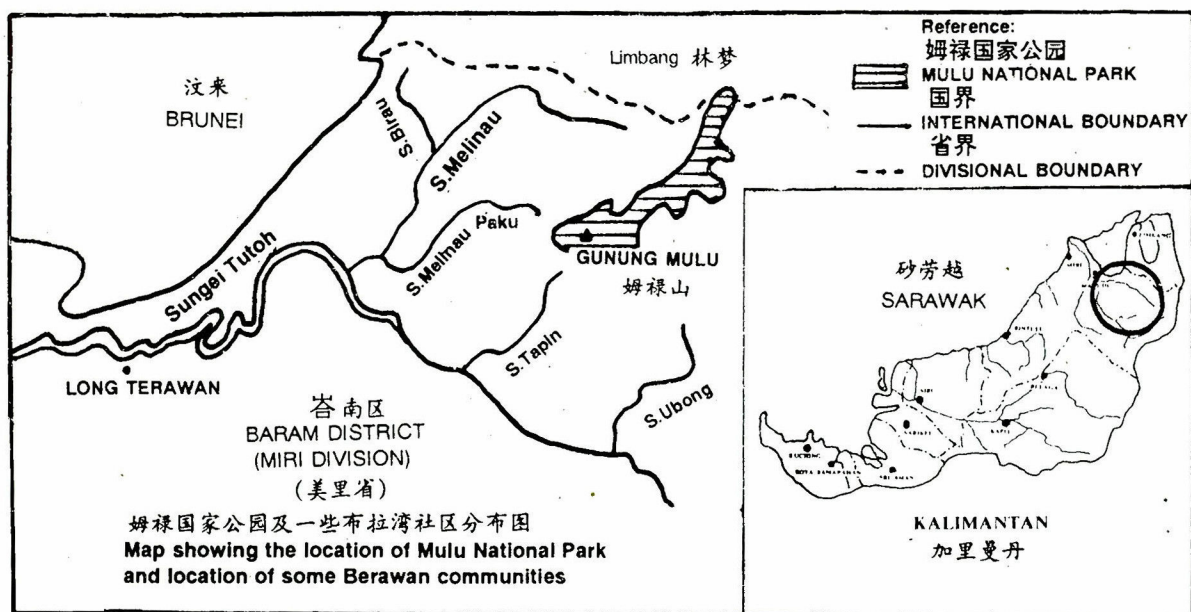
虽然当局曾建议，提供赔偿金给受影响的地主。但他们认为金钱不能补偿他们对土地权益的消失。因为土地是彼等某某生存的基础。

笔者特此将布拉湾人所发布的传单内容译为中文，以资参阅。

砂劳越原住民布拉湾族有话要说：
—— 土地是我们生存的堡垒

我们布拉湾人（Berawan）有各种的证据显示，我们是居住在著名的姆禄（Mulu）国家公园近邻的原住民，就是都杜（Tutuh）支流美玲那（Melinau）河的沿岸地带。我们祖先的坟墓，旧居所和成长的大果树，都是活的证据说明我们拥有土地的权利。概括地说，我们在此地的居住，可溯源自十八世纪汶莱苏丹统治峇南（Baram）的时代。我们是都杜上游最早的居民。

目前我们有八十五户共超过一千名的人口居住在弄特拉湾（Long Tera-wan）。我们主要是依赖山耕火种，捕



图：资料来源 — Panchar Penemu (社群教育协会通讯)

鱼，收集森林产品和打猎为生。迟至最近，我们中间有些人才开始参与商业的活动，在美里 (Miri) 开设旅游业，以及在靠近姆禄公园我们的习俗地上，建有旅客的宿舍。有些人在海岸油田工作，有的是政府公务员。

我们的长老有口述历史说明我们的渊源。长老们说：“我们向来是居住此地的”。

我们住在长屋里，在传统的界线内拥有群体的权利。这是我们毗邻族群所公认和尊重的。在我们长屋一带的土地是个别家庭所拥有的。我们曾在这些土地上垦殖生存。正如其他达雅 (Dayak) 族群一样，习俗领土是永久和为社群所拥有的。这是布拉湾社会的基础。

伐木及姆禄国家公园

砂劳越的土地法令在理论上承认我们对习俗地的权利；可是在实际上，我

们的习俗地，不论是社群公有或是个别拥有者，正不断地遭受伐木公司和姆禄国家公园的侵占，并未先征求我们的同意。这不但为我们的生活造成诸多的困难，也显示彼等对我们权益不尊重的粗鲁行动，直接威胁我们的生存。极具破坏性的伐木活动，已夺走我们森林中的粮食、医药和建筑材料等，污染我们的河流与小溪，并导致我们的食物来源鱼类迅速地消失。

最近的计划如姆禄旅馆，飞机场和拟议中的高尔夫球场，正侵占我们的习俗地。这些明显的例子，说明目前我们全社群所面对的情况：我们的土地及各种资源毫无保障。

我们要在此声明及强调，我们不是反对任何发展或进步。事实上，我们支持那些同我们一起计划及恰当咨询的计划，那些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利益和理想者。同时同等重要的是确保我们的习俗权益，及保证我们对土地和资源的传统控制权。



■多姿多彩的原住民文化，
会否受旅游的冲击而变质？

我们请求所有关心的团体或个别来帮助我们申张正义。这不单是一项环保的课题而已，而是一项生存与作为一个具有尊严的民族，捍卫我们基本权益的问题。

联合国已宣布1993年为国际原住民年。我们很清楚我们是捍卫我们的基本人权，正如人权宣言第117款所言：(1)人人都有对自己产业的权利；(2)没有人可被强夺他的产业。因而我们要求：

- (一) 承认我们的土地权益。
- (二) 分割我们在美玲那地区的习俗土地，及发予地契给所有土地拥有者。
- (三) 确保布拉湾人民参与决策，来控制及管理姆禄公园附近的发展。
- (四) 按我们的文化传统，确保公平分享和控制有关旅游业的利益。

布拉湾人历代居处志

1863年

布拉湾人的第一个居留处在美玲脑的顺溪邦纳 (Sg. Panas)

1865年

布拉湾人的第二个居留处在美玲脑的顺溪巴拉 (Sg. Pala)

1867年

布拉湾人的第三个居留处在顺溪美玲脑巴古 (Sg. Melinau Paku)

1870年

布拉湾人的第四个居留处在美玲脑的顺溪鲁巴 (Sg. Lupa)

1879年

第五个居留处在美玲脑的巴都布甘 (Batu Bungan)

1881年

第六个居留处在顺溪比拉 (Berar)

1886年

第七个居留处在美玲脑峡 (Melinau Gorge)

1895年 (5月27日)

布拉湾人伟大的领袖天猛公拉威 (Temenggong Lawai, 又持有Orang Kaya的领衔) 抗拒布律克王朝 (Brooke) 所派遣以班菲德 (C. A. Bampfylde) 与利克斯 (Ricketts) 为司令的一支四十条船由60名。马来人及450名达雅克人所组成的征伐兵队。在抗拒中，有四名布拉湾人伤亡，天猛公拉威被捕 (见砂劳越宪报1896年6月1日) 并被囚禁古晋一年。其罪状是因他的儿子拉兴 (Lahing) 砍了三名卡达央 (Kadayan) 人的头。拉兴却从未被王朝的军队所逮捕。

按布拉湾人的长老，当时天猛公拉威已在美玲脑建长屋，美玲脑山峡像一座堡垒，保护他们免受敌人的攻击。当时有些族群的地盘界线是以战争之血来划定的，外人在未获许可下，擅自进此界线

会受到严重的处罚。那三名卡达央人就在这种情况下，被认为是敌人，而遭布拉湾人所攻击致身亡。布拉湾人因此案件而受劝迁居林梦县。

1895年

布拉湾人不久就回返巴南河流域都杜河的上流，最远达到弄布鲁旺处（Long Bruang）。

1932年

英国人爱德华·施立敦（Edward Shackleton）旅游到美玲脑巴古记载该地皆是处女林。可是英国地理学者约翰·普洛持（John Proctor）在1978年所作的观察与研究，认为前者的观察有错误。该地在1867年到1870年间有人耕作居住。在一个未受训者的眼中，六十多年的再生林，会被误认为处女林。

1944年

日军烧毁布拉湾人建在弄布鲁旺的长屋，目标是要制止游击队的活动，同年布拉湾人迁居弄布禄哥（Long Beluko）。

1946年

迁居弄特拉湾，即目前的居所，共有八十五个家庭。

1975年

姆禄地区被宣布为国家公园。

1977年

一群布拉湾年青人致信给马鲁帝县长，询问为何彼等的习俗地被划为国家公园。

1983年

一些年青的布拉湾人开始进军旅游业。数幢游客宿舍为他们所建及拥有，这些小客栈获得一些小型企业的成就。

1990年

姆禄机场为运载陆续到访的游客而建。布拉湾人称声机场所占用的土地为彼等的习俗地。机场的建造并未谘询他们，也未对土地拥有者作出任何赔偿。

1991年（12月）

开始在美玲脑河畔建造皇家姆禄旅游胜

地，包括一座五星级的酒店，占地约十九点九依格，并于1993年4月完工。同年建造一条由机场通往皇家姆禄营寨的支条，间中越过许多习俗地。

1992年（8月）

习俗地拥有者及其家属，游行到建路地点抗议彼等的土地被利用，而未得赔偿，他们的土地权益毫不受尊重。建路工程曾暂时停止，当局获悉后，一周后就派遣警察与野战部队来镇压这项非暴力的抗议。次日警察与野战部队即退回。布拉湾人的领袖多马斯·旦密（Thomas Damit）被召去美里省警署数度问话。

1992年（12月）

一百五十名布拉湾人包括村长（Tua Kampong）、区长（Penghulu）和地方领袖（Temenggong）在姆禄举行大集会，讨论土地权益的课题。

1993年（4月）

布拉湾人民分发传单“布拉湾人有话说：土地是我们生存的堡垒”给到访姆禄公园的旅客。这项宣传运动，获得游客广泛的支持与同情。

1993年（6月）

布拉湾人的区长收获由首相公署所发出的信，通知他说他的职务将于1993年9月底终止。信中没有说明理由。相信是因为区长与他的女婿皆积极参与彼等的土地斗争。

1993年（6月16日）

七名布拉湾领袖在美里召开一项记者招待会，称声彼等的习俗权益。并获得本地三家报章的刊载。

1993年（7月）

四名习俗地拥有者被召去马鲁帝（Marudi）问话。警方警告他们不可试图干扰旅店建筑工程，否则将被逮捕处分。事实上旅店所占有的土地是他们的习俗地。



脑死就是成

/ 陈忠登医生

在传统的观念，当心脏与呼吸停止时，一个人就是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随着医学的进步，有些脑受到严重损伤而不能呼吸的病人，医生便以人工呼吸仪器帮助他们呼吸，以维持他们的“生命”。这些人已经失去知觉，他们的血压与体温也慢慢下降。虽然医生们用了很多不同的药物来维持生命，但是过了一段时间，这些人的心跳也仍然会完全停止。因此，很明显的，人工呼吸的仪器，只是遮盖了他们老早就已经死亡的事实。这些人，是脑先死，而不是心脏先死。1959年，一群法国的医生首次编定了脑死的准则；符合这些准则的病人，便意味他们的生命也已经结束了。因此，即使这些人的心脏仍然跳动，医生却可以省下帮助呼吸的器具，从而避免不必要的精力与资源的浪费。

35年后的今天，“脑死准则”，也随着医学的进步而逐渐改善。除了避免紧急病房治疗所引起的精力与资源的浪费之外，也因为很多脑死的病人其他内脏还很健全，适合捐献器官以帮助其他有需要的病人，因此，脑死的观念与准则，于全球

医学界与很多先进国家都被广泛接纳履行。

1991年，马大医院也正式接纳了脑死就是死亡的观念，并且订了该医院的“脑死准则”。这一年来，有好几个有关脑死的讲座，在全马各地的中央医院举行，希望这观念能逐渐普及。

当一个人的脑，尤其是脑茎受到严重损伤时，不只是脑停止操作，短时间内其他内脏也随着恶化崩解，血压迅速下降，心脏停止跳动。已经变质的脑死组织，通常并不能靠现有的电脑切片扫描（CT Scan）或核磁共振像（MRI）显示。它需靠医生的临床及其他生理检查，并附加以防人为疏忽与判断错误的条件，这就是“脑死准则”的根据了。

以下就是“脑死准则”的主要内容：

- 一·明确脑死的病因，如车祸引起严重脑损伤。
- 二·肯定排除药物或新陈代谢为引起昏迷的原因。
- 三·病者深度的昏迷，不能呼吸，又失去了生理的脑茎反应。
- 四·根据两个受过特别训练的医生的



■陈忠登医生。

诊断，一般是神经与麻醉科医生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与诊断。

- 五·如果有需要，再做一些其他的特别的检验，如脑电图以肯定脑部已经不再有脑波，或脑血管特别X光（Cerebral Angiography）以证明因为脑肿大引起颅内高压而脑不再获得血液的供应。

为了进一步了解与接纳脑死的观念，我想再澄清以下数点：

脑死与植物人并不相同：

植物人的脑皮层，受到严重的损伤，因此这种人完全失去了理智的操作，对通过感官所传到脑部的外界资讯，一点也不了解，当然更谈不到自我的意识了。不过植物人的手脚与眼球却可能会无意识的移动，不必靠机器也可以呼吸。有些甚至还可以吞食物，在细心护理之下，植物人可能还会生存好几年。有些病人的病况也可能会有进展。脑死的病人却不相同，就是通过最先进的药物，这些人在短期内血压体温仍然下降，心脏停止跳动，他们的情况是不能好转的。

脑死并不是对生命价值下定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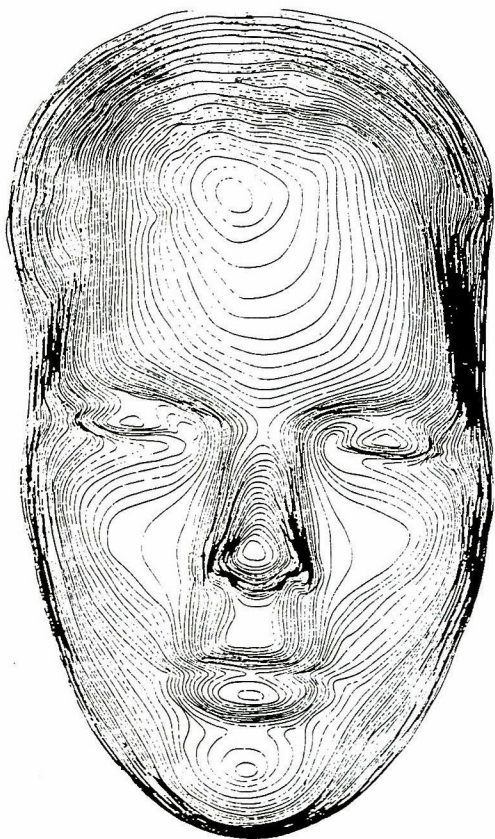
当我们说一个人已经脑死，因此可以停止人工的呼吸，我们并不是说：“这个人的脑既然损伤的那么严重，他的生命是不值得维持下去的”。我们也不是说：“这个人的病况太严重了，是不可能好转过来的，我们不应该花这么多的金钱与精力来维持这个··无用的生命”。我们更不是说：“这个人脑损伤的那么严重，没用了，他只能成为社会与家人的累赘，不如将他的器官，捐献给别人，给别人快乐与新生命吧！”而我们的意思是：“这个脑死的人，他的生命已经结束了，已经死了，让我们不要继续为他的遗躯做人工呼吸，只是为了维持生命的外表吧！”

因此，脑死并没有改变死的基本定义，而只是利用科学的进步，使死亡诊断更明确。

死亡的定义是人身体的整体联合操作已经停止

我们对死亡的定义，不应该根据身体的某个部份永久失去功能，而是因为人身

体的整体联合操作已经停止（death is the cessation of the coordinated function of the whole organism）。因此，如果一只蜥蜴被人打死了，不过它那断了的尾巴还可能在抖动，我们并不会因此认定这只蜥蜴仍然是有生命的。同样的，当一个死囚被刽子手断头正法后，过了数分钟，他的心脏仍然会跳动，过了数小时，死者的瞳孔仍然会因著药物而张缩，过了一天，皮肤、骨与血管仍然可能会成功地被移植。不过我们仍然会以断头正法的那一刻，为他生命结束的准则。因为那是他身体的整体联合操作已经停止的时间。其实，如果我们坚持只以心脏停止跳动来决定生命的结束，那么人生命就完全决定于心脏的健全操



作，那些接受心脏移植的人，又是活还是死呢？如果我们认为这人是活的，那么他使用别人的心脏，现在又是谁呢？

脑死就是死，因为当脑死时，人身体的整体联合操作已经停止了。

死亡是一个过程

从传统、文化、法律、宗教信仰的观点，死亡是一个特定的时间。因此，从宗教的观点，死亡是当人灵魂离开躯体的那一刻。医学却将死亡看为一个过程，当人身体不能回转的崩解的那一刻，死亡的过程就开始了。医学所谓的“人身体不能回转的崩解一刻”，大概就是宗教家所说“灵魂离开身体”的时候吧！因此，这两个看法其实是没有冲突的。对于患上心脏病发作的病者，这过程是冠状血管阻塞，心脏停止跳动，血压下降，神智昏迷，呼吸停止，身体瘫痪，体温下降，皮肤颜色改变，肌肉僵硬，身体组织腐烂等。“人身体不能回转的崩解的一刻”，时常只是理论的观念，我们所能观察的只能是这过程显明时的表现。因此当躯体已经僵硬腐烂时，每个人都知道这人已经是死了。对一些医学稍有常识的人，一个人如果没有呼吸，不再动，也没有反应，这人的生命是已经结束了。医生以听筒诊断心脏跳动停止，更进一步确定死亡。以心电图来诊断心收缩不全（Asystole），就比听筒更先进了。同样的，脑死是应用现代科学的知识，使我们对一个人的死亡过程，更准确了解，更快下诊断。对于脑死，早在1957年，当时的天主教皇满有智慧的这么说：“我们可以引用一般的‘灵魂离开身体’的观念，不过在实际生活的层面，‘身体’或‘离开’是什么意思，我们却不能从任何宗教信仰或道德的原则得著答案，因此，这是出于教会所能处理的能力之外的”。教皇指出，对于死亡的诊断，那是医生的职份。

细菌与胃溃疡

■ 吴乾利医生

(马大医学院胃肠科副教授)

胃痛与胃溃疡，是很常见的病症。现代胃肠医学对胃痛与胃溃疡的病因与治疗有很重要的进展，那就是胃皮层内，有一种称为 *Helicobacter Pylori* 的螺旋型细菌，能在胃的高酸性环境中茁壮生长。*H. Pylori* 可引致胃炎，它被发现与胃溃疡有密切的关系，有些研究指出它甚至可能是胃癌的病因之一。

根据马大医院的研究，胃痛的病人，超过一半潜伏带有 *H. Pylori* 的病菌。胃痛的病因可分为胃溃疡与非胃溃疡（胃炎）两大类。约九十巴仙胃溃疡的胃痛患者与四十巴仙非胃溃疡（胃炎）的胃痛病人都潜伏有 *H. Pylori* 的病菌。大马的三大种族之中，超过一半的华人胃痛病者及绝大多部

份胃溃疡患者皆被发现带有 *H. Pylori*。另一方面，超过一半的印度籍胃痛病者也潜伏带有 *H. Pylori* 病菌。不过，印度族人的胃痛主要病因是非胃溃疡性的胃炎。至于患有胃痛的马来族人，较少带有 *H. Pylori* 病菌与胃溃疡症。

随著近 20 年来高度效能抗胃酸药物如 *Cimetidine* 的发现，胃溃疡的痊愈率已经是非常高。可惜药物停止之后一年内，高达八十巴仙的胃溃疡又重新复发。不过，如果那些胃溃疡的病人，又有潜伏 *H. Pylori* 病菌，如果除了以抗胃酸药物治疗胃溃疡，又能根除 *H. Pylori*，胃溃疡痊愈后就很少有复发的现象。根据我们在马大医院的研究，那些 *H.*

Pylori 被根除的胃溃疡病人，九十巴仙于一年后仍然没有复发的现象。至于那些因非胃溃疡（胃炎）引起胃痛的病人，有些研究也显示根除 *H. Pylori* 病菌也能消除胃痛的病症。根据我们在马医院的研究，那些服用铋化合物（*Bismuth*）药物 *De-Nol* 以根除 *H. Pylori* 的非胃溃疡（胃炎）引起胃痛的病人，病症有最大的进展。

医学广泛的研究报告及临床的经验显示出 *H. Pylori* 病菌是不容易根除的。所试验的不同的混合药物中，目前最有效的是铋化合物（*Bismuth*）如 *De-Nol* 加上两种抗生素如 *Ampicillin*，及抗胃酸的 *Omeprazole*。



莠苣提炼药物 可治疗偏头痛

(哈瓦那 20 日路透电)
古巴通讯社星期五报道说，千多个患有周期性偏头痛的人士，在服用了从莠苣提炼出来的一种药物后，觉得病情好多了。

报道引述古巴一位神经

病学家加西亚医生的谈话说，八十五巴仙的病人以这种新药物疗病后，周期性偏头痛消失了。这种药物叫做“莫拉塞”。

医生说，由于古巴发生经济危机，周期性偏头痛患

者人数激增。

他说，莫拉塞可以降低病人的应激性（*Irritability*）。

莫拉塞是由古巴西部一家产科医院的首席药理学家莫雷洪发明。通讯社说，这种药物在推广前，经过多年试验。

没有迹象显示，莫拉塞会商品化的生产以供外销。

21/12/1993《南洋商报》



知识 与 权力

的 共犯关系

论马来知识社群的文化现象

/ 曾庆豹

巫统党选之前，各大报争相讨论“新马来人”这概念，华文报也努力转译刊出。知识在此政治现实中发挥了革命性的颠覆功能，成功的营造某种有利的气势，从封建社会的宗法政治（嘉化的象征：德高望众）过渡到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安华等人的象征：青年才俊）。这次结构性的转化是一项“典范革命（Paradigmatic Revolution）”，“新马来人”赋予了理论的依据，而象征着“学术”、“中立”的马来知识社群在其中扮演了极重要的思想任务。

这股文化现象连华社也频频感到惊

讶，不断追问：马来知识精英受过社会科学训练的究竟有多少？的确，马来知识精英早已形成一股可观的力量，在训练有素的情形下，肯定在未来国家权力整体的运作中，关系着其中的变化因素。然而，问题不在于这群马来知识精英究竟会形成怎样的影响；问题应该是，究竟我们是如何揭露知识社群与权力机构的反馈逻辑？知识如何形成赤裸裸的权力宰制？一言以蔽之，知识与权力有没有“共犯”之嫌？

毫无疑问的，知识的宰制（Domination）是一种非暴力的掩护，也就是说，知识暗含着权力的结构性运作，配合



着国家机器采取“软性”、隐藏式的操控。表面上看来、知识是中立的，再加上“学术”的旗号，更是合理地辩护自身假定的意识型态；所以，所谓的“客观”果真的是毫不预设立场吗？这显然是值得怀疑的。尤其当知识在权力核心的地带运作时，往往构成对权力的保护或挑战，一般在国家机构任学术人员和大学任教席的，很少不涉入某个权力组织来进行学术研究的。

知识一方面可以反映实在，但也可以进行欺骗。在德国纳粹的时代，许多大学教授和专家的研究，无不合理化的辩护希特勒的德意志民族主义思想，也处处寻找诋毁犹太人的所谓“证据”，他们的方式也是“学术”的。可以这么说，知识一定关系到权力的问题，它不是赞成就是反对，都涉及到权力，如做研究需要经费，为保护不失去教职，不能有偏极性的反对言论，进入主流构成影响等等。所以，知识无处不在权力的结构中运作。好一点，知识变成商品贩卖下的交换，坏一点，就沦为某种意识型态宰制的服务工具。

知识分子是一个没有“生产工具”的群体，本质上，他们并不属于任何阶级，因为他们的活动并不明显代表那一层的利益关系。换言之，知识分子往往只能依附于某个团体，而在国家机器的权力无孔不入的情况下，他们往往落入某种权力的团体中。名义上好像是为服务而贡献研究心得，事实上，却成为替某种宰制阶级做合法性辩护的工具，在学术研究的中性保护下，进行一些赤裸裸的权力操纵。知识与权力一拍即合，形成反馈的逻辑。所以，所谓的智囊团，不也就是利益分赃者，知识分子在其中，可以做出羞耻的勾当，巩固自身的学术霸权。知识沦为贩卖，良知也溃烂扫地。

自古文人与权力结构的关系，似乎只能有两种命运，一是被利用，一则是被放逐。苏格拉底的死是言论的迫害，屈原的死则是良知的迫害，那些为权力抬轿子的

人才获得自保，被卷入权力核心的，少有不丧失批判力的。知识分子在平顺的时代同样容易失去知识的自主性，权力永远是一个诱人的结构，纳入此结构方得分享其中的利益。知识加上权力的运作，就形成某种利益集团的剥削功能，强化其宰制的逻辑，而那些“知识的少数权”就成为被支配的对象，或被迫放逐到边缘去。

“新马来人”的被炒热，就是马来知识社群一次成功主控媒体与舆论的范例，公共领域的公开论述掩盖了权力的暴露，偷换了权力集团的运作模式。事实上，这种以知识作为包装的，更是危险之致，他们可以合理化某种观点，再以他们的学术涵养来担保某种权力的合法性。理论如何“中立”，如何免于“权力介入”，这是任何知识分子无法处理的；换言之，知识本身就体现为一种权力，这种权力若不依附于某一种权力，就是挑战某种权力，没有第三种可能，“中立”只不过是一则不容易识破的神话。在我看来，知识若要免于过渡依赖权力，就必须是“非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的。也就是说，知识分子的身分一定是游离式的、滑动的，他不固定于某一种权力结构中，继续保持其自主性。当然，这种游离或滑动的知识分子往往都是时代的悲剧人物，免于权力的宰制，免于潜意识型态服务，才意味着知识保有自主性之可能。我们看见马来知识社群所谓的“知识”，事实上暗藏着与“权力构成“共犯”的关系，透过国家权力机器（学术单位、报纸舆论、媒体）形成绝对垄断的危险。如何保持某种批判的清醒，这是历世历代知识分子永远都学不好的；或许，知识与权力在本质上老早就是一对孪生兄弟。培根（Bacon）说“知识就是权力（Power）”就说明了拥有知识也就拥有宰制、支配、剥削的合法性，只是我们老是不承认这个事实！

（1993. 11. 23 于台大）



政党政治的 另一种选择

／正文



■马绍尔

新加坡前首席部长马绍尔三月底在吉隆坡对新闻界说，新加坡应该改变试图控制一切的态度，让人民去决定要为自己做些什么。言下之意，是呼吁新加

从马绍尔对新加坡政制的评论谈起

坡行动党政府修正一党专政体制，好让人民有更多思想与言论的自由。这真是一针见血之论，值得我们重视与省思。

在东南亚各国中，新加坡是一党独大的政体，由于其执政党高度廉能的表现，因此能长期得到六成以上选票的支持，但是去年新加坡的总统选举，人民行动党所支持的候选人王鼎昌所获得的票数比率首次跌破六成，是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有史以来的选举中，最低的记录。这个投票的结果，已经显示出连最有效能的新加坡一党独大的结构，都受到民意强大的挑战，更加突显其他一党独大的东亚民主国家，也都面临更为严格的政权保卫战。难道东亚国家一党独大的政治结构真的没有未来？东亚国家一定要走上多党政治竞争的结构？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大问题。

虽然两党以及多党体制在西方民主成熟的先进国家已经成政治的常态，政党交互执政对于防止政府腐败，伸张民意主权具有极其正面的效应，但是从若干东亚国家的观点来看，这种体制未必是唯一可行的民主政体架构，何况西方民主国家有多党林立，以致政治运作失去效能的严重政治问题。再者，东亚国家的历史结构、政治现实环境以及人民民主素养的成熟程度，也未必一定适合西方民主国家的两党或是多党的政治结构。因此多年来，许多东亚民主国家是以一党独大的方式运作，造成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并且非常有利于这些国家经济的成长。

不过由于一党独大的结构，执政党在缺乏竞争与制衡的状况下，容易出现脱离民意的官僚结构，以及产生腐败与软弱的现象。而在野党则由于缺乏执政的人才，以及务实可行的政策，通常以偏激的政见来吸引人民基于制衡或教训



执政党为目的的一些选票，因此这些国家的选民，同样都有“选执政党不甘心，选在野党不放心”的困惑。究竟是以西方国家的两党或是多党政治来取代目前一党独大的架构，还是可以透过政党体制的改良，使得执政党在保持政策理念的传承之下，允许党内成立独立的多元政治团体，如此执政党可以通过内部竞争，吸收不同的人才与民意，防止政党的腐败，同时可以继续维持一党独大的稳定执政。这种在基本理念一致但是在组织与运作采取弹性的架构，在国际性的大型企业集团中，已经受到广泛的重视与应用。这些国际超重量级的企业集团，发现中央集权式的庞大组织架构，如果过于趋向一元化，会使企业失去创新、变化、效率，而在国际市场中丧失竞争的能力。因此这些企业集团采用弹性的企业组织结构，在企业追求市场与获利的共同目标，将企业内部各个部门的营运予以独立，允许每个部门设立独立的研发与产品经营策略，甚至在市场上各个部门可以公开进行竞争，各个部门之间维持资讯的互通与技术的交流，但是在市场上，各个部门间不但维持清楚算账的方式，而且更可以在市场上相互竞争，企业集团中经营不善的部门，将予以改组合并甚至拍卖关闭，经营良好的部门则可以大幅的扩张。这套允许企业集团内部各个部门独立竞争的弹性组织策略，使得大型企业集团能够在内部竞争中，强化企业体质，增加市场的竞争优势，同时又能拥有大型企业集团的品牌形象以及国际市场的经营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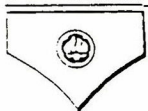
在国际政治中，西欧的法国与德国政党也有采取联盟的弹性政党组织架构，以法国为例，法国的右派联盟政党是法国第五共和创立者戴高乐所留下的

政治势力组合，这个右派政治联盟在政治理念上是采取中间偏右的政治立场，但是由于认同这个政治理念的人才济济，难免有些背景、地域、阶层以及意气之争的差异，若要强化统合在单一政党之下，势必会有瑜亮情结的争执，甚至会因为彼此的攻讦，造成政党正式的分裂，因此这个右派政治联盟，目前分成由席哈克领导的共和联盟与由季斯卡领导的民主联盟两大政党。虽然两个政党各有组织，各有自己的政纲，有时在同一选举中，各自推派自己的候选人参与竞争，但是两个政党经常进行各种政治的联盟与交流，尽量的采取一致的对外政策，并且共同争取民意争取执政，遇有重大歧见彼此协调沟通，必要时则以民主票决来决定。因此法国的右派联盟是属于在联合之下有竞争的政治团体，如此可以吸引法国政治立场右倾的政治人物，选择在风格上适合自己的政党，而达到异中求同的目的，不会产生因为部分立场的差异而爆发全面性党争的分裂危机。

德国长期执政的基督教民主党联盟，是由基民党与基社党所联合组成，其中基民党是属于全国性的政党，但是为了尊重德国南部巴伐利亚特殊的政治传统，而同意让该地的中间偏右政党较为强调社会政策，并且以基督教社会党的名称进行活动，两个政党在基本的政策上维持密切的合作，组成相互合作的政党，分别强调不同的重点来吸引不同地域的选民。这种因地制宜的政党政治策略，成效相当良好。

因此既然东亚民主国家长期存在一党独大的政党政治结构有其特别的原因与需求，假如这些国家的政党能够参考国际企业集团的内部部分权独立组织，或是西欧国家的联盟政党方式，让结构庞大的政党变成更为多元化与弹性化的政党联盟，或许是一个可以参考的改革方向。





《文明冲突》的 反思

■刘锡通

偏颇观点受落 世界永无宁日

一个资深学者或一个政治领袖，当他已具有相当的国际声望的时候，他的一言一行必然受到世人的关注。尤其是在一个社会的转型期，如果他们冒出来讲些狂言妄语，或者写些暗藏玄机的文章，他们都会面对世人的一番评论或驳斥。

美国当代政治发展理论权威，哈佛大学教授，塞穆尔·亨廷顿，在发表了《文明之冲突》一文后，引起了国际学者与思想界的种种回响与评论。他接着又写了《文明冲突取代冷战——后冷战时代世界模式的探讨》一文，表示这些回响与评论足以证明他的“文明冲突取代意识形态，经济冲突的观点”已在某种程度上命中要害，它即使不能完全契合一般人对现实的看法，至少也非常接近，以至于不能接受它的人非攻击它不可。言下之意是，他的观点之所以引起全球各地辩论，已够证明它是合乎多数人的看法，这种不管正反意见，都将它们归为支持自己的观点的做法，只能反映亨廷顿的自我膨胀心态。

无独有偶，最近俄国举行国会选举，极端民族主义者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宣布了自己的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政纲，并领导自由民主党在国会选举中参选，且大有斩获。他的极端言论也因而引起世人的注意和批评，尤其是西方国家大都表示震惊，但是日里诺夫斯基却反而感觉光荣和伟大。

上述两位人物，前者是国际有名望的学者，后者是一名新冒起的政客，两人的言论都引起了世人的关注。一个是在国际社会转型时期代表“西方中心论”者的利益发表高论。一个是在国内社会转型时期代表极端种族主义者的利益宣布政纲。两人都在极力推销他们各自的观点，如果这些观点都能找到市场的话，相信今后的世界将会永无宁日。

亨廷顿主要的论点是，目前国际文明意识与日俱增，文明间的冲突将会取代意识形态与其他形式的冲突而成为世界之最主要的冲突形式。国际关系将日趋非西方化，非西方文明不再是配角而会成为这个国际关系游戏中的主角。成功的国际政治、国防和经济制度的发展，多会在同文



明而较少在跨文明间发生。异文明的种族冲突增多，且比同文明的种族冲突更持久和暴虐。异文明间的种族暴力的逐步升级最危险，也最可能成为导致世界大战的原因。故此，亨廷顿在他的文章结尾里这样对西方启示说：欧洲和北美应进一步团结与合作。应将东欧与拉丁美洲社会融入西方阵营里，西方应该促进并维系与俄罗斯和日本的合作关系。他们需要抑制伊斯兰与儒家国家的军事扩张，也需要放缓削减西方军事力量的步伐。同时还要制造儒家与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差异与冲突。

另一方面，日里诺夫斯基则公开表示要恢复昔日俄罗斯帝国的版图。这版图除了包括现已独立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之外，也包括了北欧与西亚的一些地区，以及现今芬兰和沙皇时代卖给美国的阿拉斯加州。他甚至扬言必要时会以核子武器对付德国并打击法国，宣布千岛群岛主权属于俄国，否定日本索回北方四岛领土的权利，同时为了要使俄国版图延伸到印度洋和地中海。他也要把土耳其，阿富汗，伊朗等国家都引到高加索的战争去，让他们自相残杀，他也表示俄国有每年出售四百亿美元军火的潜力，因此也要增加军备。

上述两人都是在后冷战时期，看到国际或国内新局面的出现，逐渐对其所归属的集团或国家不利，担忧他们过去呼风唤雨的时日将要结束，无限的光彩也将随时日而褪色。在性质上，他们所面对的局面是有相同之处，所以他们的言论也极为相似。

首先，近年来美国经济走过了一条消费，进口，军备，发行政府债券的急剧膨胀的道路后，其经济实力已在衰退中，而西欧的长期经济衰退更为明显。另一方面苏联则自解体后，为了用西方市场经济的模式改造俄罗斯，接受了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创议的经济“休克疗法”，目前国家经济已濒临崩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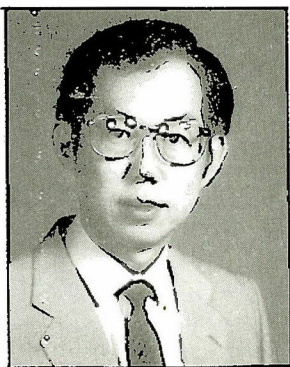
旨在重新凝聚 刺激国民情绪

其次，自苏联和东欧相继解体之后，意识形态矛盾已相对的淡化，西方国家深恐他们之间的凝聚力也随着消失。正如德国南德意志报驻南非通讯员格伦德，贝伦茨所说的“红色威胁不复存在，连接西方的黏合剂松了，还有什么可以团结各国？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亨廷顿当然也不愿看到这种局面的出现，于是便急于寻找一个能凝聚西方国家的黏合剂来代替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冲突，以便维持西方国家在国际上的优势。这个黏合剂就是所谓“文明冲突”。反观日里诺夫斯基，他也看到国家民族解体，在饱尝屈辱之际，他不得不也基于这样的道理，依赖极端民族主义的老药方来刺激国民，以达到争取权力的目的。

第三，亨廷顿从宏观角度来看待国际问题，他希望西方国家能在文化、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继续领导及支配国际社会，而日里诺夫斯基则希望俄罗斯族能恢复沙皇时代的版图，重新支配昔日沙皇所占领土地上的各族人民。

第四，为了要保持西方的优势以继续支配整个世界，亨廷顿因此提示西方国家要抑制伊斯兰与儒家国家的军事扩张，尤其还要制造儒家与伊斯兰国家的差异与冲突。而日里诺夫斯基则为了要保持俄罗斯的优势，以便支配其昔日的版图，也提出要把土耳其、阿富汗、伊朗都引到高加索的战争去。这种损人利己，居心不良的心术。上述两位人物都毫无禁忌的公开表露出来，而且绝无歉意，可见其嚣张的一般。

第五，亨廷顿与日里诺夫斯基都在强调提高军事开支以争取军事优势，同时也



林忠强博士 擢升为教授

马来亚大学在2月13日起，正式擢升二十七名副教授为教授，包括该大学数学系的林忠强博士。

林忠强博士也是华社资料研究中心的教育／翻译／科技组的研究员。

林忠强博士在南洋大学理学院毕业后，前往加拿大莎斯克渥太华大学与麦基尔大学，继续修读硕士与博士学位。林博士被擢升为教授前为马来亚大学数学系副教授。

林忠强博士在数学的研究上深得心得，受学术界重视，历来曾经常受邀出席国际性学术会议，其学术研究的论著，在份量上也相当可观。

林忠强博士也热心公益活动，他曾担任东南亚数学学会会长、雪隆龙岩会馆会长与南大校友会副会长。他热心社会公益事务，在我国华社是一位闻名的社会领袖。



要依赖售卖军火以增加国家收入。

平心而论，亨廷顿所提的人类文明之差异与矛盾确实是存在的，而且还先存在于意识形态冲突之前，但是文明差异何时开始演变成为文明冲突？何以会演变成为文明冲突？而人类又应该如何防止将文明差异演变成为文明冲突？这些问题都似乎不是亨廷顿所关心和感到兴趣的。反而他是更热衷于如何引起文明之冲突，以达到西方国家支配国际社会之目的。因此，他要制造儒家与伊斯兰国家的差异与冲突，更要联合那些肯顺从西方文明支配的国家去与儒家与伊斯兰国家对抗。主要原因是他不愿看到非西方国家崛起，从而摆脱了几百年来西方国家之控制，甚至与西方国家鼎足而立。亨廷顿并非不知道文明之冲突，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而且出现乃比意识形态冲突更早。在12至13世纪，历时百多年，西方文明曾经与回教文明交锋过，当时十字军东征，人类经历了一场持久的浩劫并不单纯是因为文明本身的差异而引起。而是当时罗马教皇为了要巩固其势力，同时欧洲西方国家之间王公贵族年年内战，须要找一个共同敌人，以便转移内部的矛盾去共同对外，才是引起冲突的主要原因。野心家为了要达到他们奴役别人，称霸世界的野心。就蓄意在人类社会中最敏感的区域去煽风点火，火焰就如此因势地提升到可以燎原了。这场历史教训，世人是否会拿来作为前车之鉴而不重蹈覆辙呢？

文明之为文明 人类异于禽兽

西方学者像亨廷顿之流，如果是善良的关心世界和平，他们除了提出例子说明文明的差异性可能引起冲突之外，他们也应该指出不同文明之间也有一定程度的相容性，也有不少的共同价值观，需要人们



共同去发扬它，以作为和平共存的基础，人类之文明之所以成为文明，就是因为文明能使人类异于禽兽。明知多种文明之间，多种族群之间存在着差异与矛盾，但是为着共存共荣，都会自我节制，以避免将差异演变成为冲突，而终需以干戈相见。

两三百年来，世界所看到的事实是：西方国家一直都是以唯我独尊的姿态来垄断世界，并在经济上大事掠夺别人的财富以自肥。从纵的方面，它曾经引起了剧烈的阶级斗争，从横的方面，它也曾曾经引发了殖民地国家反抗帝国主义的史实。如今意识形态冲突已经淡化了，殖民地国家也多数独立了，但是落后国家反西方先进国家的支配和垄断还是时起时落，到今天还没有结束，而且落后国家翻身日子已经不远，这是“西方中心论”者所不能容忍的局面。

如果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能成立的话，我们相信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合作的机会更为浓厚。因为伊斯兰国家正如亨廷顿说的“需要西方的现代文明来加强他们的财富，科技，机械和武器”。而儒家国家处境也是如此。既是如此，那么伊斯兰国家与儒家国家又如何能够结合在一起来反抗西方国家呢？如果他们真的会结合在一起，这个原因绝对不是因为他们有共同文明，而是因为他们都是落后国家，曾经被西方国家欺侮及凌辱了好几百年。现在他们都觉醒了，要抬起头来反对西方的霸权与支配。如果西方国家能够放弃霸权以及支配国际社会的野心，相信不同文明之间鸿沟再大，也不致于引起大规模的冲突。只要大家能够互相谅解与尊重，不同文明和不同族群就能和平共存。在今天这个后冷战时代只要霸权继续存在，没有人敢担保世界不会再有冲突。

不过，这个冲突基本上并不是文明冲突，而是为害者与受害者之冲突，或者是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之冲突，在这冲突中，

文明差异被西方国家当为宣传手段，以便使他们在走向没落之际，振作起来，加强其内在团结与合作吧了，这与当年十字军东征西方国家所持的目标没有两样。为了维持西方国家的霸业以及实现支配国际社会的野心，西方国家也许会将“文明冲突”泡制出来，一旦如此，西方国家便是文明冲突的始作俑者，怪不了别人。

在亨廷顿的文章里，他提出文明冲突的六大原因，其中一个就是经济区域主义日益抬头。他说“只有当经济区域主义植根于共同的文明中才能成功，欧洲共同体以欧洲文化及西方基督教为共同基础。北美自由贸易区能否成功，端视刻下正进行汇合的墨西哥，加拿大及美国文化。”如果亨廷顿相信文明冲突存在，而且也像意识形态冲突一样，会引发人类走向浩劫，那么西方国家首先就应该自己停止经济区域主义的活动，应该将诸如欧洲共同体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等等经济集团解散，以打破“只有当经济区域主义植根于共同的文明中才能成功”的格局，而不是在自己建立了这种格局之后，又对别人加入此格局中的游戏大事批评。因此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台湾等华人社会进行经济合作，或伊朗、巴基斯坦、土耳其、阿富汗等十个非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建立经济合作组织，实无须要大做文章，制造恐慌。因为，西方国家既可以领先组织经济集团来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我们看不出为何非西方国家不能随后也组织经济集团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近年来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医生创组东亚经济核心组织 EAEC，就被美国诸多为难和阻挠，这不正就说明西方国家的谓民主自由只是挂在口，而强权霸道才是事实吗？

西方自视优越 采用双重标准

西方国家另一个问题就是自认其文明



是“普世文明”。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在他的《西方的兴起》一书里就承认自己曾经挟著二次大战后美国技术和财富的优势，以胜利者的高姿俯视世界，并且有意宣扬和推销西方文明的价值观。他更将近五百年来西方文明的兴起及主宰世界为书名，称呼一部世界史就是一部西方兴起的歷史，这种文化优越感是普遍存在于西方人士的心中。

可是西方国家在推销西方的文明观念如民主、人权、法治、自由、平等、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的过程中，为何会在其他文明中遇到许多困难呢？在一定程度上，这不能不归咎于西方国家在这方面常使用双重标准，而在非西方国家中失去许多威信。可是亨廷顿却辩称“文明相左的世界无可避免是双重标准的，对种族国家使用一种标准，而对其他国家则使用另一种标准”，这种说法如何能使人信服？对于上述民主、人权、法治、自由、平等这些观念，其实也是非西方许多民主人士所向往和梦寐以求的。可是西方国家在带来这些观念时，除了采用双重标准之外，有时还趾高气扬地硬要人家连垃圾文化 Punk Culture 也须一篮子照收，更使人反感的是，西方国家在推引这些观念时，往往暗带

不可告人之阴谋。正如 50 年代美国作家威廉·李德尔 William J. Ladder 和尤真·勃迪克 Eugene Burdick 合著的《丑陋的美国人》描写的美国人一样，他们妄图用美元收买人心，用武器扑灭当时泰国人民民族自决运动，暴露了美国人不了解东南亚人民的心态，结果不仅是一败涂地，而且也助长了反美情绪的火焰。这种西方国家不了解非西方国家人民的心态例子，历史上层出不穷。这也就是为什么亨廷顿会叹说“西方努力传播这些观念，换来的都是对所谓‘人权帝国主义’的反抗”，以及“现代民主政府创设于西方，当它在非西方发展时，通常是西方殖民主义或西方的强加产物的原因。同时，西方国家有时也像替天行道似的以高姿态代别人高喊民主人权，可是当这些人在他们的统治下之时，西方国家又装聋作哑好像不知民主人权为何物。这种姿态不难反映出西方国家在处理民主人权时假仁假义的一面。例如目前的香港问题，过去百年来人们未曾听过英国统治者以揭发民主人权为己职。可是当他们正要结束他们的统治之时，却刻意大事渲染推行民主制度。前后出现了两种面目，两个标准，这种做法不仅被人认为是虚伪造作，同时也被视为是政治阴谋。何

以能被中国政府接受？它非但对一些真正追求民主人权的人士所推行的民主运动毫无帮助。而且也使人怀疑这些人士是否真正是西方国家的傀儡或是代理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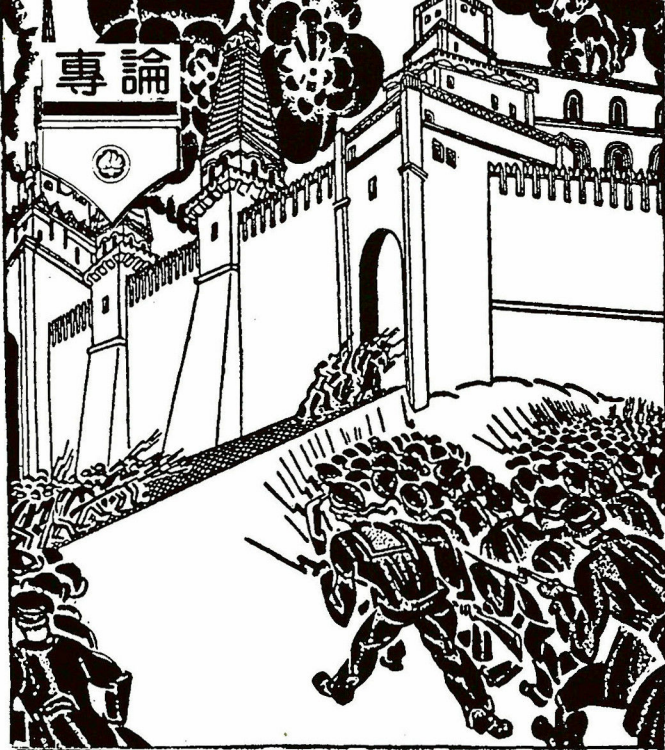
亨廷顿为了表示或证明他的文明冲突理论是正确的，科学的和进步的，他引用孔恩 Thomas Kuhn 的经典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中一段说：“所谓知识与科学进步，主要是旧模式无法再解释新现象或新发现事实，于是更能令人满意的模式应运而生，取而代之。一套理论必须优于其他理论，才有可能取得模式的地位，但它不需要能解释适用范畴内的每一个事实。”

在亨廷顿的眼中，意识形态冲突，经济冲突的模式已经不合时宜了，因此他努力制造一个更能令人满意的模式取而代之。这个模式便是“文明冲突”模式。不过，为了立场四平八稳，他则留下一个转身余地。他说文明模式有所有模式的通病，有很多照顾不到的地方，批评者很容易就可以找出一箩箩无法解释或始料未及的事件为例子——包括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东合各个不同文化背景国家之成立集团。其实人们日常所谓的认识都是经验性的或借助经验进行的。因为人的经验有限，用经验性的认知手段求得的知识也是极其有限，极其不可靠的。例如人躺在潮湿地方，有些人会得风湿病，有些人不会；人爬到树上，有些人会恐惧战栗，有些不会。显然，感觉经验主体不同，对同一事物所持的看法便不同。正如西方哲学大师波普尔说：“经验告诉我们的只是个别的知识，比如说‘这朵玫瑰花是红的’那只是一个单程判断。人们即使是看了一千朵，一万朵是红的，那也是个别的，有限的，个别有限不能确证无限，过去不能确证未来。”而亨廷顿为了扩大他的经验性的认知，则不厌其详的胪列出许多例子以支持他的“文明冲突”的立场。他认为如果有例外，也是不足以推翻他所制造出来的模式，可是就在亨廷顿胪列出来的众多

在亨廷顿的眼中，
意识形态冲突，
经济冲突的模式
已不合时宜了，
因此他努力制造
一个更能令人满意
的模式取而代之。



■ 亨廷顿



例子中，我们几乎可以全部用来反证文明差异不是真正引起冲突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却是西方国家唯我独尊的气焰，处处要向别人展示其力量，要表示他们还是国际社会的支配者。

为了缩短篇幅，我们不防从亨廷顿列举出来的例子中取用两例：

- 2000年奥运主办权之争，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展示力量挫败中国。
- 最近美国怀疑中国运送核子科技给伊朗，而逼使中国货船停在公海。结果事实证明美国犯上错误之时，美国非但不道歉，而且还要死赖中国将有关核子原料弃于公海。这也是西方展示力量和霸道的例子。

今后西方国家不能唯我独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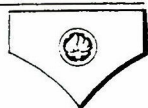
近年来，非西方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经济方面已开始抬头，而且已有超越西方国家之势，经济成就也助长了非西方人士的文化自信，而且倾向于将经济成功归功于独特的非西方传统和制度，如儒家思

想观念等等，这种自信使非西方文化出现回归根源的现象，非西方精英不再替西方服务而逐渐本土化。这说明了非西方文明也有其可取的一面。西方国家如果要看到今后世界还有和平及安宁，他们就必须承认这种现实，再不能唯我独尊，处处要人家乖乖就范，要知道人类文明差异自古以来便已存在。而且也是无法改变的现实。人类都要面对这种现实而生活。至于文化差异是否会被挑起鼓动成为冲突。主动力在于西方国家，如果为了要达到继续支配或垄断世界的野心，西方国家蓄意要引发人类冲突，西方国家必须要负起一个重大的责任。

世界上不管任何国家，如果要与别的国家维持良好关系，都必须互相谅解及尊重对方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优秀的文化自然会受别人欢迎，不须要刻意强加于人，历史上被征服者能以优秀的文明去同化征服者，至今似乎只有在中国元、清两朝代出现过。西方文明当然也有其优秀的地方，世人在无压力下当然也乐于接受，不必强求。唯有在互相尊重和谅解下。不同文明的国家才能为共同利益而合作。所谓共同利益应该是双向或多向的，而不是像以往一样，利益只是或主要是向西方国家归属。正如中国外长钱其琛最近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以《一九九三：世界开始重新认识中国》的文章里指出的“西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从来不是建立在共同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组织观念的基础上，而只能是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如果西方国家能认清钱氏指出的现实，而愿意在共同利益下寻求合作，文明差异虽仍存在，文明冲突是可避免的，不知西方国家是否能以这种胸怀迎接新的时代，21世纪。



(文中小题是编者所加，如有失误，与作者无关。)



东西文化确有鸿沟 但未必导致冲突

回教及儒家这些非西方文明将与西方文化争雄，成为未来世界冲突的主线。

/ 徐 策

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提出“文化冲突论”，指回教及儒家这些非西方文明将与西方文化争雄，成为未来世界冲突的主线。虽然陈他这一套理论饱受各方抨击，但最近亚洲地区所发生的三宗事例却又隐隐然与他所提出的论点有若干吻合之处，引起舆论界的关注。

马来西亚与英国交恶、新加坡判罚美国青少年笞刑，以及美国与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之争，是最近本地区连续发生的显著事件，此在在显示东西方文化对言论自由，酷刑和人权的看法有颇大的差距，甚至是不可弥补的鸿沟，冲突似乎不能避免。

由这些事例来看，亨廷顿认为东西文化鸿沟极难打破，这个恐怕是真的，但是否必然导致冲突，倒又未必。

英国报章向大马道歉与否，美国给

予中国延续最惠国待遇与否，都涉及复杂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比不上新加坡要让美国青少年捱六鞭这件事挑起双方的情绪，那么突显东西文化之差异。

这位 18 岁的迈克彼得菲被控恶意破坏公物，行为不检以及收藏赃物，结果罪名成立，新加坡地方法庭判他罚款、坐牢和笞刑。如果刑罚单是罚款和坐牢，相信绝不会引起传媒的注意，甚至国际传媒连报导也可能会省掉，更遑论现在惊动了美国总统克林顿。

目前惹起轩然大波的是笞刑。

在美国人眼中，笞刑是野蛮和违反人权的刑罚，这种脱裤子捱鞭的作法是对人性的羞辱。世界人权宣言也有条款，禁止“非人性和屈辱的刑罚”。

但新加坡政府的说法也有道理。副总理李显龙说，法律之下人人平等，外



华社资料研究中心 广招会员

大家都来壮大力量

华资的成立，虽非轰轰烈烈，但却是八方注目的大事。它曾受过倾心的呵护，九年了，它却历经风风雨雨，加上某些离析与散涣因素的冲击，而面临重重难题，陷在困境中。

然而，无论如何，华资的诞生与存在，都是奠基在华社要有尊严地生活的一种共识——汇聚华社本身及相关问题的资料，进行深入研究作出综合性的概括，以为依据应付与纾解面临的各种难题。

由去年开始，华资已获准注册为非营利有限公司，并策划从多方面的途径，展开运作，冲刺突破困境，谋求发展。因此，我们恳切地邀请您参加作为会员，直接参与华资未来的发展，并分享它所提供的各项服务与便利。

欢迎致函下列地址索取表格：

华社资料研究中心

Huazi Resource & Research Centre Bhd.

1 Maharajalela,

50150 Kuala Lumpur.

Tel: 03-2734035 Fax: 603-2734037

国人与新加坡人犯相同的罪，刑罚也一样；政府不会制定不同的法律，分别供本国人和外国人遵守，如此置新加坡法律于何地？而新加坡内政部也特别指称，当地社会秩序井然、较少罪案，全赖打击反社会罪案的严刑峻法。

有一句话说，国有国法，一个国家绝对有主权去决定那些行为是犯法，以及犯法后的刑罚是什么，外人本来无权置疑。但这儿必须先有一个前提：即有关的法律是经民主程序制订，而大部份当地民众也认为这样的法律是既合情也合理的。换言之，只要新加坡的立法机关是经民主程序产生，而大部份新加坡民众也认同答刑的话，答刑便没有什么不妥。新加坡是实行民主法治国家，西方人对此应该不会有疑问。

如果外国人不同意答刑或不认同新加坡的严刑峻法，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不去新加坡，二是不触犯有关的法律。

话说回来，包括美国人在内外国人没有必要去认同答刑，他们有自由去批评它，但运用外交手段，而且还劳驾总统出面施以政治压力去企图改变别国的法律，只会勾起对昔日帝国主义丑恶的回忆。最近从报导得知，美国竟然有七成电视观众赞成迈克彼得菲应处以答刑，看来美国人也未必是不明事理的。

按照美国已故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斗争传统，不正义的法律也是法律。如果新加坡人自己认为答刑太残酷，他们应该自行运用公民抗命的手段去抗争，或通过议会民主去争取，以改变这项刑罚，无需美国人指指点点。

由这些事例看来，我们承认东西方文化确有颇大的鸿沟，但说到文化鸿沟的存在必然导致冲突，则又言过其实了。



農牧世界給榴槤種植人的另一呈獻

一本書的代價

等於 RM130 榴槤講座會

①林文忠推荐：

檳城的榴槤品種

從檳城榴槤比賽六屆冠軍——葫蘆、紅蝦、15號、坤寶紅肉、紅仁、D600到金魚、貓王、頭家……將近三十個品種，圖文並茂，單看圖片已能嗅到浮羅山背的榴槤飄香。

②楊華勇敦招：

榴槤真菌病的防治

榴槤難種，真菌更難防治，腐幹病、凋萎病、絲狀枯萎病、白根病、白疹葉病……對症下藥，消滅真菌，讓病樹恢復蓬勃生機，小園主不必再頭痛！

③黎德泰分析：

大馬的榴槤栽種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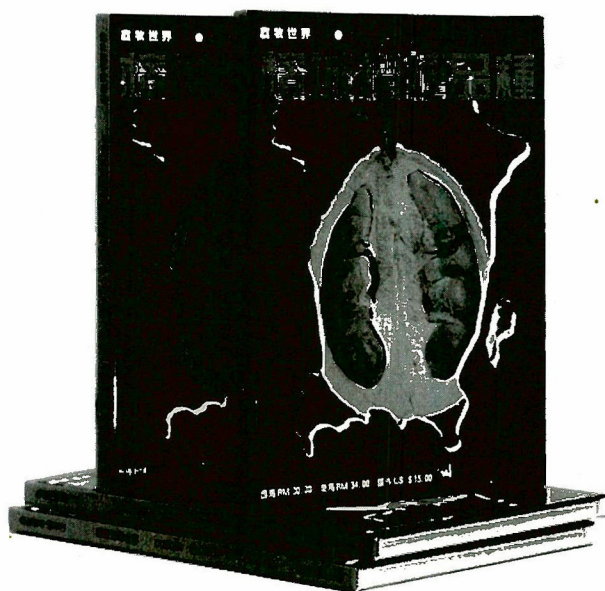
先種種子再駁接，榴槤容易長大？直接栽種駁種樹苗，快速開花結果？兩種栽種法，孰優孰劣？一個園坵只栽種一個品種，滿園的榴槤不開花？……連串疑問，盡有答案！

④藍進喜介紹：

榴槤病蟲害的處理

菌病難發現，害虫看得到，撲滅害虫是小兒科？但是，為什麼滿樹的榴槤，有一半賣不到錢？都是蛀果虫造的孽，掌握噴藥、噴煙、裝置榴槤燈的方法，殺盡飛蛾，粒粒榴槤沒有虫洞。……

隨時翻閱，
永久保存！



發書有限，欲購從速
各大書局報攤均有出售

●郵購詳情，請聯絡農牧企業 03-2380740 / 03-2302523。



国歌知多少

/ 梁记宝

《NEGARA KU》自1957年起正式成为我国国歌以来，这首被传唱了36年的歌曲在目前一片创新与改革的声浪中也面临了被修改的命运。以总监阿末·达西拉（Ahmad Dasilah）为首的RTM管弦乐团受新闻部的委托把旧国歌的节奏改为进行曲的节奏，以配合时代的需求。修改国歌的节奏，虽说是见仁见智，但这项决定似乎忽略了也是国歌演绎者的人民的感受。虽然如今事已成定局，但不能说那是人民的普遍意愿。本文企图透过多种角度来探讨国歌。探讨的范围包括：国歌的定义、我国国歌NEGARAKU的渊源、我国国歌的甄选过程、修改节奏的意义、各界的反应等等。

国歌的定义和象征

国歌是代表一个国家的歌曲，正像国旗和国徽一样，是国家的标志和象征。凡举行国家庆典，隆重集会和国际交往仪式时，都必演奏或演唱国歌。世界上每一个独立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歌，它们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有的是革命斗争的产

物；有的是广泛流传的爱国歌曲、历史事件作品或民俗歌曲，后来被选为国歌；有的则是歌创作比赛的作品，再由该国政府选定。

国歌是诗和音乐的结合，有的反映爱国思想（如美国的《星条旗》国歌）；有的反映革命斗争（如苏联的旧国歌《国际歌》和闻名世界的法国国歌《马赛曲》）；有的反映民俗生活；有的歌颂自由；有的歌颂民族英雄和君王（英国的《神佑女王》和日本的《君王的世代》）。许多国家的国歌都出自杰出的诗人和作曲家的手笔，例如：中国、印度、孟加拉、意大利、奥地利和德国等。这些歌曲大都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思想境界。某些国家的国歌却是只能奏而不能唱的纯器乐作品（如：几内亚、毛里塔里亚和索马里亚）。

国歌《NEGARA KU》的渊源

关于《NEGARA KU》的来历，颇具争议。有的说是采用霹雳州歌的调子，有的说那是印尼民歌《月光曲》

（Terang Bulan）的曲调，但又有的说Terang Bulan是早年流行于马来民间的歌曲。先不谈二者的关系，Negara Ku和Terang Bulan的曲调确实有雷同之处。Negara Ku的调子采自霹州州歌的旋律倒是千真万确，但若追究霹州州歌的来历则至少存在著几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指出在1901年，当时的苏丹依地里斯 Sultan Idris（任期1887-1916）受邀代表马来联邦各州苏丹前往英国参加爱德华七世的加冕大典，当一夥人抵达英国的南汉顿 Southampton时，英国当局想要知道霹州的州歌，俾在Idris苏丹检阅仪仗队时，可演奏之。这一来，可难倒了苏丹，因为霹州当时根本就没有州歌。后来，苏丹的私人秘书拉惹哈伦 Raja Harun 灵机一动，把平时哼惯了的《Terang Bulan》当作霹州州歌，而在英国南汉顿首次奏出。

第二种说法：在上述地点替苏丹Idris解围并哼出《Terang Bulan》典调的不是私人秘书Raja Harun，而是苏丹的儿子Raja Chulan，同时，访英年代是在1902年。

第三种说法：那是马来西亚历史学会于1960年对当事人所作的一段访谈录。受访者是前霹靂州苏丹Sultan Abdullah（任期1874-1876）的女儿Raja Aminah，时年76岁，Raja Halijah，78岁及孙子Raja Kamarulzaman，68岁。这段访谈在年代上不会与我们相隔太远。

Raja Aminah与姐姐Raja Halijah，她们对这首曲子有著最切身的体验。“我第一次听到有关曲调是在塞舌尔Seychelles的马埃岛上，亦即我父亲Sultan Abdullah被放逐的地方。它经常被一支法国乐队于每个星期二在我家附近作公开演奏，当时是1892年，我年约8岁。同样和我在岛上出生的姐姐Raja Halijah说那是岛上的水手和居民所普遍哼唱的一首曲子。我们对该曲的印象非常清晰，并且很肯定它就是目前的《NEGARA KU》” Raja Aminah进一步说他的哥哥Raja Chulan（Abdullah的儿子）曾数度到岛上探访其父。约在1885年的一次探访中，他偶然听到该首曲子，喜爱之余，更以小提琴来拉奏。

1895年Raja Abdullah结束流亡生活，带同Raja Aminah两姐妹移居新加坡。若干年后，该曲子被采纳为霹靂州州歌。至于这首曲子如何成为霹靂州州歌，且听Raja Kamarulzaman（Raja Aminah的侄儿）侃侃道来：“我的父亲经常对我叙述此事，而

且有很多可靠的证人。事缘1888年，苏丹Idris（1887-1916）受维多利亚女皇之邀前往英国。随同者有当时的英国驻霹靂参政司修罗爵士Sri Hugh Low，以及年仅24岁的苏丹侍从武官（A. D. C.）Raja Mansur。当一夥人抵达英国的南汉顿Southampton时，英方代表上船要求Raja Mansur把霹靂州歌告诉他，俾作为欢迎苏丹殿下时演奏。Raja Mansur想到，要是说霹靂州没有州歌的话，将有失威严。于是他解释手上没有乐谱，但是可以把州歌哼或奏出让人将之谱下。于是他便哼出他所喜爱的这首来自塞舌尔的曲子，让乐队队长将之谱下。Raja Mansur还提醒苏丹待会儿在白金汉宫当英方演奏此曲时应肃立以示恭敬。从那刻起，这首曲子便被定为霹靂州州歌，而且是马来西亚第一个有州歌的州。”

根据Raja Kamarulzaman的反映，约在苏丹访英期间，一首同样的曲调被引用在新加坡上演的一部叫“Indra Zanibar”的印尼Bangsawan里。这首乐曲叫作“Stambul Satu/Satoe”。此曲广受人们的喜爱和传唱，其他的Bangsawan剧团也纷纷引用此曲。若干年后，此曲被改为“Terang Bulan”。

关于国歌的渊源，在马印外交史上也曾发生过这么一个故事：印尼总统苏卡诺于1963年4月在椰加达《茂物行宫》设宴招待出席《亚

非新闻记者会议》的各国代表时，明知《月光曲》

（Terang Bulan）是马来西亚的国歌，却命令乐队再三演奏作乐。在场的马来西亚代表认为苏卡诺此举是蓄意蔑视马来西亚，愤而离席抗议，苏卡诺有如此举动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印尼曾经强烈反对前首相东姑拉曼在1961所提出的“马来西亚概念”，认为它是新殖民主义的一项计划。当“马来西亚联合邦”组成时，马印对抗便开始了，也就是苏卡诺高喊“粉碎马来西亚”的时刻。当马来西亚在1957年把这曲子定为独立国歌时，苏卡诺即下令禁止这首曲子在印尼被作任何形式的演唱或演奏。有关证据，可参考我国政府于1964年出版的《Malaya/Indonesia Relations 31st August, 1957 to 15th September, 1963》，第63节。

1960年间，马来西亚历史学会把录有Negara Ku的磁碟送去塞舌尔，通过电台广播，一名当地的老居民毫不犹豫地认定那就是70馀年前曾在岛上流行的一首乐曲。

史学家相信该曲的作曲者就是法国著名作曲家及诗人Beranger（1780-1887）。无论如何，作为国歌的霹靂州歌或Terang Bulan并非在马来西亚或霹靂州作第一次官式演奏，而是在英国的南汉顿（Southampton），地点就是著名的白金汉宫。

本邦音乐界前辈Dr. Ariff

取自《世界名歌精华》

Terang Boelan

树下情歌

Jawa-Malay Folk Song



Ahmad与Daud Hamzah认为我们的国歌源自印尼的抒情歌曲 (Lagu Keroncong), 原名 Stambul Satoe, 于1939年被改为《月光曲》(Terang Bulan), 也是一部印尼片的插曲。不过, 据一位马来著者Hashim Hassam反映, Terang Bulan的名字早已出现在1930年他的父亲从印尼棉兰带回的一面唱片里。

Daud Hamzah说Stambul Satoe最早是出现于1924年檳城HSL编写的一部歌书里, 书名为《Penghiboran Hati》(心的娱乐)。马来亚大学于70年代从伦敦博物馆取得这本歌册。

在本邦, 官方文献一般上都志明赛富岂里 (Saiful Bahri) 是我国国歌的作曲人, 这点倒值得商榷。因为若按年代推算, Saiful Bahri是于1924年出生, 就前述的《Penghiboran Hati》(心的娱乐) 和Raja Kamarulzaman的访谈看来, 时间上与Saiful Bahri相隔太远了。况且, 据他的太太诺莱妮 (Noraini) 披露, 其先夫是在1957年才为国歌作曲。如此推断, 很明显的Saiful Bahri只是编曲者, 而非作曲人。

另有一份文献足以加强这项推断, 那就是台湾四海出版社1958年10月10日出版的《世界名歌精华——第二集》, 由蔡乾元和陈振煌合编。里头便收录了《Terang Boelan》一曲。编者还志明那是Jawa-Malay Folk, 全曲编

以钢琴伴奏, 旋律与节奏的处理跟目前的国歌大同小异。请参考图6。

我国国歌的甄选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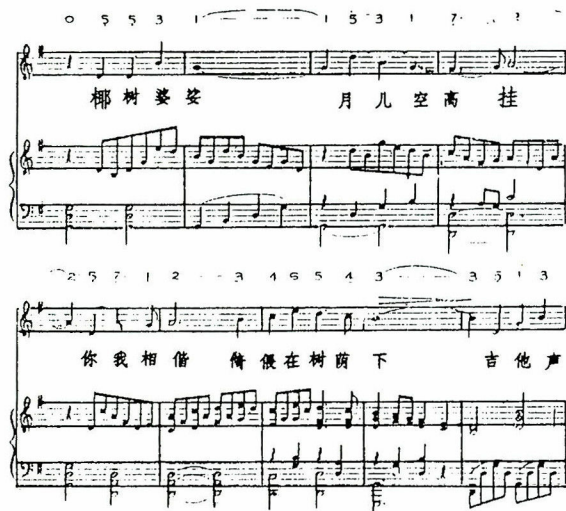
前面提过了Negara Ku的来历, 那么这首备受争议的曲子又是如何被厘定为国歌呢? 独立前夕(1956年), 联盟政府曾成立了一个国歌甄选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主席, 是当时的首席部长兼内政部长东姑阿都拉曼, 委员包括当时的掌玺大臣(The Keeper of The Rulers Seal) 拿督莫斯打花阿巴加里 (Datuk Mustapha Albakri) 等。东姑建议邀请世界各国的音乐家参加一项创作竞赛, 再从中选择独立马来亚国歌的词曲。奖励非常丰富, 首奖可获奖金一万元, 安慰奖三千元, 并设立了一个评审小组, 负责评审参赛作品。

竞赛细则公布后, 各国

人士的反应非常热烈, 参赛者有来自美国及南斯拉夫等国的人士, 甚至当时驰名国际的口琴家拉里艾勒也参加了。委员会所收到的词与曲共514分。结果, 由于这些作品欧西风格太浓, 委员会决定全部不录用。由于时间匆促, 东姑担心找不到合适的曲子以便在独立日合唱和演奏, 经过审慎的考虑后, 决定从各州的州歌中选出适合的作品。最后东姑觉得跟霹州州歌同出一彻的《月光曲》(Terang Bulan), 不但旋律柔美, 而且也深受国人的喜爱, 于是便决定采用为国歌。

国歌修改节奏的启示

唱了36年的国歌, 在去年5月间被建议把“缓慢”的节奏修改成进行曲。理由是不外乎为了塑造一股朝气蓬勃的气象, 以便迎合2020年宏愿。新闻部长说, 我国



发展快速，我们需要悠柔歌曲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2020年宏愿只是国家发展的一个目标，目标和商品都有它的时限性，但是历史的价值却是永恒的。因此若我们只为了迎合发展潮流而一味更改具历史意义的事物，是很不智的。要是到了2020年，宏愿达到后，国歌的命运又将会如何？美国身为一个科技强国，但是《星条旗》国歌并没有改为《太空进行曲》。英国也是强国之一，一首《天佑女皇》唱了200多年，并不影响到人民的爱国情操。谁也不怀疑日本人的忠君爱国精神，但是以雅乐风格写成的《君王的世代》除了悲壮之外，并无半点进行曲的味道。

各界的反应

国歌被修改后各界的反应有褒有贬。

赞同者的看法：轻松，活泼（学生）、符合2020年宏愿（老师）、新时代应有新作品（商人）、新国歌是去芜存菁的国家资产（时评者）、符合以进行曲编曲的世界国歌（校长）、耳目一新，因旧的太严肃了（学生）、很特别，年轻人会喜欢（店员）、建立勤奋形象（退休人员）、表示大马更开放（商人）、编得好，无负面影响（年轻人）、具娱乐作用，令人振奋（中学生）、带动发展（官方乐团指挥）、易唱（老师）、拍烂手掌（学生）、工作有劲（社团领袖）、新节奏符合政府的意愿（国家电影学会主席）、学生容易掌握（老师）、新国歌很吸引人（医生）、不再柔缓无力（马来诗人）、好！脱离过去的悠柔时代（马来文化人）等。

反对者的理由为：失其庄严，节奏过强（音乐界人

士）、如学生乐队在操行（音乐界人士）、节奏太快了（读者）、发展无关乎慢节奏（时评者）、国歌理应受尊重，国歌非娱乐或潮流（国歌作曲人遗孀）、新国歌难以表现爱国意识（公关）、旧国歌听了心理很平和（营业代表）、虽然吸引人，但快到难唱（学院师生）、还是旧的好（老公民）、旧的抒情更适合（学生）、更难唱且难以接受（酒店接线员）、国歌不应跟随时代而改变（中六学生）、不舍得旧的（主妇）、从未听过有更改国歌的国家（学生）、旧国歌符合国情（学生）、36年后才更改，国人和外国难以适应（学生）喜欢旧国歌的 Romantic（学生）、不了解国歌的意义，改不改都一样（学院生）、并非所有的改变都是好的（独立参与者）、应自行创作符合国情的国歌（马来音乐界人士）等。 (24)

野史记载：包拯，生于宋咸平二年（公元999年），肖猪。

包母怀胎12月，梦见一只大黑猪从高处跳入怀里，受惊，动了胎气，才生下包拯。谁知道包家小子，生下来竟是个大肉球，其父认为不祥，弃之；幸得兄嫂（《大义灭亲》中包勉之父母）救回，才知肉球内藏著一个又黑又壮扳著副铁面的娃娃。

包父原为刑部侍郎，即今之司法部长，据说也是个好官。包拯幼承庭训，严己律人，公正不阿，仁宗年间，任开封（时宋首都）府尹，因断案如神，心昭日月，获御赐“青天”美誉。

传说中的包拯，生就一只神眼，给他一看，好坏立办，忠奸即明，任何邪魔妖道，均得退避三舍。其无私大义，赢得后世赞颂：“举制不避乎权贵，犯颜不畏乎逆鳞”。

如此一个人物，在历史与戏剧、传说与创作中被神化了，又从传统戏剧甚至现代的电视连续剧中，不断回魂转世，成就了亘古常青的话题。

两岸三地弥漫“青天热”

话说电视剧集《包青天》由台赴港，转道华南一带，所向披靡，“威武”无匹，酿成“青天热”，弥漫中、港、台两岸三地。

走上神坛的

/ 梁胡雪姬



包青天

在台湾，华视以《包青天》连续击败同期的剧集制作不下十部之多。连在台湾身价最高（新台币17万一集，演包公的金超群才刚由2万一集至5万5千）的郑少秋演台视的《戏说乾隆》也不敌，有些剧集如潘迎紫在中视演的《超级女巡按》等，更被迫腰斩，惨淡收场。

在香港，无线电视凭此外来制作，竟能挽狂澜于既倒，把其连续剧持续低收视的情况一下改善：由开播首周的卅点（160万观众）急升至第九周的卅七点（195万观众），拿了平均八十五巴仙的市场分占率。

在大陆，华南一带的观众通过香港无线播放追看《包》剧之余，更有人把它辗转传至北方。由于《包》剧内容不涉政治，力主忠君爱国，大陆官方未有抗拒，而大陆已有电视台正式于日前买下《包》剧一零五集的版权。

呵呵，想不到两岸三地，如此这般就被包青天“统一”了。且不费一兵一卒、一枪一炮，更没一句恶言，又礼貌又和平，又不影响股市。这是否能够予人有所启示？

中国人的基本企盼： 清官

是的，如果《包青天》还真有什么启示的话，大概也不过明明白白显示了吾土吾民的基本企盼——寻找清

官。

或者说，寻找某种公正的权力。

五千年前，中国人的祖先还是群居的部族时，每有大事小事总得在族群中寻个领袖，找人作主。在远古时候，作主的可以是部落之首，亦可以是一家之主。延伸到现代社会，有了主席、总统、总理、总经理、总裁诸如此类的总之是“头头”、“大哥”的领导人。

中国人有事喜欢找人作主，崇拜权力，要倚赖一种至高无上的力量。形而上的人谈神说佛，把一切还给天界；寻常人家一旦遇上什么不平事，能够有人为之出头的，就呼为恩公、大侠、壮士，或为其供奉长生禄位烧香祝祷，或以身相许，林林总总，都是对权力的肯定。

人世真有这样的父母官吗？

中国人的政治文化就是由此演变出来的人治文化，在家有家长，在校有校长，在公司有老板，在国有国君。总理、总统之类，权力的代名词而已。

然而，现下这位“统一”两岸三地的包青天包大人，不知怎地，竟然打破“权力令人腐朽”之说，六亲不认，私情不顾，只认真理不畏强权；一声“狗头/虎头/龙头铡侍候”，随即右手甩飞令

牌，潇洒凛然，直叫万人肃敬。

包公不过是个皇城府尹，却像是拥有无上权力（御赐）。命丧他铡下的，有天子门生（真状元陈世美、假状元周勤）、高干子弟（皇帝的大舅子、太师子庞昱），更有不少权贵官绅，彻底打破了中国人“刑不上大夫”的观念。

他强调个人判凭藉的是“经验与良知”（包勉案），历来所铡之人，俱都是奸恶之徒，“没有一个冤魂”（古琴情怨）。他忠君爱主，也眷顾黎民百姓，强调“皇上是一命，秀才也是一命”，若秀才因救皇帝而死，自己愿以死谢情（双包案）。观其身边，尽是才智之士，谈文韬有公孙，论武略有展昭，加上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大护卫，个个都愿意为他而死，更不惜触犯天颜。

唉，迢迢人世，真有这样的父母官么？

容或那只是神坛上的一个人物，透过萤幕轮回转世至人间，他提供我们无穷企盼的同时，仿佛也揭示了我们的忧惧。“包”剧香港版主题曲中原有一句是“但愿我中国（无线电视改为‘心里’），天天见青天”，在道出许多心事。

如何是好？

还请包大人为我们作主。



（《九十年代》十一月号）



叛变以后的 华人拓荒者

■ 陈振声撰 ● 黄顺柳译

早期的拓荒者

华人叛变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在“公司”失败之后，石隆门再没有华人矿工留下来。这以前为“拉惹”政府带来税收之中最大部分、欣欣向荣的矿场和胡椒园，如今都空无一人。以前收入极佳的鸦片烟馆、酒馆和赌馆如今也寂然无声。来自中国，途经新加坡而到古晋从商的华人本来就不多，也有的来自马来群岛众多岛屿中之一，他们与西婆罗洲华人并无血缘上的关系，所讲方言也不同，故此在叛乱时他们拥护“拉惹”，得以平安无事，但他们的事业却毁于一旦，因为他们跟当时砂劳越的每一个人一样，也在很大的程度上依靠金矿生意来发达。

1857年叛变的回忆一直萦绕于“拉惹”的脑海中。他对所有华人小心翼翼，只信任那些他已经深入了解的人，直到他的生命结束时为止。这次叛变给他与他的政府带来一个惨痛的教训：一个国家不能只靠领导人的权威与地位来达到昌盛繁荣。叛变消耗了他个人的积蓄，同时也使国库空虚。石隆门“公司”的败亡截断他的主要收入来源。他了解到情况严重，也知道只有华人的勤奋与苦干能挽救他的国家，这使他明白过去所实行的政策是不智的，于是逐步的采取对华人宽容的态度。他的这种转变后来也使到他的欧籍官员和同僚紧跟其后，其中最显著的一个例子是他的外甥兼接班人，端慕达查尔斯·约翰逊·布禄克（本姓约翰逊，后改姓布禄克）。这反

映在“拉惹”鼓励华人商家将砂劳越土产出口到新加坡，并促成他们大规模种植胡椒与甘蜜，同时也将硕莪加工成为硕莪粉。

随着时间的消逝，越来越多逃去三发避难的“公司”华人悄悄回到石隆门，还带了其他人一起过来建立家园。叛乱之后不久，“拉惹”特准由刘新德所率领的一批效忠于他、原先住在古晋以东的砂隆河畔的客家人，迁移到矿区去重新开矿。新成立的慕娘公司也租赁器材给别的矿工群体，并设立一个炼金厂以帮助他们。到了1898年，慕娘公司更吞并所有矿场。为了让华人农夫安居乐业，詹姆斯·布禄克于1863年草拟第一份土地法令，此法令成为以后一切有关土地的法令的蓝本。此法令赋予华人只须付出极少的费用就可租用政府地的权力。

史籍上四名人

这种有利于华人定居的气氛很快就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原本已经住在古晋一带的那些拓荒者的行列。关于这些在叛变前已住在这里的人，历史上少有记载，只有4个人是例外，其中3个被认为是他们自己那个社群的先驱者。这4个人是刘直、王友海、田考与刘建发。只有刘直不做生意，其他3人都是事业有成、声名显赫的社会支柱。他们得到“拉惹”的信任，不久就发展成具有影响力的资产阶级，随时准备动用他们的财力物力支持布禄克政权。他们组成3人委员会协助“拉惹”治理华人，遇到所有关系到华人文化与风俗习惯的问题时，“拉惹”必定征求他们的意见。

在作者所参阅的华文史籍中并未有刘直的名字出现。根据欧洲人的记载，他是广东人，比詹姆斯·布禄克更早10年踏上砂劳越的土地。他与数位友人乘

帆船前来，约在1830年从中国航行直达成邦江（现在的斯里阿曼），由此他们迁移到古晋的砂督，开芭种菜与饲养家畜。后来他成为“拉惹”的侍从，在叛变时为“拉惹”的一方作战。在这一段时期身为官方史学家的伦西曼曾提到刘直，并以刘直出任“拉惹”侍从为例，说明“拉惹”不曾对华人存有偏见。

王友海出生于新加坡。他的家族来自福建省同安县。幼年时父亲去世，使他16岁时便成为一家之主。他先做小商人。听到在砂劳越与土人做生意获利甚丰的消息之后，他于1846年偕同年纪较大的伙伴林英茂一同抵达古晋。尽管自新加坡到砂劳越的航程费时7至10天使他们精疲力尽，抵步后的居住环境又十分恶劣，王友海还是立即开始工作，不久以友海茂公司为名建立合股事业。他经常往返古晋与新加坡之间，每次回来一定带着大批砂劳越所需的商品货物。他为人耿直诚实，在新加坡商界赢得好名声。1856年，在他创立砂劳越的那间公司10年之后，他在新加坡设立同类性质的开诚友海公司。1872年改名王友海公司，而在砂劳越的那间仍用旧名。王友海老年时在新加坡享清福，将砂劳越的事业交给精明能干的儿子王长水管理。王长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但是一位事业家，也是华人社会最有威望的领袖。王友海于1889年去世。

田考是砂劳越诏安人社会的先锋，生于福建省诏安县。他家境贫寒，跟当时许多年轻人一样，唯一的梦想是前往南洋打天下。在18岁那年，他签约成了一艘小帆船的水手，那艘船自福建港口运载食盐。1846年，他抵达古晋，然后前往石隆门为一位会讲客家话的同乡工作。他在园地里发现金苗，立即开始探测。后来他自己开了一间乡村小店，生意很不错，卖的是烟草与杂货。他赚了



●查尔斯·布禄克



●黄乃裳

钱便搬去古晋扩大生意，由土产转向地产买卖，这使他发大财。于是他向“拉惹”申请带更多诏安人前来砂劳越定居。他于1904年去世。儿子田祈顺生于砂劳越，后来接管他的事业，也成为有声望并为众人所信任的华人社会领袖。

刘建发是潮州人的先锋。1852年与几位同乡自汕头经新加坡抵达砂劳越。他们先在古晋朋里逊路、石角与海口的巴哥等地种植甘蜜与胡椒。刘建发后来与同乡沈阿娘合资经商，于1854年成立名为义顺公司的出入口商行。他长袖善舞，使业务蒸蒸日上。不久又得到詹姆斯·布禄克批准让他从中国引进更多潮州人，以协助种植甘蜜与胡椒。在“拉惹”的鼓励之下，义顺公司也将硕莪制成粉以供出口。多年来，这方面的盈利甚丰。钱赚得越多，机会也就越多。义顺公司成功标得由政府所垄断的赌馆、酒馆与鸦片烟馆的经营权，长达将近20年。他的社会地位与事业成就可与福建人领袖王友海比美。有时“拉惹”还向义顺公司借钱，以应付行政开销上的不时之需。因此可以说鼓励潮州人前来砂劳越是刘建发的功劳。同时也是他为潮州人打下基础。他于1885年去世。

以上三位的生平写得详细是因为他们在叛变以后的砂劳越华人社会占据重要地位。他们活跃于19世纪下半段。1868年詹姆斯·布禄克去世，也就是第一阶段统治的结束。当时这三人都是华人领袖。第二阶段自1868年起至1917年止，由查尔斯·布禄克出任“拉惹”。这时则有王友海与田考的儿子崛起成为新领袖。到了20世纪初，由于“拉惹”推行土地垦殖政策，吸引大批华人移民自中国前来申请土地，影响所至，华人领袖的人数也增加不少。为了便于参阅，特将起自1841年至1910年涌现的华人领袖列表如下（其中或有遗漏）：

其他领袖事迹

1841年至1910年早期的砂劳越华人领袖

姓 名	出生地与其他	职业与经济活动	社会活动与成就
王友海 (1819-1889)	原籍福建省同安县，生于新加坡，1846年抵达古晋定居经商。	与砂劳越土著作物物交换贸易，后来生意以出入口为主，在砂劳越与新加坡设立友海公司。	福建人社会领袖，第一任“拉惹”所信任的顾问，被委任为砂劳越华人社会的首领。
田 考 (1824-1904)	福建省诏安人，18岁时抵达砂劳越。	劳工，开矿，后来改向地产业发展。	诏安人领袖，第一位“拉惹”所信任的关于华人事务方面的顾问。
刘建发 (1835-1885)	广东省潮州人，年轻时前来砂劳越。	种植胡椒与甘蜜，建立义顺公司，投标经营鸦片烟馆、酒馆与赌馆。	潮州人领袖，第一任“拉惹”所信任的顾问，出钱与筹款建立上帝庙，供潮州人之用。
杨万福 (元藻) (1858-1925)	福建省长泰人，1877年到砂劳越。	经营出入口、建筑生意，投标经营鸦片烟馆、酒馆与赌馆。	承建福建义校，出钱出力，建立林华山庙的主要捐款人，也建造万福码头。
王长水 (1864-1950)	生于砂劳越，王友海之子，在英国受教育。	继承父亲事业，朝新领域如船运与银行扩大业务，乃王友海公司经理，砂劳越轮船公司董事。	福建人社会领袖，福建义校的主要创办者，甚为第二与第三任“拉惹”所看重，担任华人法庭主审官多年，被第三任“拉惹”委任为最高议会终身议员，战前受邀出席立法议会会议。
田祈顺 (1856-1910)	生于砂劳越，田考之子，受中英文教育。	继承父亲事业，任振安经理。	福建义校创办人之一，与人联合赞助数间庙宇与祈祷场所。
陈戌辰 (亚戌) (1870-1924)	广东省潮州人，10多岁时到达新加坡，19岁时在古晋登岸。	从事胡椒与甘蜜之种植，开设实蒙谷石厂于朋里逊路七哩多年。	潮州人社会领袖，先在朋里逊路七哩三合兴港实蒙谷之李顺庆胡椒与甘蜜园理账，1899年被查尔斯·布禄克委任为港主，赞助天主教教会与实蒙谷华文小学。



姓名	出生地与其他	职业与经济活动	社会活动与成就
李振殿 (1875-1965)	福建省海澄人，22岁时抵达砂劳越，1912年迁移到新加坡。	在古晋与诗巫开创事业，经营土产生意。	福建人社会领袖，支持孙中山推翻满清，迁移新加坡后更为活跃。
宋庆海 (1876-1945)	福建省南安人，早年随父亲前来砂劳越。	经营进出口与建筑业，30年代大萧条时生意失败。	福建人社会领袖，受委为华人法庭推事。
黄乃裳 (1849-1924)	福建省闽清人，考过乡试，中过举人，支持孙中山推翻满清。	1900年与查尔斯·布禄克签约带领1千多名福州人到诗巫定居，1906年返回中国。	福州籍拓荒者、领袖与港主，负责建立数间卫理教堂与两间学校。
邓恭叔 (1855-1925)	广东省三水人，考过乡试，中过举人，支持孙中山革命。	1902年带领广东人在诗巫上游的拉让盆地定居。	港主。
张宗罗 (1877-1958)	福建省海澄人，1892年途经新加坡抵达诗巫。	经营农产与土产，设立银行。	福建人社会领袖，受委诗巫华人甲必丹，创建诗巫中华小学。

这里提到的领袖都是第二阶段的人物。在另一章，我们将会分析早期砂劳越华人领导层的结构，与其对华人社会发展的影响。

砂劳越的领土扩张

1868年查尔斯·布禄克成为“拉惹”之前未有大规模的华人移民进入砂劳越。詹姆斯·布禄克在其任期内对偏僻地区的控制心有余而力不足，常常需要以军事行动对付不法之徒。还有，自1857年叛变发生后，他对华人一直感到害怕与不信任。在他统治下的领土不大，只限于砂劳越河流域，国界自丹絨拿督至三马拉汉河，内陆则与三发遥遥相对。直到1853年，他才取得三马拉汉河与西里巴士、拉让的分水岭之间的领土，那是

因为他平定那些经常攻打沿海硕莪产地的人之后，由汶莱苏丹让渡给他的。这一带被命名为第二省。1861年，“拉惹”去世之前几年，拉让、乌驿、沐胶、达岛与民都鲁河盆地也划入砂劳越版图。当时，“拉惹”只需每年付出4千5百元给汶莱苏丹就获得这片领土。这一带后来被称为第三省。

查尔斯·布禄克继续将国界向东北推移。1882年，他取得加央人所住的巴南，加上已有的民都鲁与达岛，合称第四省。1885年杜鲁山局势不稳，导致苏丹将它让渡予砂劳越，“拉惹”每年加付4千5百元给苏丹。1890年林梦也划入砂劳越版图。最后于1905年，老越河盆地由英国北婆罗洲公司割让予砂劳越。于是林梦、老越与杜鲁山便构成第五省。至此砂劳越便拥有目前的面积。（待续）

提供您进行恰当选择
引导您打造黄金岁月

您有一本

《教育指南》



- 页数：560 页
- 尺寸：21cm X 30 cm
- 定价：中心会员 RM21
非会员 RM30

欢迎订购，请联络：

华社资料研究中心

Huazi Resource & Research Centre Bhd.
No. 1, Jalan Maharajalela,
50150 Kuala Lumpur.
Tel: 03 - 2734035

世界18个国家地区的大专院校，
国内八百间私立学院的资料，
即可一目了然。
同时，您还可以洞悉
教育部属下部门、
法定机构通讯录；
民间教育组织，
提供奖助贷学金的机构以及
教育谘询单位等等。

21 世纪革新型流通业 讲座会

“流通业”这三个字对大多数马来西亚人来说，还是挺新鲜的。这三个字事实上是日本汉字俗语。流通业所涉及的整个运作过程是从厂商制造的产品，通过运输转到中间商（大盘商、中盘商）再分发到零售店（超级市场、便利商店等等），最后到消费者的手上，它所涉及的范围包括生产、批发、零售、直销、连锁等。

华社资料研究中心、南洋商报及温馨苑在四月九日和十日分别假檳城和吉隆坡联合主办“21 世纪革新型流通业”讲座会，邀请来自台湾的林谷烨和林荣茂两位先生主讲。这项讲座是以零售业作为研讨的焦点。

传统的零售业多年来一直受到各种挑战的



●华社资料研究中心义务主任游若金博士赠送纪念品给主讲人林荣茂。右起为林谷烨、南洋商报总编辑冯时能，左二为华资中心管委会署理主席何维城，左一为华资业务部专案执行员赖秀韵。

严峻考验。这其中包括外国财团的“泰山压顶”、马来商家的大事进军以及同业之间的激烈竞争。工资增、成本高、租金涨、员工缺是另外令业者大伤脑筋的问题。

林谷烨先生的讲题是：“巨人来了！了解流通业的革新方向”，其内容分成两大部份，即革新的参考模式和创造马来西亚流通业的蓬勃发展。他认为流通业

的发展趋势是朝向国际化、软体化、个体化、高度技术化、高度情报化；同时，经济地位的提升，女性上班族的增加，自由时间的增加及民间活动的利用，也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业者应把握并善加利用。

林荣茂先生主讲“求变求胜！掌握流通业转型之道”，所触及的重点包括环境市场、行销策略、消费习性、竞争以及经营管理。他认为做生意不要有国界及市场区域之区分，凡是有市场前景的地方，都应是商人要顾到之处。他也指出，在廿一世纪的商业社会里，一个强调整合、创造，并辅之以后续行动的商业手法，将是其中一个甚为重要的法宝。



●座谈会的听众向主讲人提出询问。